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碩士論文

「新生」的17哩：

砂拉越客家華人新村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

From 17th Mile to Siburan: Sense of Place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a Hakka Chinese New Village of Sarawak

研究生：陳敏萱

指導教授：羅烈師 教授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 年 六 月

「新生」的 17 哩：

砂拉越客家華人新村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

**From 17th Mile to Siburan: Sense of Place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a Hakka Chinese New Village of Sarawak**

研究生：陳敏萱

Student: Min-Hsuan Chen

指導教授：羅烈師

Advisor: Lieh-Shih Lo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碩士論文

A Thesis

Submitted to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Ethnicity and Culture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Social Science

June 2014

Hsinchu, Taiwan

中華民國 一 百 零 三 年 六 月

「新生」的 17 哩：砂拉越客家華人新村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

學生：陳敏萱

指導教授：羅烈師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

摘要

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的郊區 17 哩，在 20 世紀初期即有客家移民在當地拓墾定居，並在 1950 年發展成一個小型華人聚落。但當 1963 年砂拉越被併入馬來西亞聯邦後，17 哩地區的客家年輕人紛紛投身於左翼運動，試圖抵抗政府的強行合併。同時 1965 年其與印尼聯合的攻擊行動，造成了政府強制將 17 哩這個區域原本散居的華人全體集中搬遷到當地新規劃的華人新村限制居住，並實施長達 15 年的戒嚴管制。

17 哩這些華人在長達 15 年的管制區生活後，伴隨著新村管制區後期開放與經濟狀況逐漸好轉，讓許多人選擇在此繼續定居，並建立與延續管制區時期的村落生活圈，進而建構出對這個地方更為深層的地方感。再者，隨著新一代 17 哩人的誕生，他們不僅延續了這種地方感的生成，同時使得過往當地在左翼運動與新村成立初期艱辛生活的集體記憶也隨之改變，進而產生結構性失憶。

但過去的新村研究多是放在管制區時期的歷史脈絡或新村問題來做探討，較少關注到新村在不同時期發展演變的貫時性相關研究，也無法從中知道新村內部的發展演變。而本研究在砂拉越 17 哩這個華人新村發現，要觀察整體的村落發展，仍需要面對新村是在一個歷史脈絡中被劃歸的「特定空間」這一事實來做進一步的討論。因此，我欲將焦點放置在「地方」和「集體記憶」的視角重新檢視「新村」，並探討地方如何生成地方感，同時又如何讓既有的集體記憶產生轉變。

研究發現在此視角下的「新村」從來就不是一個停留在新村管制區時期的靜止狀態，相對的這個「地方」是以一有機體的形式，隨著時間藉由相異世代村民的影響，以不同的形式反覆建構地方感與重塑當地的集體記憶。

關鍵字：地方感(sense of space)、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華人新村(Chinese New Village)、客家(Hakka)、砂拉越(Sarawak)

From 17th Mile to Siburan: Sense of Place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a Hakka Chinese New Village of Sarawak

Student: Min-Hsuan Chen

Advisor: Dr. Lieh-Shih Lo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Ethnicity and Culture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17th Mile in the suburb of Kuching Division in Sarawak, Malaysia, is the location where Hakka Chinese dwelt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ence a small tribe was formed here in 1950s. In 1965, the communist armed movements took place in Sarawak. Due to weaken the atmosphere of the movement, the government compelled the Hakka Chinese from the 15th to 24th mile reorganizing into three Chinese New Villages—Siburan, Beratok, and Tapah, and executed isolation and superintendence for fifteen years.

From the prospect of Place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formation of Siburan till the present time. And I discovered that though after the fifteen-year isolation, by reason of the liberation policy and rising economy, these Hakka Chinese who chose to remain in Siburan and maintain the village life circle

developed deeper attachment to this Chinese New Village. This sense of place gradually transforms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e Hakka Chinese from the early strenuous life and the communist history.

Like an organism,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ew Village in Sarawak is dynamic. Generations of village people construct and reconstruct the sense of place and their collective memories.

Keyword: sense of space, collective memory, Chinese New Village, Hakka, Sarawak



誌謝

結束與啟程

陸續歷經了六個月的田野、將近半年的論文書寫歷程，直至今刻這本論文才終於完成。完成論文的心情其實很複雜，過去當我每次遇到懊惱或失落時，總期盼著這天的到來，但是當這天真正來臨時，靜下來心來翻閱著人生第一本一字一句仔細著墨下的論文，這才意識到原來我已經走了好長的一段路，而這段路看似崎嶇、難行，也到了走完的這天。不過，就如同大學時某堂課的老師在學期結束時講的那句話：「當你瞭解的越多，反而越會發現自己有更多的不知道。」我想田野結束、論文完成的感受，或許就是如此吧！因此，這不是個結束，相對是個啟程的開始，我將帶著在這段人生歲月中很特別一段時期的經驗與收穫，再去面對未來更多等著我去追尋的未知，進而理解、思考、細心體會與感受。

回想起初次踏上馬來西亞的悸動，還有在 Google Map 上的想像瞬間化為真實的感動，以及那一步步努力融入當地生活的過程。即使在這段過程中，每個在午後雷陣雨完在諾大房子中夜晚的靜謐，伴隨著「五月天」的歌聲，讓一邊書寫田野筆記的我總不自覺地想起台灣。但每當真正到了快回家的那一天時，心情往往會少了雀躍而增添許多莫名的惆悵，也許是這個原本跟我沒有太多連結關係的地方，不知不覺也成為我人生中另一個重要的地方了！而這段讓我從陌生到成為我另一個家的過程，現在想起來其實倏忽即逝，不過似乎再也想不起來那個帶著厚重行李獨自來到古晉「探險」的自己。這都是因為在馬來西亞的日子，台灣人的身分雖然標示著我，但幸好我在這裡承蒙了許多人對我的熱情疼愛與照顧。

最要先感謝的就是提供我在 17 哩住宿的爺爺余源昌先生，感謝您從我初到 17 哩開始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當我在 17 哩的這段時間，您總是會擔心我是否有記得吃飯，或是一個人出門是否安全，雖然有時我總嫌您嘮叨，認為我這麼大一個人了，自己出門並不是件危險的事，要您不用擔心，但您往往還是會在忙碌的事務之餘掛念著我。另外，也要感謝余爺爺的太太及其他家人，在 2013 年農曆新年時讓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圍爐過新年和放鞭炮，同時一起在家門口迎接村子裡大年初一五光十色的煙花。還有要感謝婆婆燒的一桌好菜，讓我真正能嘗到最道地的客家菜，還有那一大袋我要回台灣前準備給我的米香和胡椒，都讓我感到滿滿的窩心。

在 17 哩另一位很照顧我的李若芬婆婆，也是我非常感謝的人。感謝李婆婆總把我當成自己的女兒、孫女看待，時常開著您那最顯目的汽車載著我去很多地方，不僅讓我陪您在凌晨時分天還沒亮時，就下古晉去賣菜板，經常也讓我可以當您的小跟班陪您去雜貨店、咖啡店買東西和找朋友。而且您也總是會擔心我有沒有吃飯，所以常邀我去您家一起吃飯，或是親手炸 Koropok 給我吃，不然就是一通電話來「小萱，要不要吃菜板」，

隨之而來就是一大盒的新鮮菜板，無論是包著豆干、芒光、木瓜或韭菜的菜板。我想這些一定會成為我在 17 哩最想念的味道。此外，也謝謝您挑了一個很漂亮的紅包袋包給我人生中第一個有馬來西亞幣的新年紅包，讓我知道我在這裡也有一個婆婆這麼疼愛我。

感謝溫三德爺爺、彭南發老闆、鍾爺爺，謝謝您們這幾位固定班底總是熱情的告訴我許多您們在這個村落中的故事。其中，特別是溫爺爺，感謝您每次提供的寶貴資料，總讓我收穫滿滿，又同時能從您的生命故事中，了解這些被人忘記的往事。

感謝我在 17 哩的哥哥姊姊們，娜娜姊、阿圓姊、LULU 姊、阿叻哥、善德哥、阿 Ping、漢和哥。謝謝你們帶我認識屬於年輕人的 17 哩，也提供我很多在田野材料上的幫忙，甚至當我回來台灣了，有時還會在網路上麻煩你們很多事，而你們總會熱情的幫忙我，提供我答案。而且謝謝你們在我田野這段時間時不時帶我出去吃東西、看電影、打羽球，還有參加你們每次的聚會，這些都是很棒的回憶和經驗。其中，特別還要再感謝阿圓姊，謝謝姊姊時常趁著有空的時分，帶我出去跑跑看看，去爬新達山、吃沙嗲(那沙嗲真的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豬腳飯，也讓我喝到人生第一口從樹上直接摘下來的新鮮椰子汁，還有中秋節的放天燈、點燈籠、吃竹筒飯，那真的是生命中很難忘的經驗。同時也謝謝妳的家人，同意讓我記錄下屬於你們家的故事，希望我能真的為你們家的記憶多留下些什麼。

感謝阿新，幸好你家的老鼠版牽起了讓我能夠認識你的機會，讓我可以認識你又認識你的朋友，而且老鼠版一定也會是我很想念的滋味。感謝賴義彬，非常謝謝你的幫忙，你的自信及對事物的熱情，是我很值得學習的地方，太可惜無法早點認識你，不然可以吃到更多超甜的玉米吧!此外，也要感謝阿程、阿興接受我的訪談，認識跟我同年的你們，真的是我在 17 哩很棒的收穫。

感謝甲必丹謝艾陵，每每遇到時，總是會熱情的招待我。感謝本固魯溫民生先生夫婦、甲必丹鄧日晴先生，謝謝你們對我的研究提供很多寶貴的口述訪談資料。感謝 17 哩諸位曾經接受我叨擾的村民，謝謝蘇爺爺、黃爺爺、鍾爺爺、余婆婆，將生命中很精采的那段回憶分享給我，讓我每次訪談時，總是聽得津津有味，也不由得佩服起您們年輕時的熱情。謝謝彭南洋老闆，接受我的訪談，以及在文獻資料上的幫忙。謝謝 17 哩的作家夢羔子，跟著您一起去你的園裡工作的田野經驗是很難忘又特別的回憶，也感謝您書寫的新村紀錄成為我很珍貴的材料，還有在我研究期間提供的建議與幫忙，非常感謝。謝謝 17 哩每一位願意接受我的訪談，以及熱情招待我的村民，感謝你們願意讓我書寫這個屬於你們這個村落間的故事。

這份論文的完成，除了 17 哩的村民大力協助與支持，還要另外感謝許多單位與長輩的幫忙。感謝馬來西亞砂拉越大學(UNIMAS)東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在我研究交換期間於行政事務上的協助，安排了很舒適的研究室給我，也讓我在學校的

生活有很棒的經驗。其中，要特別感謝林煜堂教授在我於 UNIMAS 這段時間的極力協助與幫忙，同時又提供給我許多於研究上珍貴的意見，讓我受益良多。

感謝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保存了非常珍貴的報刊資料，以及文協的蔡增聰主任，在我於馬來西亞研究時於簽證與研究上的協助。感謝古晉的貝克民先生與作家黃葉時女士，從一開始我來到古晉時的協助與安排，讓我的田野初探可以順利完成，收穫頗豐。感謝新生村農業部的劉先生、議員何健華先生，謝謝您們願意接受我的打擾，並提供我許多文獻上的補充資料。

感謝亞答街的林傳政先生一家人，總讓我在古晉還有另一個熟悉的地方。我永遠忘不了 2012 年與你們相識的開始，以及每次找你們時，你們的熱情招待。而且非常謝謝婆婆總是很疼我，只要我一去就會問我要吃什麼，還準備了好多包 Kolo Mee 讓我可以帶回台灣與家人分享，您的 Kolo Mee 將會是我最想念的古晉食物。

除了我在馬來西亞遇到的每個人是我完成這本論文所要感謝的人之外，還要感謝在台灣等著我田野歸來，以及陪伴、支持我度過這段漫長研究生生活的朋友與長輩們。

首先感謝交大族群與文化碩士班，以及中研院民族所提供非常豐沛的獎學金，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完成這個田野。此外，也要感謝這一路許多師長的鼓勵與照顧。感謝研究計畫與論文口試的口委張維安院長、林開忠老師與蔡芬芳老師對於這本論文細膩的評論與建議，讓這本論文可以更臻完美，同時還要特別感謝蔡芬芳老師從我至中央修課時的關心與鼓勵。感謝所上的簡美玲老師從我一進到交大來持續的關心與疼愛，也在碩一時提供許多研究的方向與建議。感謝許維德老師，您腳踏實地、認真做學問的態度，總讓我佩服，也讓我對族群認同的知識受益良多。感謝所有過去清大人社系、交大族文所教過我的老師們，因為有您們對我於知識、想法上的啟蒙與影響，奠基我的基礎，讓我才能逐漸成為現在的我。

感謝李艾潔，蝴蝶園盆栽的小故事牽起了我們的緣分，謝謝有妳從大學到研究所的一路相伴。我永遠忘不了，研究所推甄時我倆在電腦兩端前為了彼此的眼淚。即使後來我們因為念不同的研究所，以及各自忙碌於田野的關係許久才能碰面，但每次碰面時，暢談有的沒有的八卦或是生活的瑣事時，總是最舒壓的時候。還有在田野時，妳從小島捎來的信，是最真摯的禮物。

感謝我最棒的國小摯友丁子倩，妳大概不知道，因為妳的關係，鼓舞我讓我有勇氣可以獨自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雖然因為工作、學校的關係，讓我們久久才能見面或聯絡，不過每次和妳聊天總有很棒的收穫，或許這就是物以類聚的魔力吧！

感謝三不五時找我看網拍，甚至在我田野時還陪我跨國連線的尤昱景，雖然我們討論的話題總是沒什麼內容的五四三，不過感謝有妳總在遙遠的家鄉治癒了我苦悶的研究生生活，未來請繼續陪伴唷！

感謝一路從清大陪伴我到交大的高資雅，每次初到陌生的環境，都謝謝有妳的陪伴，讓我不孤單。常會懷念大學時期的我們，在那個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不專心上課時的閒暇活動，以及一起焦慮、努力完成報告的每個夜晚，還有研究所一起暴肥運動減肥和圖書館研究小間吱吱喳喳的時光，這些都是在清交生活中很棒的記憶。

感謝張宛婷、陳家慧，謝謝妳們總是很好的嘍浪傾聽者，還有謝謝二位人生第一次出國就獻給了我，幫我從台灣扛許多我很想念的家鄉味到馬來西亞，還陪我一起遊歷馬來半島和新加坡，那幾天的玩耍經驗真的是很特別的回憶。

感謝楊培晶、廖敬宜，謝謝妳們兩朵花從大一開始一路的陪伴。一直以來和我相異成長背景的妳們面對事情的人生態度，都是我值得學習的地方，也幸好有認識妳們，讓我學習在對其他人或事情上都別忘了要記得多份溫暖。感謝 Duke 的主人邱恩容在我田野期間從台灣捎來的明信片，那是最棒的鼓勵。

感謝怡玉、郁忻，謝謝妳們時常的傾聽與鼓勵，能認識妳們是我人生中很棒的收穫。還有這本論文中的馬來文翻譯，要不是有妳們的及時相救，馬來文對我來說根本是天書。感謝景宇、威廷、紹雍、貽菱，以及其他班上同學與所上學長姐、學弟妹三年來的扶持與鼓勵。雖然從碩二開始就鮮少見面，不過幸好網路無國界，在 FB 上的打卡社團，陪伴我度過孤單又漫長的論文書寫時光(讓我每天我最期待的事變成是打卡...)。此外，感謝威廷在我文獻回顧時的幫忙，如果沒有你如圖書館般的強大書庫，我可能無法如此順利的完成書寫。

感謝最疼愛我的同門學姊書璇、嘉雯、曉燕，即使妳們早我一步先畢業了，讓「2013 年畢業，衝刺」的社團暫時停擺，不過很慶幸能和妳們擁有一起在小間上課，以及後來團體 Meeting 時吃吃喝喝的時光。其中，特別要感謝劉書璇，謝謝妳在英文摘要上的幫忙，若是沒有妳小萱該怎麼辦!(哈哈...)

感謝拉曼大學的慧倩、北藝大的宇凱，謝謝你們在文獻資料上的幫忙。感謝蘇子翔從我大學小型報告到進研究所前的研究計畫以致後來碩士論文初稿完成後，不間斷的建議與協助，實在超級感謝。感謝草姊柯珮琪持續的關心與疼愛，姊姊一直是很值得學習的對象，但願即將出社會的我，未來也能像妳一樣精明幹練。感謝甘肅團的王運凱、張友誠、陳怡安、黃上航、倪孝勇等人，謝謝你們讓我在交大的日子多了很多笑聲與記憶，其中特別要謝謝改運、上航時常扮演著傾聽者的角色聽我述說生活上的不快(雖然總是王運凱在講...)

感謝我的家人，謝謝我的外婆侯玄英女士，要不是年輕時，您和外公辛苦飄洋過海來到台灣，或許就沒有您們之後在這塊土地上落地生根的故事，也不可能會有我的誕生。謝謝從小辛苦拉拔我們三姊妹長大的爸媽陳振泰先生與吳明珠女士，雖然您們可能還是不明瞭這七年來我讀的到底是什麼，不過謝謝您們總是全力的支持我讓我有足夠的自由去做自己想要的事，同時無論在金錢或精神上，都成為我最強而有力的後盾，謝謝您們！

感謝陪伴我長大的手足陳敏葳與陳敏容，其中謝謝姊姊總是我的借貸銀行，還有在我田野期間辛苦生下的小生命為我們家增添了許多歡樂，也讓我在書寫論文的漫長時光還有可愛小猴子的相伴。

感謝陪我度過許多人生階段與完成兩個學位的鵬惟，謝謝跟我相異科系背景卻總是保有對知識熱情的你，一路從大學到研究所都陪我一起讀書，成為我在知識和生活上最重要的對話對象。同時謝謝從小到大你的扶持與鼓勵，每次都全力支持我展翅高飛完成自己想要的事，而當我心情煩雜、失落時，感謝你也總是最好的避風港。謝謝你！還有辛苦啦！

在最後要感謝促成整本論文從無到有的最大幕後功臣—羅烈師老師。這一路以來，雖然我老是說是您把我騙到古晉去做田野的，但重新回溯這段過程時，反而感謝您讓我有與古晉和 17 哩相遇的機會。還記得自己對於出國田野這件事還裹足不前時，若非有您不斷的鼓勵，恐怕我仍無法鼓起勇氣獨自出國進行田野，甚至擁有在異鄉過年的經驗。而田野或是論文書寫期間遭遇挫折時，也感謝您在每個階段總是給我滿滿的肯定與鼓勵，還有在百忙之餘還要每天撥空看我的田野筆記、書寫的進度，同時給予建議和回饋，那信箱中每日的往來進度 email 一定是最珍貴的記錄，也是最難忘的回憶。總之謝謝有您陪我一起完成與走過我們在 2013 年初春時的約定。

這次，我終於要畢業了，也將是人生下一個旅程的開始，無論未知的旅程會遭遇什麼困難，都再次謝謝曾經陪伴我走過前段歲月的你/妳們，因為有你/妳們讓我有滿滿的力量能夠勇敢地大步向前邁進。

敏萱

2014 年炙熱的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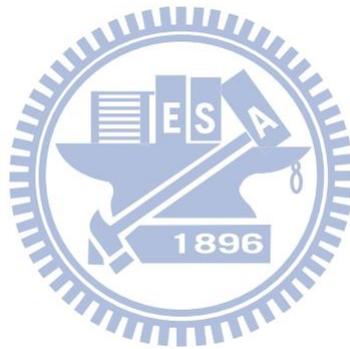
目錄

緒論	1
一、研究緣起	2
二、文獻回顧	3
三、深入地方	12
四、章節安排	24
第二章 歷史背景	26
一、成邦江路上的椒園村落	27
二、鐵絲網下的新村	32
三、新村成立之後	36
四、小結	41
第三章 記憶裡的驕傲	43
一、17 哩左翼運動的萌芽	43
二、反大馬的潮流	46
三、去六哩念大學？	48
四、小結—不再被提起的記憶	53
第四章 公權力下的不自由—新村成立	54
一、改變命運的那晚	54
二、「鐵鏈行動」	57
三、新村成立計畫	61
四、新村外的人看新村	75
五、小結—這裡開始成為家	78

第五章 落地生根—我是 17 哩新村人.....	80
一、從鋅版屋到水泥房	81
二、新村地景	83
三、17 哩當地社團	88
四、商業發展下的 17 哩	94
五、小結—這裡是離不開的依歸	97
第六章 離鄉還是留下	98
一、展翅高飛看世界？—離鄉的 17 哩人	99
二、返鄉務農的農村大學生	103
三、我在新村工作	108
四、終究還是要回家	112
五、小結—年輕人的地方感	118
第七章 新村是遙遠的過去.....	119
一、家中不提起的記憶	120
二、歷史課被忽略的「歷史」	124
三、電視、報紙中的 17 哩「新村」	131
四、小結—遺忘並非真的遺忘	136
第八章 結論	137
一、研究發現	137
二、未來預期研究	140
參考文獻	143

表目錄

表 1	三個新村戶數與人口數資料	17
表 2	17 哩 50 歲以上報導人	20
表 3	17 哩年輕與中壯年報導人	22
表 4	其他和新村及左翼運動相關問題訪談之報導人	23
表 5	因新村成立而消失的華小與中學之簡介	36



圖目錄

圖 1	馬來西亞地圖	15
圖 2	砂拉越州地圖	15
圖 3	古晉第一省地圖	16
圖 4	三個新村地理位置分布圖	16
圖 5	15 哩到 17 哩新生村遷移範圍	33
圖 6	19 哩到 21 哩來拓村遷移範圍	33
圖 7	24 哩到 22 哩大富村遷移範圍	34
圖 8	新生村於新村建立時的規畫圖	34
圖 9	17 哩新村成立前與後	35



緒論

本研究針對馬來西亞砂拉越的華人新村以一地方事實的視角，探討地方感如何在地方生成，以及村落的集體記憶如何在地方產生變遷，並說明地方透過不同世代人群的延續，讓地方能一直保有持續的有機狀態。

馬來西亞的華人多數對於華人新村(Chinese New Village, or Kampung Baru Cina)都不感到陌生。1950年代的英國殖民政府為了杜絕當時馬來亞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勢力的擴張，而將馬來半島上數以百萬的華人遷居於 400 多個新村居住，並實施戒嚴管制長達數十年。因此，有許多華人成長、生活於新村，甚至新村也從臨時的居所，成為了永遠的家。然而相對於馬來半島對岸隔著南中國海的砂拉越(Sarawak)，也有三個在馬來西亞新村討論範疇下因地理區位與成立時代背景相異而常被忽略的華人新村，這三個新村分別為新生村(Siburan)、來拓村(Beratok)、大富村(Tapah)。

在本研究中，將以三個新村中人口規模與地域規模最大的新生村，作為研究根基，試圖探討這一個在更早以前就被名為「17 哩」的村落在新村成立之前，到新村成立後至今，長達 60 年的發展演變過程，進而了解不同世代的村民他們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是如何生成與變遷。

在本章中首先談起我為何以「17 哩」新生村作為本研究的田野地，以及本研究開展之緣起。第二部分則是回顧馬來西亞華人新村既有之文獻，說明在新村研究中，可以將其擺置在「地方」的脈絡下來述說村落史，且回顧地方感與集體記憶相關研究以建構本研究理論之基礎。第三部分則說明了我如何正式以人類學田野研究方法進入到 17 哩進行田野，以及將 17 哩的簡要地域背景作進一步說明，同時將田野中的報導人作一概略介紹。最後則是各章簡述與摘要。

一、研究緣起

2012 年的夏天，我一個人踏上了馬來西亞的土地，初落地時吉隆坡夜幕低垂的涼爽伴隨著周圍族裔的多樣性，是我對這個未知國度的第一印象。隔天一早，搭著飛機轉往我的目的地古晉，去那個我原本從來都不知道的地方。

砂拉越第一大省的古晉不如首都吉隆坡來得熱鬧、繁華，也不是個外國人初識馬來西亞時，會最先想到的地方。因此，初次與她見面時，發現她竟像我的家鄉高雄一樣，沒有密密麻麻讓人窒息的高樓大廈，卻有著不壅塞的寬廣大路，以及許多溫馨、熱情的人。

「妳是什麼人？」當這邊的華人知道我是台灣人後，總會接著再問上這個問題。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問的是我的「方言群」，這個在我當時 23 年的人生歲月中，在台灣鮮少被刻意問起的問題。這時我才想起自己還有一個身分是「閩南人與客家人」，祖父母是道地的台灣閩南人，而我的外祖父母則是 1948 年來自廣東梅縣的客家人。外祖父母最後在台灣落地生根、終老的人生際遇，讓我思考著：一群來自中國原鄉，乘著簡陋的輪船，千辛萬苦飄洋過海離開動亂的家鄉來到異鄉尋找新生活的他們，初到台灣必須面對 228 事變後的族群對立，同時對於他們這類既非外省人也非台灣客家人身分的人，從踏上高雄港岸邊的那刻起到逐漸在這炙熱、充滿「台灣話」的南台灣找到歸屬、落地生根的過程，究竟是什麼樣貌？

後來我來到距離古晉市區約 40 分鐘車程的華人新村。初來乍到，這個郊區熱鬧的小鎮，耳邊充斥著是陌生的客家話，若沒有事先了解這裡背後的故事，或許根本無從得知，這裡原來在 1965 年曾經是一個因左翼運動的影響，致使鄰近區域的華人被強制集中起來受到管制的地方。原本以為在這類過去如集中營般的地區，生活在這裡的村民他們對管制時期的記憶是憂傷、不願想起的回憶，但在訪談之後，我才發現曾經的紛擾，早已在這個村落中如過眼雲煙般的消逝，取而代之的是這些村民在這裡每天朝暉夕陰的平凡生活。他們沒有完全忘記那些悲傷的記憶，只是在現在這個時空背景下，似乎也不用太執著的再去反覆提起了。而且提起那些做什麼呢？這裡早已是他們選擇落地生根的

家。或許就如同我的外祖父母，在台灣安定生活之後，面對隔著浩瀚廣渺大海那一端卻再也回不去的家有著類似的感受吧！

這裡不約而同的和我有著生命中類似的連結，如同 17 哩歷經時代變遷下，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就像是融合了相異族群背景下誕生的我，總是存在著複雜又多元的認同。所以為了探索更多我與 17 哩的相同與相異，於是我最終帶著對異國文化的好奇，選擇離開台灣，來到古晉這個叫做 17 哩的小鎮，開始了我的碩士論文田野歷程，在一邊追尋著 17 哩人的故事之餘，也學習反思自己的根究竟是從哪裡來。

二、文獻回顧

回顧目前的新村相關研究，可發現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關注的面向除了從大範疇下討論新村與左翼運動相關的連結內容之外，還有針對新村內部在民生、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等等的議題。近年來陸續又有其他研究聚焦至不同新村的個案作探討，說明新村的異質性。不過，在這些研究中，仍忽略了新村作為一具體的村落這一事實。

而我認為無論是馬來半島 1950 年代誕生的 400 多個華人新村，或是在 1965 年相異脈絡下於砂拉越出現的三個華人新村，其實隨著時間，各個新村早已不是國家政治左右兩派陣營衝突下被迫創生的村落；相反地，在不同區域、地理位置的影響下，每個新村都各自擁有著不同的地方感與村落記憶，而這些地方感與村落記憶也會隨著村內的世代差異產生轉化與改變。

因此，在本節中，首先將回顧先前的馬來西亞華人新村文獻，再回顧既有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相關理論作為討論基礎，進而探討過去文獻可供與本文進一步思考與對話之處。

(一)馬來西亞華人新村

在馬來西亞既有的華人新村研究上，以中文書寫的研究者多聚焦在歷史文獻與個案研究，討論的主題概括新村之發展、教育、貧困問題、景觀或社會變遷，或是單純以造

成新村之歷史事件來做延伸探討，以及比較新村官方與住民論述差異等等的內容。在這之中，雖然馬來半島與砂拉越的新村都與左翼運動和華人在公權力之下被迫集中居住有所關連，但兩者間仍是在相異的歷史脈絡與時間點之下，再加上受限於地理位置的影響，致使多數研究還是以馬來半島 452 個華人新村為主軸，較少涉及到砂拉越另外三個華人新村的內容。

目前馬來西亞在新村紀錄的文獻中，除了早期有許多官方紀錄的資料之外，近年來也陸續有許多馬來西亞國內外的研究者針對新村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而這些研究成果，也大致可分為大歷史範疇之下的研究與針對個別新村的個案研究。

在前類的相關研究中，多是藉由歷史文獻整理的內容，包含在 1999 年，馬來半島在新村成立五十周年時，陸續出版了多本新村紀錄的專書，如由馬來半島的華人政黨馬華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簡稱 MCA)所出版的新村紀念特刊《新村成立五十周年紀念特刊》(2002)，以及另一本由林廷輝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新村專書，為林廷輝與宋婉瑩合著的《馬來西亞華人新村五十年》(2002)。這兩本專書的內容在潘婉明的文中，都被歸類為「住民觀點」來作討論，因為在整體內文敘述上，則是較以同情新村住民的角度作出發。其中，林廷輝與宋婉瑩兩位作者依循新村成立五十年來的時序脈絡作討論，從新村的歷史背景講起，進而延伸新村的經驗、貧窮、教育與社會文化等等的內容，提出未來可供改進或發展的空間與建議(林廷輝、宋婉瑩 2002)。

而與砂拉越三個新村有關的這類研究，在目前有 Vernon L. Porritt 與 Yong Kee Howe 的研究成果。他們各自針對砂拉越在 1965 年於冷戰脈絡下爆發的「鐵鎚行動」作進一步的歷史回溯，且都將研究主題放置在新村管制前後時期的歷史脈絡中來作討論。Porritt 的研究以《鐵鎚行動：1965 年砂拉越的強制再殖民》(*Operation Hammer: Enforced Resettlement in Sarawak in 1965*)為題作為討論。這本書雖然以「鐵鎚行動」作為標題討論，不過整本書卻是從二次大戰後共產主義對於馬來西亞的影響談起，再隨著 1963 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時砂拉越當地反馬來西亞聯邦的歷史脈絡，以及與印尼當時的親左蘇加諾政權之間的連結，進而延伸到「鐵鎚行動」最終在砂拉越發生的原因，以及後來在新村管制計畫下當地的狀況(Porritt 2002)。而 Yong 涉及到三個華人新村的文章或是專書，雖然不再只侷限於歷史資料上的分析，增添了實際至新村的田野訪談資料，但關注的重

點依然是 1965 年事件發生與之後新村管制時期的歷史記憶。在 Yong 的文章中，其提到他在新村田野訪談的過程，發覺新村人並不喜歡跟他提起異於官方論述下的記憶，甚至會覺得提起那段過去是傷心、難過的，使得那段應該是刻骨銘心、熟悉不過的遷村往事卻在新村宛若「噤聲」(Yong 2006)。Yong 認為新村人的不願多談，除了因為新村的狀況好轉，所以他們選擇面對新生活，不再拘泥於過去的陰霾之外，卻同時受限於那些新村人在事實上依舊未從那段歷史中走出來，只是他們被迫在歷史記憶中暫時遺忘 (Yong 2013)。但在 Yong 的研究中，似乎忽略了新村內部的複雜性，人群對記憶的遺忘，除了個人因素之外，國家整體的社會建構與世代差異也許都是可值得再去深究的影響。

然而，在上述這類型的大歷史範疇下的研究，仍然還是在「一種新村想像」的架構或脈絡下來做討論，更細微的個別差異或是發展演變則較無著墨。

因此，潘婉明的《一個新村，一種華人？—重建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集體回憶》一書中，說明了過去對新村的研究或是論述，無論是以官方說法為主體的「殖民論述」或是呈現新村住民說法的「住民觀點」，多數仍是放在整體新村或是政治發展的脈絡下來談，少有關注到個別新村的差異。但她透過實際田野比較兩個馬來半島新村個案的差異，說明了馬來西亞的這些新村或住在新村的華人對外並不是只有單一被建構出來的想像；相對地，她認為各個新村在不同地理位置、背景或是人群組成之下，都創造出了相異地特質，並不能一言以蔽之，甚至將其放在「新村居民共同體」的脈絡下來討論(潘婉明 2001)。

而近幾年來，不同於以往，新村的異質性較受到重視後，來自於馬來西亞的台灣研究者也選定馬來半島其中兩個新村為個案研究，分別完成了新村文化景觀的變化(鄒雁慧 2008)以及新村社會的變遷之研究(古燕秋 2011)。在古燕秋的研究中，她提到新村在過去雖然因戒嚴的關係形成一個監視與隔離的空間場域，但是後來隨著時間，當社會逐漸邁向工業化、商業化的改變時，鄰近商業區或工業區的新村，也逐漸產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不僅存在於新村地貌上的改變，還包含新村以外的人口進入之後帶來的影響。雖然兩者揮別了過往的全貌似或歷史性的研究，採行深度訪談的方式關注個別新村，不過在內文中仍是聚焦於個別新村在其公領域的社會變化。

另一位砂拉越本地的研究者蔡靜芬，則是以砂拉越三個新村中的大富村作為田野個案，其研究也是第一本以砂拉越華人新村為地域背景的個案研究。在她的研究中，她跳脫以往砂拉越多數與新村有關的研究都是放在左翼運動有關的脈絡來做思考，開始將焦點放置在大富村這個以客家人為主體的村落本身在當代社會中關於女性婚姻的傳承、儀式等等的內容(蔡靜芬 2013)。但因受限於研究主題的影響，其文中關於「地方」的主體性或是與地方生活其他更為密切相關的內容，反而未被凸顯、討論。

綜論以上文獻，我認為無論是直接或間接與新村相關之議題，終究還是得面對新村的出現是一個在歷史脈絡下被劃歸出的「特定空間」此一事實，來做進一步的討論。換言之，每一個新村都是一個有自己歷史的地方，回歸當地之地方視角本身，才能以更全面的角度解讀各個新村在不同的地域環境、歷史背景、人群組成，在時代變遷的交融下所產生的特殊性與異質性。

(二) 關於「地方」

當視新村為一個「特定空間」時，首先要探究的是如何從一個被刻意區畫出的「空間」(space)轉化為「地方」(place)的過程，這種轉換過程中，亦即所謂的「地方感」。

空間與地方的差異為何？地理學家 John Agnew 指出地方須由以下這三個基本面向所構成：1.區位 (specific location) 2.場所 (locale) 3.地方感 (sense of place)。地方之所以為「地方」，而非「空間」，就是因為地方有一地理位置上的「區位」以及社會關係據以進行的「場所」，而且更包含地和人所產生意義上的連結或關係。地方感意味著人對於地方同時存在著主觀情感上的依附，進而使地方，除了是一個環境實體之外，更是一個「有意義的區位」(a meaningful location)。因此對於生活在地方上的人們而言，地方是人們經驗這世界的實體空間，同時人們也因此讓世界變得有意義 (Cresswell 2006)。

這種空間與地方的差異，瑞爾夫 (Edward Relph) 稱之為《地方與無地方性》(Place and Placelessness)，亦即地方與真實性(authenticity)與非真實性(inauthenticity)之間的關係。若是一個之於個人有真實感的地方，它會使人內在且歸屬於地方，是不自覺對地方存在深刻的意義，即使先前可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環境、背景或日常實踐之上；相對地，如

果它是一個令人無法感知到更深層與具有象徵意義上的地方時，即是一個非真實性的地方，基本上也不存在著地方感了(轉引自 Pred 1983)。

段義孚 (Yi-Fu Tuan) 曾以「家」作為例子，說明「地方感」。儘管不同文化或歷史時期會有些許差異，但是人們總會對某些特定地方形成依附的情緒。若是附著的力量越強，情緒的感知也會越強。而且它通常又再藉由記憶或是實質上的景物，如符號、標誌等等，這種外在意象的給予，進而強化或加深人們對鄉土、對地方的認同感。所以每個人每天雖然都在不同的「地方」作停留，但卻無法對任何地方都能形成「地方感」，因為地方感的形塑仍然必須經過多重的建構才能達成。「家」對多數人而言，是個親切的地方，即使平淡、沒有絢麗的高樓大廈，也缺少了歷史魅力，但我們會自然而然的劃歸外與內，不喜歡外人去批評它，因為那裡對我們來說終究是個存在著特殊意義的「地方」(Tuan 1999)。這使得家相對於其他地方，存在著人類在情感上的依附與根植，常被當作意義的中心與關照的場域(Cresswell 2006)。

相對於前述以地方意義的討論，另一研究取向則聚焦於地方感形成的過程，而社會結構與日常生活等人們的「經驗」則是關注的焦點。法國都市理論家 Henri Lefebvre 在《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2000)與《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1991)這兩本書中，承襲馬克思(Karl Marx)的使用價值理論，將之延伸至空間研究。他認為社會空間(social space)係相對於抽象空間 (abstract space)，而這兩者之間又存在著邊緣與中心的對抗關係。社會空間由社會關係所生產，卻同時生產著社會關係。構築這一切的即是人類在常日的記憶與生活，使得社會空間就如同前述提到的地方一般，是生活和有意義的空間。反之，抽象空間(abstract space)則是透過權力、知識相互交織所建構的，也是統治者、空間規劃者，或說是國家權力下的空間(Lefebvre 2000)。在這樣的觀點下，一個特定的地方其實是一個有著管理、支配與抑制下的戰略性政治生產空間，通常這種地方是伴隨著經濟成長的過程和政治發展，而且在政治發展之中又涉及到國族意識形態和領土空間的國家化。所以，一個地方除了地域性之外，也會同時受到時空背景，歷史意義等等的影響 (Lefebvre 1991；Yong 2013)。不過，即使社會空間與抽象空間為對立的兩面，但這並不意謂二者在真實的社會中，是兩個互斥的現象，因為在一地方的運作之下，仍無可避免的會有權力關係的介入，更甚者權力又可能是影響地方型塑的關鍵角色之一。

這種人們藉由日常生活中不斷進行操演，從而形塑地方感的過程，西蒙（Seamon 1979）生動地譬喻為「地方芭蕾」（place ballet）。經由反覆不斷的操演，人們更認識地方，並覺得自己也是地方的一份子，從而建立了內部歸屬感(Cresswell 2006)。但對於普瑞德(Allan Pred)來說，地方是處在一個不斷「流變」(becoming)的狀態之下。因為社會是動態的，存在著一種連續不斷的過程，在一個地方中一個個反覆制度化的活動中，也同時會造成接連的再生產，包含在結構下的存在與修正（Pred 1983）。

歸結上述關於地方的討論，可知道「特定空間」固然構成一個限定的範圍，但是在這之中若缺乏地方自身的運作與實踐，空間終究只是空間，無法形成地方。而空間構成地方的過程中，也是一個多重建構的狀態，除了符號、記憶的反覆再現之外，人類本身在這個地方的活動、儀式的延續，一方面是建構地方感時不可忽略的要素，同時也促使了地方能維持不斷變化的可能。不過在這改變的過程中，國家和其他社會力的影響也不容忽略，因為當代社會的地方終究無法是個完全封閉的空間。

(三) 集體記憶

從地方繼續擴展至集體記憶的討論可從西方社會集體記憶的創始者 Maurice Halbwachs 的理論架構談起。

Halbwachs 在《論集體記憶》一書中，開宗明義即提到「人類通常得在社會之中才能獲得他們的記憶，也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能進行回憶、識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Halbwachs 2002：68-69)對他來說記憶並非個人獨有，還需要透過他人或外在所喚起，以及放在社會環境中來探討，是屬於一種集體的社會行為。因此，「集體記憶」的構築必須建立在一個社會框架之下。但這個記憶框架既不是以空洞的形式，由別處記憶所填入，也並非是依循個體記憶所建構；反之，集體框架是一個工具，致使集體記憶可用來重建過去的意象，但在每一個時代中，這些意象勢必都與當時社會的主導思想一致 (Halbwachs 2002)。

不過由於 Halbwachs 承繼了涂爾幹學派，著重社會意識的集體性，因而忽略了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聯性。但是這部分的内容卻可從英國的 Frederick Bartlett 與俄

國的 L.S Vygotsky 這兩位心理學家以個體為主的討論，來補足 Halbwachs 在集體記憶研究中對於個體記憶這部分的内容。在 Vygotsky 的研究中，他曾針對不同年齡的兒童記憶模式做為比較，發現人的記憶可分為基礎與較高層的兩個層次心理功能。前者是人最根本的自然記憶方式，而後者這種較高層次的記憶則是透過語言、文字等等的方式來傳遞。人也透過學習這些工具，獲得較高層的記憶功能。所以成年人的記憶，其實無法離開社會、文化與群體的集體記憶行動。而 Bartlett 在記憶研究上的討論為「概圖」(schema) 的觀念。其解釋「概圖」就是過去經驗與印象的集結，如同在社會中的每個群體都存有一些特別的心理傾向，而這種傾向也會影響群體中的個人對外在事物的觀察，以及藉由過去的記憶來印證自己對世界的印象，進而在經驗與印象交織之下，形成個人心中的「概圖」。簡言之，Bartlett 認為，社會組織提供了一套記憶的架構，能讓相對於過去發生的事實中受到扭曲或錯誤的記憶，在當前可以合理化的手段 (Bartlett 1932；轉引自王明珂 1993)。

承接上述提到集體記憶可能會受到社會組織或是特定的社會情況，重新建構、詮釋或選擇，以用來解釋當前或過去的事實這點繼續延伸討論，會發現「歷史」其實也是透過這套模式，被創造出來。因為過去的事情早已無法如實地重新再現，使得歷史往往只能利用人類遺留下來的記憶片段或是照片、傳說、文獻等等形式來重塑，但這些所存有的記憶與資訊，仍是在一個被選擇留下的過程或架構中出現的，才得以符合現實人群所欲擁有的共同利益或重塑這段歷史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之下，當族群為了凝聚或解釋當前的社會關係時，集體記憶可能也會再藉由遺忘舊有的記憶來達成，造成世代上的認同變遷，關於這點英國人類學家 P.H. Gulliver 稱之為「結構性健忘」(structural amnesia) (Gulliver 1995；轉引自王明珂 1993)。雖然這種結構性健忘存在於歷史文獻上的散失或是記憶於口頭傳承上的中斷，但最主要還是受到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如同在家族史的傳承之中，當長輩受限於當代社會或是其他原因，選擇性的向下一代敘述或是刻意隱瞞歷史時，結構性健忘的情形和認同的世代變遷就有可能出現。不過，並不代表這些遺忘的記憶將會永遠的被拋棄，反之這段記憶只是先暫時被放置在被隱蔽的歷史文獻中，等待有一天當符合這段記憶的新現實出現時，這段記憶也將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再次被建構、論述，形成新的集體記憶(王明珂 1993)。只是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記憶或許擁有了

再被提起與建構的機會，但如果依然只能透過當權者論述架構下反覆地重新再現時，這類記憶是否也早已失去傳承的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主流記憶下的敘述。

再者，這種新現實可能又涉及政治力的鬆解或是由於擁有那段集體記憶的那群人受限於時代、團體、地域、階級等等的影響，讓「遺忘」似乎也在不自覺中成為了必然。致使集體記憶即使無論是否為一外在力量使之消逝，要再次地召喚和建構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集體記憶雖然是被「建構」的，但仍存在著不可任意性（王汎森 1993）。

因此，若是再引申討論 Halbwachs 所認為「集體記憶都必須要有一個時空界域來做維持」，意即需在一個社會脈絡與社會結構下才能支撐時，透過人類的書寫記錄、相片、文獻的記載，甚至是活動、慶典的舉辦，讓集體記憶或是歷史解釋得以不斷透過當代的社會運作延續下去。如同 Halbwachs 在《在福音書中有關聖地的傳奇地形圖》中提到「在每個時期，為了迎合基督教當時的迫切需求，適應其需要和願望，基督教的集體記憶都改造了它對基督生活的各種細節，以及這些細節所出現的地點的回憶」(Halbwachs 2002：407)。但這樣是否代表人類對於過去歷史的解釋就是現代主義式的？關於這點，美國當代社會學家舒瓦茲(Barry Schwartz)在解釋歷史時，則提出了異於 Halbwachs 的想法—過去的歷史並不是一個現代主義式和固定不變的極端。再者，對他來說「過去的歷史是一種持續和變遷、由連續和更新所組成的合成物」(Schwartz 1982；轉引自 Coser 1993：30-33)。

假如將過去的歷史視為和當代沒有任何關聯的外來事物時，集體記憶對過去的歷史也無法構成某一社群緊密連結的基礎。例如舒瓦茲於文中以美國總統林肯的例子指出，林肯在當代傳記中的形象和真正經歷過林肯那個時代的人們對他的印象是不太雷同的，但這並不表示對於林肯的這兩類形象就缺少了重疊與類似之處。相對的，集體的歷史記憶除了是累積的，也概括了現代主義的一面。現代建構出的林肯形象，是以一連續體的狀態交雜著過去與現在。早期對林肯的集體記憶或許強調他的鄉土氣息、樸實與親近，但後來則拉開了他既有的形象，強化他的驕傲與威嚴。從其中可發現前後之間的形象相去甚遠，因而意味著集體記憶其實一方面服膺現代的需求、處境，重新塑造過去或對過去的歷史產生新的看法，卻不可忽略地，歷史在過程中仍然還是處在一個連續不斷的狀

態下。所以集體記憶既是由過去累積起來的，也是在歷史過程中由不斷的插曲所建構出來的 (Schwartz 1982；轉引自 Coser 1993：32)。

綜合了集體記憶的理論架構，我們可以知道集體記憶從來就不只存在於個人，而是透過社會運作的過程反覆來建構。在這建構過程中，不同世代間有可能因為缺乏了反覆再建構的過程，使得記憶產生斷裂。同時，在建構的過程中，無可避免的會受到外力的影響，使得建構從來不單純。因此，過去存在於地方的集體記憶往事，除了可能會受到地方的變遷使之改變，另一方面如同前述提到地方在當代社會在空間上的不封閉，也隨之致使在政治力介入下的集體記憶因而產生新的詮釋。

(四) 地方、記憶與新村

討論至此，本研究認為，地方感的建構過程具體地呈現在集體記憶中，David Harvey 以他的家鄉巴爾的摩中的一個名為基爾福特的富裕白人社區，即為一例子。1994 年基爾福特發生的命案，在這個命案之後，社區欲尋求安全上的管制，所以把這裡變成一個嚴格限制出入與四周用柵欄圍住的封閉空間，以作為隔絕想像中不屬於社區內的黑人或低收入人群。在這之中，致使這個地方不只是個存在，同時意味著地方總是由社會強大的制度性勢力所建構，因此對 Harvey 來說，地方無論是以什麼外觀出現，它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Harvey 1996)。

Harvey 又進一步延伸在這種建構之中，地方、記憶與身分之間的連結，認為地方是集體記憶的所在。藉由享有共同記憶的一群人創造認同的場域，這使得地方建構了記憶，記憶也透過生產地方而變得具體。不過，這種地方記憶的生產，仍無可忽略其是在「競逐定義之爭論場域」下所誕生的，當身分發生改變，或是邊向未來的政治又被重新定義時，某些記憶因而受到壓制，同時有些則顯露出來(Harvey 1996)。因此地方的出現並不會一開始就有記憶依附其中，而是在犧牲其他記憶下所建構而成的(Cresswell 2006)。

將以上關於地方、記憶與新村三者之間的文獻綜合討論時，會發現其實可以將新村這個地方視為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來做討論。在這個討論架構之下，本研究中的 17 哩除了早已擁有既定的地理區位與歷史因素，再受到 1965 年新村管制時一個特定空間下

的形塑，使得這些 17 哩村民共享了新村管制時期的集體記憶與生活。但隨著近 50 年這個地方區域與經濟發展的演變，致使這裡無論在地景或是不同世代村民對於村落的記憶上，早已形成相異的面貌。

因此，本文欲藉由「17 哩」這個地方，從過去的歷史記憶作出發，以相異世代的新村人對於「17 哩」不同時期的觀點與記憶，試著討論地方如何建構地方感，而集體記憶又是如何在地方產生改變？並論述無論地方或是記憶的形成，絕非偶然，而是在一個連續的狀態下生生不息的進行著。

三、深入地方

(一) 進入田野

這個研究自 2012 年的夏天開始，正式進入田野是在 2013 年的一月，前後分別有四次的田野期程，加起來將近六個月的時間，至 2014 年的一月結束。

在這前後約半年的田野生活中，我直接住在 17 哩的村民家，在這裡經歷了多個華人重要節慶，包含農曆新年、中秋節，還參加了一場婚宴與數場宴席，以及馬來西亞約莫五年一次的全國大選，這些經歷豐富了我的田野，也讓我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同時，每天在村落中的生活，致使我對這個村落從陌生到熟悉，從不熟悉當地用語的台灣人，到最後也會在和當地人對話時自然有馬來西亞的華語腔調與用語出現，甚至後來村民們在日常言談間熟悉不過的客家話，對我再也不是鴨子聽雷。而村子裡的大街小巷，在我每天獨自騎著腳踏車不斷穿梭下，少了迷路的恐懼，多了親近可人的溫馨。

隨著我對這個村落越加熟悉後，我開始思考著 1965 年那件原本牽引著我選擇飛到這遙遠的異鄉進行碩士論文田野的「鐵鎚行動」，究竟真正對這個村落後來的影響有多少？因為很湊巧在我正式進入田野的第二天有著屈臣氏和肯德基的綜合型大商場正好在此村落中開幕，而且當時適逢華人農曆新年前夕，趕著辦年貨的外地人或 17 哩本地

的華人，以及住在鄰近新村旁聚落的原住民，無不蜂擁至這個新開的商場。使得這個正朝商業化發展的村落，絲毫見不到那段新村管制時期留下來的遺跡，僅存的只剩偶然瞥見的角落旁那殘破、爬滿藤蔓又生鏽的鐵絲網，但早已無法辨別原來這是當年包圍著新村隔絕內外有著重要意義的圍籬。

那麼這段對外來研究者來說，貌似很重要的左翼往事與新村初期艱辛生活的記憶，為何在村落中消失了？假使沒有特別提起，老一輩的村民並不會主動跟你述說這裡的過去，年輕人還會疑惑的問我說「為什麼妳會來這裡，是來這裡玩的嗎？」。直到我說明我來這裡的目的後，那段被鎖住的記憶，才突然間從老人的口中又真實地活了起來，他們鉅細靡遺地敘述著他們年輕時的不畏懼。可是對於年輕人來說，這一切似乎就是個過去的村落歷史，即使想透漏多一點資訊給我，也不知道要多說些什麼。

帶著這些逐一累積於田野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經驗，我開始確定了本研究將採行參與觀察，以及主要以 17 哩不同世代村民的深度訪談為主，輔以其他報刊資料作為建構當時期的歷史作使用。

關於深度訪談，我除了擬定了兩份訪談大綱，分別為用於不同世代的報導人訪談時使用之外，也在訪談之後撰寫田野筆記。針對訪談大綱的部分，第一份是訪談老一輩 17 哩村民時的訪談大綱，將重點放在新村管制前後階段的生活經驗與記憶，同時也概括左翼份子們，他們對左翼記憶這部分內容的訪談；第二份則是訪談 17 哩年輕人與中壯年人口的内容，主要著重他們離鄉與返鄉工作、定居的這點上，以及進一步追問他們對於新村那段過去的看法與理解。在訪談結束後，將訪談時的錄音檔謄打為逐字稿，用於本研究內文敘述時使用，最後整理出共計 28 份的訪談逐字稿，這些逐字稿在內文中的徵引格式為：(逐字稿編號 XXX 報導人口述訪談逐字稿，訪談日期)。而田野筆記的部分，則依時間撰寫了 42 份田野觀察紀錄，輔以在研究中參閱。

其他報刊資料方面，主要的資料來源來自砂拉越詩巫的華族文化協會所收藏之砂拉越文史工作者劉子政，在其生前留下經由華族文化協會後來依內容整理分類的各家砂拉越華文報紙剪報。我主要翻閱了 1963 年至 1973 年這段時期，被歸類為〈砂拉越共產活動〉的新聞，並尋找與新村有關之內容。同時，也在協會另外蒐集到近十五年內關於三個新村較為近代的專欄系列報導之剪報。

看著這些不同年代的報刊資料，斗大的標題寫著「鐵鎚行動管制區」、「新生村」、「共產份子」、「宵禁」、「晉連路 15 哩到 17 哩...」。乍看之下，這些內容確實是「17 哩」的過去，卻怎樣也無法跟現在的「17 哩」連結在一起。於是，我好奇的想問五十年前與現在的「17 哩」到底是在一個什麼樣的過程中產生轉變？

(二) 關於「17 哩」

1. 地理位置與人口規模

本研究中的「17 哩」，位於東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參閱圖 1、圖 2)的第一大省—古晉省(Kuching)，隸屬於其中的古晉縣(Kuching District)三個區下的新生村副縣(Siburan Sub-District)(參閱圖 3)，為副縣管轄的華人村落(Chinese Village)，在行政上有一個官方指派的甲必丹(Kapitan，似台灣的村長)負責處理村內行政與地方事務。

在地理區位上，「17 哩」正好位在古晉一條通往另一城鎮西連(Serian)的主要道路晉連路(Kuching-Serian Road)¹上的 27 公里處(參閱圖 4)。「17 哩」這個地名是以過去英國殖民時期所留下的 Mile(英哩)，或是以石頭(Batu)來做為測量距離遠近的工具，最後演變成晉連路上對於不同距離遠的區域後來的地名。不過在後來新村成立之後 17 哩(17 th Mile)的正式地名改為「新生村」(Kota Siburan)，馬來語與英文名為 Siburan。但多數的 17 哩人或是外地人，至今仍稱這裡為「17 哩」，因此本文中主要還是以「17 哩」這個地名稱之這個地方。

而與 17 哩在歷史上，相同時間點成立的另外兩個新村分別位於晉連路的 33 公里與 35 公里處，被稱為 21 哩、22 哩，新村成立後則命名為「來拓村」(Beratok)、「大富村」(Tayah)(參閱圖 4)。

¹ 古晉西連路(Kuching-Serian Road)過去為古晉成邦江路(Simanggang Road)，後才改為現名。



圖 1 馬來西亞地圖

圖片來源：<http://www.answers.com/topic/malaysia>



圖 2 砂拉越州地圖

圖片來源：<https://mandyandtheworld.wordpress.com/tag/sarawak/>



圖 3 古晉第一省地圖(整理後由本文作者再製)

圖片來源：<http://cforum3.cari.com.my/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831>



圖 4 三個新村地理位置分布圖

圖片來源：截圖於 Google Map 後由本文作者繪製

由地圖上可知，過去三個新村雖然被劃定在不同的三個區塊內，但實則往來密切。再者，三個新村年紀稍長的村民，不僅共同經歷過新村管制時期，在方言群的分類中，這個區域內的華人，也多數為客家人，因此往來互動中都以客家話為主要交談語言，同時也保留了客家傳統菜餚與節慶時的祭祀禮儀。

另外，目前三個新村中一地理面積的大小與人口數之規模，最大的為新生村有 290 畝，其次為大富村 185 畝，最小的為來拓村 140 畝(林煜堂 2009)。而新村成立初期與目前約略戶數與人口數可參閱表 1。

表 1 三個新村戶數與人口數資料

村名	新村初期戶數	2011 年新村人口數	2011 年新村戶數
新生村 (Siburan)	500-600 戶	12000 人	1300 戶
來拓村 (Beratok)	200 戶	4000 人	330 戶
大富村 (Tapah)	439 戶	4000 人	600 戶

資料來源：星洲日報，鐵鎚行動下三華人新村誕生 <http://www.seehua.com/node/3628>，資料取用時間：2013/12/11。

2. 17 哩的客家人

關於前述提到 17 哩與其他兩個新村的村民多數為客家人，這部分的内容可追溯到 19 世紀中期開始到 20 世紀 70 年代這段時間。19 世紀中期有大量的客家人移入砂拉越，這和更早期在西婆羅洲(West Borneo)盛行的採金工作有關，吸引了許多客家人遠渡重洋來到東南亞地區，也致使砂拉越在 1830 年左右，就有許多間華僑金礦公司成立，包含石隆門十二分公司、英格里利十五分公司等等。不過早期的這些客家移民，一開始雖以採金為業，但後來隨著金礦業衰弱，以及受到 1857 年的石隆門華工事件的影響，這些客家移民才慢慢從石隆門(Bau)遷移到古晉及成邦江路(Simanggang Road)一帶的鄉村開

墾拓殖，從稻米、甘密種植開始，到比較晚期才改種植胡椒和橡膠(饒尚東 1995；田英成 2006)。

這些客家先民在後來會遷移到古晉的郊區改為務農也和他們在中國原鄉的工作有關，同時在方言群群聚的影響下使得客家人多分布在古晉的郊區，不如其他方言群，如：福建、海南等方言群都集中在市區居多。在田汝康於 1948 至 1949 年於砂拉越的研究中，即指出在當時古晉客家人的分布，大約只有 16%的客家人住在古晉市區，其餘還是散居在古晉郊區，同時他也進一步說明了這些在古晉郊區的客家人，更細部的籍貫差異分布。他以貫穿砂拉越的主要幹道成邦江路從古晉(Kuching)至西連(Serian)沿途的客家地區做籍貫紀錄。其中在現今三個華人新村的客家人尚未遷入新村之前所分布的 15 哩至 24 哩地區，以惠來(Hweilai)、河婆(Hoppu)、陸豐(Lufeng)這三個籍貫的客家人為主。而更遠的 24 哩至 35 哩地區，則僅有河婆客家人分布於當地。這顯示了，方言群下的籍貫分布還是有所謂的根據地(Home base)在匯聚著這些同籍貫、姓氏的客家人(Tien 2004)。

從上述的研究中，說明了早期古晉郊區客家人在籍貫上的分布情形。但後來隨著 24 哩到 35 哩地區的河婆客家人因為生活、經濟因素，陸續搬到 15 哩至 24 哩地區後，再伴隨 1965 年的新村人群集中管制之影響，讓河婆客家人成為三個新村分布最多的客家籍貫群體。這似乎也能對應到目前三個新村的村民，無論年輕一輩或是老一輩的村民，即使有少數人是陸豐或惠來的客家籍貫，但在日常生活溝通時，主要還是以河婆客家話為主，鮮少再使用陸豐或惠來的客家話的原因。

同時，也因為客家人佔這三個新村絕大多數的人口比例，使得原本被遷移至 17 哩新村管制區的其他方言群，如潮州人，也被影響用河婆客家話溝通。進而讓其他少數方言群的方言，在現今通常只存續於家內溝通，甚至不再使用了。

3. 17 哩的原住民鄰居

17 哩雖然是一個華人客家村落，但早在新村成立之前，原住民達雅族(Dayak)中 Iban 人的村落(Kampung)就已比鄰在當時的客家人生活圈旁，也會至 17 哩當時的商店區購買生活用品。再者，17 哩鄰近區域的客家人，也會因為土地栽種面積不敷使用，向原住民

承租土地種植作物。在這些來往互動間，也促成 17 哩的客家人與原住民通婚的情形出現。

即使後來在新村管制時期，原住民無法再像過去不受限制的進出華人生活區域，只能趁每天新村大門開放時進到新村商店區採買日常必需品，卻絲毫不影響這些原住民與客家人之間的往來互動。因此，當新村管制解除後的現在，在 17 哩的日常生活中，許多原住民仍然會在村內的商店區活動，或是當華人商店的雇工，在村內的市集(Pasar)、咖啡店(Kopitiam)、小販中心或經常大排長龍的彩票行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

時至今日，當地原住民和 17 哩華人村民主要居住的地方還是因族裔界線分隔在不同區塊，不僅就讀的小學、幼稚園不同，在文化和主要語言上也有所差異。但隨著部分原住民父母將小孩送至 17 哩的華文小學接受華文教育，以及 17 哩政府公辦的國民中學原本就沒有再細分族群就讀，讓他們彼此間早已就視對方為生活中的一部分。如同當華人農曆過年時，鄰近的原住民們也會到廣場上，和 17 哩的村民一起迎接新年的鞭炮聲和天空中五光十色的煙花。而原住民六月底慶祝屬於他們的新年(豐收節)時，17 哩的村民也會順道去拜年。

在這種村落氛圍之下，17 哩實質上早已不是單純的客家村落，這也讓 17 哩這個地方更為豐富、多元。

(三) 田野中的報導人

在本研究中，是將「地方」作為一動態事實來做討論，並關注這個村落內不同世代與背景之村民的異質性。所以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我將報導人大致分為兩類，主要以世代作為主要劃分，分類方式則是以 1965 年新村成立之前與之後出生，現齡約 50 歲以上與以下的兩代村民做基準。採行這種分類方式在於欲了解曾在成長過程中經歷過新村管制階段與不曾經歷過管制階段村民，他們對於 17 哩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是否因而有所差異。

當報導人以世代區分之後，前者有經歷新村管制時期的報導人又可再細分為曾參與過左翼運動與沒有參加左翼運動的人。由於在過去的研究中，通常沒有再特別去關注這

其中的異質性，但在田野初探時，我發現了這兩類背景的 17 哩村民他們對左翼運動與新村管制時期的敘述，呈現了相異的詮釋與論述。

在全部的深度訪談中，我共訪談了 30 位報導人，其中 24 位為 17 哩的村民，另外 6 位則是為補充歷史背景資料的不足，另外訪談了曾經或現在住在其他兩個新村的村民。

30 位報導人，在本研究內文敘述中，皆以匿名表示。相關整理內容如下：

表 2 17 哩 50 歲以上報導人

曾參與過左翼運動者			
報導人	年齡	性別	簡要背景
1.溫爺爺	71 歲	男	五歲時搬到 17 哩，後參與左翼運動，而被捕入拘留中心。現在還繼續住在 17 哩。
2.蘇爺爺	80 歲	男	原本不是出生在在 17 哩，只是父親在 1960 年代即在 17 哩買房子。 後來因參加人聯黨，接濟左翼份子，而被捕入拘留中心。離開拘留中心後，才搬到 17 哩住。
3.鍾爺爺	70 歲	男	原本為 16 哩人，參與左翼運動被捕入拘留中心。後來因新村管制才搬到 17 哩住，現在還繼續住在 17 哩。
4.余婆婆	70 歲	女	出生雖不在 17 哩，但父親於她 8 歲時舉家遷移到 17 哩做生意，後來一直住在 17 哩，並曾參與過左翼運動。
5.李婆婆	68 歲	女	在 17 哩出生、長大，也嫁給 17 哩人。20 歲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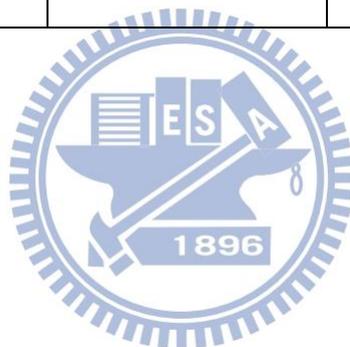
			順應 17 哩潮流參與左翼運動。
6.黃爺爺	80 歲	男	原本為 15 哩人，從年輕時即熱烈參與左翼運動，後被捕入拘留中心。因新村管制才搬到 17 哩住，目前也繼續住在 17 哩。
未參與過左翼運動者			
1.余爺爺	71 歲	男	出生在 18 哩，後來 18 哩的店火燒後，1950 年代末期父親舉家搬到 17 哩，隨後經歷了新村管制時期。
2.彭先生	60 歲	男	出生在 18 哩，1950 年代末期，政府為開發 17 哩，而將 18 哩商店遷移至 17 哩。所以他們全家開始搬到 17 哩住，並經歷了新村管制時期。
3.官爺爺	76 歲	男	原本是 15 哩人，因新村管制搬到 17 哩。
4.官阿姨	約 70 歲	女	原本是 15 哩人，與官爺爺是兄妹，所以也在新村管制時搬到 17 哩。但之後嫁給別的地區的人，所以住了一年後搬出新村。
5.陳先生	60 歲	男	原本是 15 哩人，因新村管制搬到 17 哩
6.田先生	60 歲	男	原本是 22 哩人，因小時候跟隨父親到 17 哩做生意，後來在新村管制後住在 17 哩。
7.鍾先生	56 歲	男	原本是 18 哩人，後因新村管制搬到 17 哩
8.彭 2 先生	60 歲	男	出生在 17 哩，之後經歷了新村管制。

表 3 17 哩年輕與中壯年報導人

報導人	年齡	性別	簡要背景
1. Anna	35 歲	女	在 17 哩出生、長大，後來也留在 17 哩附近區域工作。
2. 小家	35 歲	女	在 17 哩出生，但父親原本是 15 哩人，是在新村管制後才搬到 17 哩的。20 多歲時，曾去新加坡打工，十年前選擇回來 17 哩工作。
3. 田小姐	35 歲	女	在 17 哩出生、長大，後來也留在 17 哩工作，但現在因工作地點換到別的地方，沒有住在 17 哩。
4. 阿彬	25 歲	男	父親為 22 哩人，但後來到詩巫工作，所以他出生在詩巫。但後來因某些因素，在他小學四年級時父親選擇回來家鄉工作後，就住在 17 哩。
5. 阿興	25 歲	男	從小出生、長大到 17 哩，父母皆是 17 哩人。
6. 阿程	25 歲	男	從小出生、長大到 17 哩，父母皆是 17 哩人。
7. 阿新	25 歲	男	從小出生、長大到 17 哩，但父親原本是 15 哩人，因新村管制才搬到 17 哩。
8. 阿德	35 歲	男	從小出生、長大到 17 哩，父母皆是 17 哩人。現在 16 哩中學教書。
9. 彭小姐	約 37 歲	女	從小出生、長大到 17 哩，父親為 17 哩人。
10. 老二	約 45 歲	男	從小出生、長大到 17 哩，父母皆是 17 哩人。

表 4 其他和新村及左翼運動相關問題訪談之報導人

報導人	年齡	性別
1.本固魯溫先生	大約 62 歲	男
2.甲必丹鄧爺爺	大約 70 歲	男
3.市議員何先生	大約 45 歲	男
4.農業部劉先生	大約 50 歲	男
5.F 先生	70 歲	男
6.F 太太	70 歲	女



四、章節安排

由於本研究欲將「新村」用「地方」的視角來省視當地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的形塑與變遷，同時認為「地方」是在一有機體的狀態下保持其動態的發展。因此，在本文的章節安排上，將以貫時性的方式，串聯各章節。

主要分成三大部分，為兩個世代的内容。第一部分為第二章新村成立之前的歷史背景，由於 17 哩相對砂拉越另外兩個鄰近的新村在於這個新村的區域範圍早在新村成立以前，就已經有以河婆客家為主的人群散居於此種植胡椒、橡膠等等作物維生，還有當地華人自行募款成立的華人小學、中學，同時這裡已有小規模的商業活動，在 1950 年代這個區域的商業區就約有 30 間華人開設的商店。顯示了在討論這個新村個案以前，並不能只從新村成立後的部分作探究，仍需追溯新村成立以前，當地的樣貌。因為國家在左翼行動發生後，利用公權力形塑的新村空間，依然是在原有的地方基礎下建構的。但相對於其他的村落，這個村落的特殊性在於這裡的人群他們還擁有著異於他人的左翼運動與新村管制區下的集體記憶，只是這段記憶也隨著時間、村落的變遷，以及其他社會因素隨之改變。

第二部分為第三至五章，內容從老一輩新村的記憶與生活經驗談起，依照時序分為三章來敘述。在第三章中，以新村成立以前曾住在 17 哩鄰近區域的村民，他們參與左翼運動的記憶為主要内容。隨後，在第四章的内容中，藉由 17 哩新村村民的深度訪談說明他們對於新村成立初期的生活經驗與記憶，進而延續討論到他們對於新村之地方感上的轉變。第五章則接續第四章提到的地方感，闡述這種地方感，如何在這個村落中生成，同時對過去新村生活與左翼活動的集體記憶產生什麼樣的轉變。

第三部分為第六與七章，以 17 哩 50 歲以下的年輕與中壯人口為主體，討論他們異於老一輩 17 哩人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第六章藉由討論新村年輕與中壯人口離家或歸鄉的原因，分析年輕與中壯人口對於 17 哩的地方感是如何生成的。第七章則呼應了在第三章、第四章提及的老一輩 17 哩人的左翼運動與新村生活記憶，說明這一記憶在未

曾經歷過那段歲月的 17 哩人身上的轉變，並進一步探討致使這類集體記憶在他們身上失憶的原因。

第八章為結論，說明了地方扮演著一社會建構的動態角色，除了透過其中的運作生成地方感，也能藉由建構的方式致使集體記憶產生轉變。



第二章 歷史背景

在過往的歷史上，砂拉越雖然遺世獨立於馬來半島，但 1963 年的馬來西亞計畫，再加上冷戰時期左右兩派陣營的角力戰，致使鄰近印尼親左蘇加諾(Soekarno)政權²，以及強行被納入馬來西亞聯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的砂拉越，逐漸興起了一波波反殖民、反帝國主義運動(Yong 2013；林煜堂 2009)。在這些運動中，又以鄉村的華人最為活躍，也讓原本平靜的農村，自此產生了變化，而前述提到的三個新村亦是。但其實在新村成立以前的 1950 年代，這個區域原本是個遍布胡椒園、橡膠園的鄉村，人口散居不集中，多數為河婆客家人(Hoppu Hakkas)，在當時只有鄰近小學的地方才有少數幾間的店屋，商業發展尚不顯著(杜明 2008)。直到 1965 年，馬來西亞聯邦政府沿襲了馬來半島抵制左翼運動的方式，也在砂拉越左翼運動發展最蓬勃的地區實行了戒嚴管制，並成立了三個華人新村，限制管制區域內的華人必須全部搬遷至新村居住，才使得這三個聚落，從原本散居的鄉村，在重新規劃後變成了家戶密集的聚落，因而有了全新的面貌，也隨著時間逐漸演變成現今商業新興發展的小鎮。

本章將以既有的文獻資料與實際田野的訪談資料，將我所田野的這個 17 哩新村在整體村落發展的歷史背景做一全面的概述，以建立這個村落的基本樣貌，同時說明 17 哩這個地方的形成，並非是在新村管制區成立之後才存在的。

² 印尼的蘇加諾總統在 1963 年起與馬來西亞進行了三年的「馬印對抗」。起因於 1963 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結合了過去英國在東南亞殖民地，包含馬來半島、新加坡、婆羅洲北部的沙巴和砂拉越。但蘇加諾認為英國這種做法不僅保存了廣泛的經濟利益，也將新加坡作為其海軍基地之一，同時又罔顧北婆羅洲人普遍反對加入馬來西亞的輿論。再者，致使蘇加諾如此強烈反對的背後原因在於印尼為本區域最大的國家，但英國在規劃這件事情時竟未向他諮詢。另一方面，蘇加諾在後來政治態度上的親左，使得鄰近印尼的砂拉越在當時爆發的一系列左翼運動也和印尼有緊密的連結關係 (Cribb、Brown 1997)。

一、成邦江路上的椒園村落

(一) 華人來到砂拉越

砂拉越華人的歷史可追溯到 19 世紀，當時砂拉越政局紛亂，於是在 1841 年原本由汶萊所統治的砂拉越，便被汶萊蘇丹割讓給英國的布魯克家族，並封詹姆士·布魯克 (James Brooke) 為「白人拉惹」(White Raja)，而在砂拉越開啟了長達一百多年的統治 (陳鴻瑜 2012；Chang 2008)。在其統治期間，拉惹為了要促進當地貿易，於是鼓勵華人移入砂拉越進行開發、採礦，而這些華人又以客家移民居多。再者，由於砂拉越古晉南部的石隆門(Bau)盛產金礦，所以來自中國的採金華人多移入此地。再加上 1850 年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後，許多失敗的群眾多往南洋逃亡，致使石隆門一帶，反而成為一個中國村落，且採取自治、不受政府管制。因而在 1857 年讓白人拉惹決定加強對當地的控制，而與當地華工爆發激烈衝突，為著名的石隆門礦工事件(劉子政 1996；饒尚東 1995)。

在這件事之後，雖然對布魯克家族產生衝擊，不過後來其仍然繼續拓展領土，並對砂拉越穩定持續統治。直到 1941 年，二次大戰期間，才被日軍佔領了砂拉越三年，但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日軍在太平洋戰事上失利，也連帶的影響了砂拉越當地的社會狀況，讓戰後的砂拉越滿目瘡痍。使得之後回來再次統治的布魯克家族因無法負擔砂拉越戰後的復原工作，所以決定將砂拉越讓渡給英國，讓英國從間接統治轉為直接統治 (陳鴻瑜 2012；于東 2009；黃紀鄰等 年代不詳)。

而在此時的砂拉越華人，歷經了日本殖民統治，也興起過一波波的抗日運動，即使隨著二次大戰結束，砂拉越雖重回英國人手中，但卻在這些過程中，致使鄉村的華人開始在心中埋下左翼運動的種子，往後也揭起了許多次的革命活動，嚮往要脫離英國，甚至建立自己的國家。不過，戰後的紛亂，讓許多客家華人只好再次去尋找砂拉越這塊土地其他更適宜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於是他們陸續又來到了古晉的郊區，繼續開始務農、種胡椒的生活，也將原本蠻荒、渺無人煙的地區，慢慢地開發，形成一個又一個華人聚落(杜明 2008)。

(二) 椒園村落的形成

由於 20 世紀 40 到 50 年代，戰後胡椒缺乏，供不應求，許多人於是口耳相傳連接古晉到西連的成邦江路(後改為晉連路)上 15 哩至 25 哩處有幾塊區域，土質肥沃又平坦，正好適宜胡椒的栽種。隨著胡椒價錢不斷上漲，許多華人也紛紛攜家帶眷到這裡開闢新生活，使得短短兩年間，當地的人口瞬間激增，華人聚落也應運而生(杜明 2008)。

就是要往義山的那條路，以前叫做石山路，上面有個大石山，開採石頭的，石山路那邊以前很多外地的人來這邊種胡椒。這邊這條路一直通到 18 哩，有一條義山路，那邊進去通到八督港，華語叫做新漁港。可能就是這邊很多人在這裡種椒，他聽來聽去...就想說這個地方好還是什麼的，因為很多華人聚居在這邊。海外(古晉近海郊區)³的也上來...其他什麼地方的人也搬來這邊種椒，所以我爸爸也搬到這邊來囉！

(130904_002 溫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4)

這幾個華人聚落大部分都是以胡椒園為主要種植作物形成的。在成邦江路沿線大約可分為幾個以商店區為聚集的華人聚落，分別是 15 哩、17 哩、19 哩、21 哩、24 哩，而這幾個聚落也是之後三個新村的前身。下文將依照時序針對砂拉越文史工作者杜明在這個區域於文獻上較為全面的整理與編撰的《砂拉越晉漢省一華校春秋》(2008)一書，提及這五個在新村成立前的聚落，以及過去這些村落村民的口述訪談來對過去這段歷史作進一步的補充與敘述：

1. 河岸邊的 24 哩

在這些客家華人聚落中最早發展的應為 1934 年就已經有華人移居的 24 哩，由於 24 哩緊鄰河邊，也是這幾個聚落中最接近河川的地方，當時因尚未興建通往古晉市區的成邦江舊路，因此當地的華人只能倚靠附近的路橫港(後改為西林河(Sungai Sirin))與其他地方往來。而這個聚落逐漸形成是因為有越來越多的華人陸續搬到這邊務農後，也帶起了其他華人商人在這邊成立店鋪，直至 1950 年代當地已有 18 家商號的出現。之後這個

³ 本論文中所徵引之逐字稿若有特別括號的內容，皆為作者用以說明、補充之用。

河邊的小鎮，隨著人口的增長，也慢慢有了水口伯公的地方信仰、慈善會社組織以及小學的成立。但 1965 年成立新村之後，政府選擇將 24 哩小鎮的華人全部遷移到 22 哩的大富村，致使人去樓空的小鎮只剩下杳無人煙的蕭瑟與淒涼。

2. 曾經熱鬧的 19 哩

在二次大戰之前，19 哩的晉連路路旁即有一條通往裡頭原住民聚落的小路，在這個小路緊鄰大路的路口，當時已有兩間華人商店，且當地的華人也於 1947 年創立了 19 哩中華公學。後來在 1952 年，隨著英國殖民政府欲在這裡規劃興建小型市鎮，使得最初兩家店在晉連路對向的地方，也興建了六間商店，讓這裡也成為一個小型市集，甚至在 1960 到 1965 年這段期間，19 哩中華公學的學生總人數都達到了 150 名以上。不過，當 1965 年三個新村成立後，這個區域原本散居種植胡椒、橡膠、蔬菜的華人，以及原有的商店區，也因被迫遷到後來 21 哩的來拓村居住，使得這個聚落被迫消失了。

3. 從胡椒園到城鄉計畫下的 17 哩

相對於河岸邊的 24 哩與曾經也是被規劃為發展區域的 19 哩，位於成邦江路路旁的 17 哩大約在 1942 年以前即有幾間簡陋的華人店家，爾後隨著舉家遷移來當地種胡椒的人逐漸增多，店家也在路旁增加到 12 間店。後來 1952 年英國殖民政府也選擇在此進行城鄉發展計畫，在當地又興建了六座，以 U 字型為主要規畫的五間雙層木板店屋；同年，當地商人也在 17 哩成立戲院。到 1957 年後，因 18 哩店屋的火災，原本 18 哩的商家搬到 17 哩後，又使得 17 哩的店屋到當時已達到 40 間之多。陸續政府又在當地設立警察署、農業部與診療所，同時當地也因人口聚集，開始有熱心的地方人士籌設慈善組織，而有了「古晉成邦江路聯合慈善社」與「古晉西連路互助社」等組織的出現。因此，17 哩在新村成立以前，除了種椒業發達外，也成為成邦江路上商業發展最蓬勃的小鎮。

4. 日軍遺留下的 21 哩

二次大戰爆發後，日本軍隊佔領砂拉越三年八個月的時間，也來到了古晉的郊區。他們選擇了 21 哩作為補給的重要基地，大量的招募工人到此地來耕種作物，以供後勤所需。同時，在當地興建了大型建築物，作為辦事之用途。但當 1945 年日本戰敗後，來自四面八方的工人有人選擇留下，也有人離開。當地雖然失去過往的熱鬧，但原本日

本所留下來的建築物，被當地華人再次利用，開闢店面做起生意。再加上原本散居在附近的華人，得知當地的土質肥沃，適宜種椒，又讓這裡恢復為人口密集的胡椒種植區。此外，如同 24 哩擁有水口伯公的地方信仰，在 21 哩也有一個中央伯公被當地人所供奉。

5. 潮州人和客家人共同居住的 15 哩

15 哩這個區域也像其他幾個聚落在 1940 年代於日本投降後，有許多華人於此定居，並沿著晉連路的路旁興建了 20 間商店。但相對於另外幾個聚落，15 哩因距離古晉較近，所以這個聚落除了客家人之外，還有潮州人居住於此做生意⁴。如在 20 間商店中，據過去 15 哩村民陳先生口述，其提到當時所開設的 20 間店，客家人和潮州人各占一半的店數。不過，在 15 哩其他郊區的地方，則是以務農為主的客家人或是原住民的居住地。

而在聚落慢慢形成時，鄰近 15 哩的華人也慢慢有屬於當地的地方信仰出現，如興建在過去 15 哩商店區於晉連路對向的永真宮(真君大帝廟)即是。



(三) 華人小學的成立

在聚落形成之後，隨之面臨了小孩適齡後在就學上的問題。在 15 哩至 25 哩之間，1940 年到 1965 年新村成立之前，在這個區域內曾經陸續有六所華人小學、一所中學成立，分別為 15 哩、17 哩、19 哩、21 哩、24 哩的中華公學、17 哩中華公學巴都港分校，以及 17 哩民眾中學⁵。

由於當時砂拉越還適逢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所以這幾間學校都是當地華人農民考量到自身子女就學不便，於是在鄰近聚落中各自籌款所設立的小學，以提供附近的小孩能擁有受教育的機會。而老師則多是招募由在二次大戰後從中國移居來南洋的教師，這些

⁴ 在砂拉越過去以方言群為主的職業劃分脈絡下，15 哩的潮州人雖住在古晉的郊區，但相對於這個區域分布較廣且以務農為生的客家人，潮州人多數還是以經商、開店為主，而這點差異也表現在當時這個區域的潮州人和客家人他們的政治傾向上。潮州人多半支持 1962 年在英國殖民政府主導成立用來與人民聯合黨相制衡的親右政黨砂華公會(Sarawak Chinese Association, SCA；簡稱砂華)，所以砂華公會的成員主要還是以潮州或詩巫的福州人為主體。反之，1959 年成立的砂拉越人民聯合黨(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SUPP；簡稱人聯黨)，在創黨初期的成員組成上則是客家和福建人，並在當時扮演著親左政黨的角色，吸引了鄉村受到中國革命思想浪潮的農村客家人加入(龔宜君 2004)。

⁵ 關於這些聚落中的華人小學與中學更為詳盡的內容，將會在之後於新村成立之後的章節中作進一步的敘述。

教師除了將中國的文化與教育帶來了南洋，同時也將當時新中國成立的思想傳進砂拉越，使得這些農村的孩子，接收到這些不同於以往的新思維且深受影響，甚至之後因而願意獻身於革命或是為社會有更多的奉獻。

(四) 起義的小延安

前述提到砂拉越在歷經了英國布魯克家族的統治，以及日本與英國的殖民統治後，英國卻為了維持其殖民統治利益，於 1961 年提出「馬來西亞計畫」，欲進行馬來亞、新加坡、砂拉越、汶萊及北婆羅洲的合併計畫(黃建淳 1999)。這使得砂拉越的華人興起一波波反對浪潮，位在古晉郊區的華人，更因為從小受到來自中國教師左翼思想影響，以及這個區域也是當時砂拉越人民聯合黨(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⁶黨員活躍的地區之一，再加上這邊緊鄰印尼邊界，在馬印對抗時期，這裡也被賦予了重要戰略地位，使得這邊儼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初始地的小延安(于東 2009；盧友愛 2012；林煜堂 2009)。

許多農村青年，紛紛投身左翼運動，參與地下組織。而這個區域內的華小、中學，也在地下成立了許多學習小組⁷與歌詠隊⁸，作為之後參與武裝鬥爭的人力。除了青年之外，在當地許多老一輩的華人，在政治上也多為左傾思想，即使沒有實際參與武裝鬥爭，也會默默在暗中幫助地下活動的人。致使在當時，整個農村的氛圍也以左傾為主，雖然有部分華人支持右派政黨，如：砂拉越華人公會(Sarawak Chinese Association)，卻仍然無法抵擋左派的力量。

⁶ 人民聯合黨簡稱人聯黨，創黨之初為砂拉越左派色彩較濃厚之政黨。關於人聯黨的相關內容，在本文第五章中有較為詳細的敘述。

⁷ 學習小組為當時學校課程外的課餘社團，也是當時左翼運動在校園中的地下組織。主要會在課後時間共同研讀與討論共產黨、左翼運動相關之書籍，同時這裡也是培養左翼幹部的重要社團之一。

⁸ 歌詠隊是活躍於當時鄉村年輕人的娛樂性社團，也是左翼組織的一部分。主要活動內容雖為唱歌、跳舞等等聯誼活動，但歌曲內容還是以左翼相關歌曲為主。參與者在之後也多數會成為左翼運動的地下成員。

二、鐵絲網下的新村

當 1963 年 9 月 16 日砂拉越正式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後，砂拉越的左翼運動並沒有因此停擺，反而轉入地下繼續活動，持續的進行「反大馬」(反馬來西亞聯邦)運動。而 15 哩至 24 哩區域因為鄰近印尼邊境，與印尼來往密切，進而成為左翼活動的中繼站。再加上當地左傾的華人多數聚集於此，早已成為當時馬來西亞聯邦政府關注的地區之一。

但在 1965 年 6 月 27 日當晚，以印尼國民軍及西瓜哇特種部隊所組織起來的隊伍，聯合了砂拉越古晉的地下活動份子，原先計畫要攻打古晉機場，但考量到攻擊後退守不易，改對 18 哩的警察署發動攻擊，不僅毀壞了警察署的通訊設備，還炸毀了 24 哩的橋樑，以阻擋政府軍隊的進攻。但這些參與活動的左翼份子，其實並沒有料想到這次的攻擊行動，會造成八人死亡、多人輕重傷，同時死者之一又剛好為當時砂拉越首席部長加隆寧甘(Kalong Ningkan)的胞弟，以至於引起政府開始對當地進行大規模的戒嚴管制，名為「鐵鎚行動」(Operation Hammer)。同時政府也將附近地區劃定為管制區，要求原本住在鄉村裡的華人全部遷移至鄰近的小學暫時居住，以清查可疑人士(盧友愛 2012)。

在「鐵鎚行動」的戒嚴管制行動之下，當時砂拉越政府在同年的年底在距離古晉市區約 15 英哩至 25 英哩的這塊區域，沿著晉連路(Kuching-Serian Road)，選定了三個區域成立了三個華人新村。其中，15 哩至 18 哩範圍內的華人被遷入 17 哩的新生村(Siburan)(圖 3)；19 哩至 21 哩的華人集中到 21 哩的來拓村(Beratok)；22 哩至 25 哩(圖 4)，以及靠近北印邊界打必祿(Tebedu)地區的華人則遷到 22 哩的大富村(Tapah)(圖 5)(林煜堂 2009；盧友愛 2012)。而這三個區域，也自此從散居的胡椒園，被政府規劃為一戶戶緊密且排列整齊的家屋，圖 6 範圍內的長方形則為新村內劃定的每一戶位置(圖 6、圖 7)。



圖 7 24 哩到 22 哩大富村遷移範圍
 圖片來源：截圖於 Google Map 後由本文作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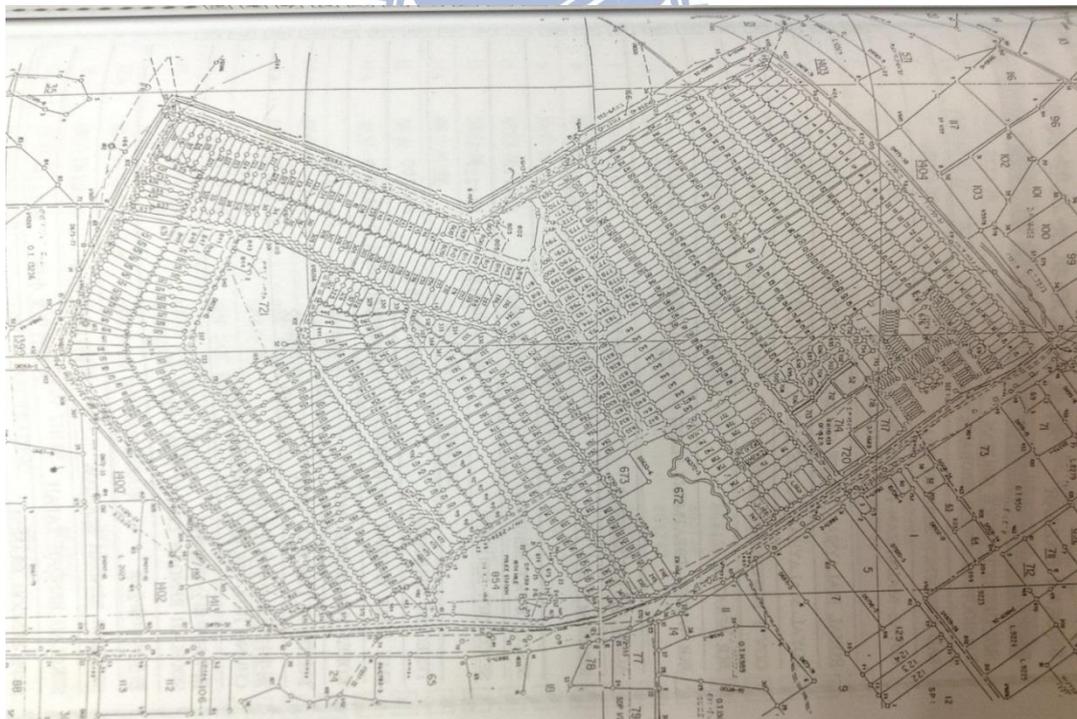


圖 8 新生村於新村建立時的規畫圖
 圖片來源：新生村中華公學校刊



Plate 19 Siburan village before construction 1963.



Plate 19A Siburan village after construction 1967

圖 9 17 哩新村成立前與後
上圖為 1963 年的 17 哩；下圖為 1967 年新村成立之後的 17 哩
紅色圈起來的範圍為 17 哩新村成立前後的商業區
圖片來源：砂拉越土地測量局

三、新村成立之後

(一) 消逝的華小與中學

隨著 15 哩至 24 哩的華人陸續遷進三個新村後，除了使人民的生活產生巨大變化外，也致使原本這個區域內的六所小學與一所中學，也因新村成立後，僅剩三間還在新村裡的華小。其餘 15 哩、19 哩與 17 哩華小巴都港分校，以及 17 哩的民眾中學都因華人遷走後沒有學生繼續就讀而廢校。其中，大富村的華小是從原本 24 哩的中華公學被保留下來，在新村成立後才遷移到 22 哩的大富村，並改名為大富村華文小學(杜明 2008)(參閱表 5)。

表 5：因新村成立而消失的華小與中學之簡介

校名	地點	成立時間	簡介
15 哩中華公學	15 哩	1950 年	1940 年代末期開始興建臨時校舍，學生約 30 多人；1950 年代中期，開始籌建新校舍，校舍約在現今 15 哩真君大帝廟前。但 1965 年，因鐵鎚行動華人遷走後，被迫停辦。
17 哩中華公學巴都港分校	17 哩巴都港地區	1959 年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晉連路十八哩巴都港為一胡椒種植蓬勃發展的地區。但其與 17 哩中華公學之間有三、四哩的路程，為減輕當地學生長途跋涉，而成立了 17 哩中華公學巴都港分校。
17 哩民眾中學	17 哩	1960 年	由於在 1960 年代以前，17 哩方圓 40 多哩的區域範圍內，雖然陸續成立了多所華小，但這裡

			<p>的華人始終都沒有華人的中學可以就讀，若是要選讀獨中⁹必須跑到更遠的古晉讀書。有鑑於此，17 哩附近的華人，便在 1960 年於 17 哩開始籌組了 17 哩民眾中學，主要提供給這個區域附近的華人就讀。在 1962 年校舍尚未完成前，還先借用了 17 哩的古晉成邦江路慈善會社的會所做為上課的地方。</p> <p>但當整個學校籌建校舍完成後，卻陸續遭逢 1962 年的汶萊事變、1963 年的馬印對抗，甚至到 1965 年則因鐵鎚行動，最終被迫停辦，校董會也因多位校董被政府逮捕，於是在 1966 年正式宣布解散。</p> <p>新村成立後，17 哩民眾中學的校地被新生村政府中學作為分校校地使用，隨後在 1980 年代後才轉為 17 哩新生村中華公學幼兒園所用至今。</p>
19 哩中華公學	晉連路 30 公里，通往八督港的泥石路與另一條通往八督港舊路的中間段。	1947 年	<p>因鐵鎚行動，使 15 哩到 25 哩之間的 600 甲地段的華人都被集中到 17 哩、19 哩、21 哩、24 哩的小學內管制。使得當時散居於 19 哩的華人，後來多被安插在 21 哩的來拓村，進而原有的 19 哩小鎮也隨之荒廢。</p>

資料來源：2008，《砂拉越晉漢省華校春秋》，杜明 撰；2014，《砂拉越古晉西連路十七哩民眾中學回顧(1960-1965)》

⁹ 獨中全名為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是由馬來西亞華人私人所贊助、維持與創辦之學校，主要教學語言為華語，教育系統自成一格，相異於馬來西亞國民型中學主要以馬來語為媒介的課程內容。

(二) 跟著走的信仰

當原本 15 哩至 24 哩的華人都搬到三個新村後，前述提到 15 哩、21 哩與 24 哩的地方信仰，雖然因為管制區的限制，讓村民無法很便利的抵達祭祀地點。再者，後兩者地區的伯公又缺乏一公共的組織來加以管理，使得在 1965 年至 1980 年這兩個地方的伯公，都因管制戒嚴時期而荒廢許久。

但從現今伯公與 15 哩真君大帝的信仰被保存與延續來看，會發現即使新村成立後，原本 15 哩到 24 哩的華人，並沒有因為家遷移到幾公里外的地方，就離開原有的地方信仰。反而在解嚴後，還發展出較有系統與規模的公廟組織以負責每一年的祭典活動。

1. 15 哩真君大帝

位於 15 哩的永真宮所供奉的主神為真君大帝。過去 15 哩的村民在訪談時提到真君大帝相傳真君大帝最早是 15 哩一位來此拓墾的賴姓先民從中國原鄉帶來供奉的，隨後才由鄰近聚落的華人共同來供奉，距今已逾 100 年的歷史。

即使目前無法擁有確切的歷史文獻顯示真君大帝是何時成為這個區域範圍內華人的地方信仰，不過從 2012 年張貼於永真宮牆上的當年度負責祈福、酬神和神誕事務的福首¹⁰資料已呈現了真君大帝的信徒分布，將不只侷限在過去居住在 15 哩的華人，尚還包含目前 12 哩、13 哩、14 哩的華人，甚至目前居住在 17 哩的村民有許多人是主要信徒。如在這份福首資料中，共包含了 42 位福首，其中 17 哩就依村內各個巷子選出 23 位福首。

雖然在這之中有多位福首仍是過去從 15 哩搬到 17 哩新村管制區的村民，但其實從其中可見過去在 15 哩區域範圍內的信仰，也在後來隨著時間繼續帶到 17 哩的新村生活中，逐漸成為 17 哩的地方信仰。

¹⁰ 每年的福首由真君大帝選擇，在每年的「還福」(農曆 12 月 2 日)時會先選出來來年的福首(正富)兩位。在「還福」當天由一名請神者請示神明按照門牌或由在場的信徒提供 17 哩各巷與其他地區戶主的名字，然後以擲茭的方式請示真君大帝，直到聖杯當選為福首，以作為各巷或各地區的代表，並在祈福前向各巷福首所負責的巷子及地區募款作為祈福、酬神所用。

關於上述這點也可進一步從我在田野期間於 2013 年 4 月參與的永真宮募款餐會中所觀察到的狀況來作闡述。這個募款餐會主要是為了籌建永真宮在 15 哩原址的新廟所舉辦的，同時也選定在 17 哩的民眾會堂席開 104 桌來募款，而前來募款餐會的信徒也大多數為 17 哩的村民，且不分老少。這似乎也說明了，當代 17 哩村民與 15 哩真君大帝信仰的關係，並沒有隨著過去信徒的搬遷，以及 17 哩變成新村管制區而停止，相對地在信仰上反而繼續在新的區域和信徒間延伸與擴大。

2. 21 哩中央伯公

21 哩的中央伯公最早來到當地是在二次大戰時，由於古晉歷經日本統治，有大批的勞工來到當地耕種，但人民卻苦不勘言，因而向天求助，於是有了中央伯公的出現，並將其安奉於 21 哩附近的單燭山山腳下。但 1965 之後，在戒嚴令下，原本在山腳下的伯公廟也同時與村民一樣被囚禁，被限制的村民無法來祭祀，使得伯公的香火也告中斷。直到 1990 年，大伯公顯靈，託夢給村民希望建廟，才開始有了建廟籌委會，新廟於 1991 年落成。但 1995 年的大雨，又讓村民決定將伯公廟移建到山腳下的平地，直到 1995 年年底，大伯公才正式坐鎮於 21 哩的新中央伯公廟。

3. 24 哩水口伯公

24 哩的水口伯公，其位於成邦江老路 24 哩的「路旺港」，西林河的橋頭旁。在百年以前，老晉連路 24 哩處就有華人在西林河兩岸耕種，因為這個鄉鎮的西林河上游的河中有一個不見底的大石窟，所以當地土著將這個鄉鎮命名為「路旺」。直到 19 世紀，以客家人為主的華人來到這裡墾荒。而其中一位法師，從中國南來時，把祀奉的伯公香火帶到印尼泗水，在當地安奉多年後，又再帶到砂拉越，安奉於西林河上游河灣的大石窟處。爾後，水口伯公成為當地信仰，為地區居民治病驅邪。後來 1930 年代，鄉民開始在 24 哩蓋店，依附著西林河在古晉從三馬拉漢河轉入西林河載貨做生意，店屋也因此增加，多達 18 間，後來為祈求伯公保佑，鄉民以風水勘查後，決定將伯公安奉在店區所在地邦山的半山腰處。然而，1965 年鐵鎚行動後，當地居民被遷到大富村，水口伯公依然還是在原處。直到十多年後，生活逐漸安定，村民才開始計畫將水口伯公遷入大富村。但後來因向政府申請土地沒有下落，而暫停計畫。

然而，隨著原本 24 哩的華人在 22 哩的大富村深根近 50 年且定居後，雖然水口伯公的地方信仰並沒有隨著 24 哩的華人遷移至 22 哩的新村管制區而有所改變，不過過往在新村成立之初欲將水口伯公遷移至 22 哩的討論也在近年內再次出現。即使在這之中為了水口伯公是否要遷移到大富村產生了兩派意見的信徒，其中一派為 22 哩慈善會社為主的信徒，依然持續維持 24 哩的水口伯公廟運作，且信奉 24 哩的水口伯公；另一派則據 22 哩村民何先生提到欲將水口伯公遷移至大富村的信徒大部分是相信 2007 到 2009 年每年水口伯公在大富村遊神落童時所表達要遷移至大富村的看法，且水口伯公也在落童時表示自己其實原本就是另一個名為「水德星君」的神，只是在過去 24 哩時村民以為祂是大伯公(土地公)，而使用了土地公的金身。所以後來在村內相信這類說法的信徒，便開始著手組織與募款，隨後於 22 哩水德星君選定的地方興建新廟，並在 2010 年 10 月完工，成為這一派信徒在大富村的信仰中心。

(三) 商業發展與客家延續的小鎮

距離三個新村成立至今已近 50 年，新村中規模最大的 17 哩新生村，現在在那可以見到一間大型綜合型賣場、數間銀行，近 400 多家商家，以及每周固定吸引外地商販來擺攤的市集，同時也是這個區域的行政中心，有著農業部、副縣公署、郵政局、警察局、診療所等等公家單位，未來政府還選定在當地設立地區醫院，同時各個蓄勢待發的發展商也將逐一進駐。而 22 哩的大富村因與達雅族聚落鄰近，為當地民眾添購日常用品與糧食的地方，也像 17 哩陸續增添新的發展契機。夾在兩新村之間的 21 哩來拓村，即使村落規模較小，但人口數在近幾年來也大幅提升。

曾幾何時，這三個新村早已不是那個需要倚靠胡椒種植的小鎮，更不是那個風聲鶴唳的小延安。若非特別問起，其實沒有太多人記得這裡曾經有的過去，更不會知道原來這熱鬧小鎮的前身，有一段辛苦的歲月。

對於「新村」的成立，有人見到現在的繁華，會說那是「因禍得福」。回頭省視，倘若沒有當時的新村，可能在店區的地方不會有現在高密度人口集中帶來的商業發展；到現在也許在村落中不會繼續保存著此起彼落的「河婆客家話」，抑或是家家戶戶餐桌

上飄香的「菜板」、「釀豆腐」與「擂茶」這類傳統的客家美食。此外，還有因為聚落、集體記憶而形成的緊密地方感，促成三個新村內村民的往來通婚，或是三個新村的聯合組織與活動，包含新生村土風舞班、歌唱、籃球比賽等等。

四、小結

在本章中對於 17 哩這個區域在新村成立之前的背景有一全面的認識之後，可從中發現 17 哩擁有現在的樣貌並非偶然，而是一個接續歷史脈絡發展的動態過程。在歷史背景中可得知，在新村管制時期之前，17 哩附近的這些華人區域早已擁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樣貌，如學校、公家機構、廟宇、商店區等等，是一個擁有優勢地理區位且正隨著都市發展前進的華人聚落。

而新村管制區，這個由國家公權力所建構的全新空間，固然為當地在整體村落樣貌，以及這些村民在生活上產生巨大改變，但實質上卻加速了這個村落的進程。再者，透過人群在這個空間下每天於日常生活中的不斷活動，以及繼續擴增與延續管制區以前的社會連結，讓後來即使新村管制區解除之後，這個原本由權力建構下的抽象空間也已然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空間，並創造出一個對於 17 哩人來說，有著主觀情感和依附意義的「地方」，致使新生的地方感也隨之於此誕生。

此外，再從這三個新村的傳統面向來看，都有民間信仰作為地方感的認同象徵，分別是 15 哩的永真宮、21 哩的中央伯公、22 哩的水口伯公(24 哩)。因此，這種分布很明白在作為一個傳統意義的地方感形成過程中，這三個新村都還保留這樣以信仰作為地方認同重要象徵的重要文化。即使對於現在的 15 哩、21 哩、24 哩而言，因主要信徒的居住地早已不再以往的位置，而顯得有點尷尬。

不過在這之中，如同永真宮的募款餐會還是選擇在 17 哩舉辦、22 哩從水口伯公到水德星君在信仰上的延續，都展現了這些信徒或是村民依然還是扮演著形塑這些信仰與地方感延續與轉化的重要角色。

而關於這種地方感創生的過程，也將在後續的章節中作敘述。同時也將討論在這蛻變的 17 哩背後，這個地方因左翼活動所生成的集體記憶又是如何在這個地方的發展演變過程中產生轉變。下一章，將由這段消逝的集體記憶談起，關於這個村落的故事。



第三章 記憶裡的驕傲

當外地人初次來到這個距離古晉市中心約 20 多公里，叫做 17 哩或是 Siburan 的小鎮，會發現這裡也許不如古晉繁華與熱鬧，也比不上鄰近印尼邊界的西連(Serian)，在貿易往來上的多樣豐富，但其終究是這筆直的晉連路上正蓄勢待發的小鎮。

若沒有特別提起，人們不會知道這個小鎮的誕生，其實跟 1950 年代起砂拉越這塊土地上風起雲湧的反殖、反大馬運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而小鎮中最高處的警察署，也無法讓人聯想起在 1965 年六月的那個夜晚，曾有的槍林彈雨。更甚者，如果沒有特別留意，小鎮某處的路邊那生鏽、爬滿藤蔓的鐵絲網，根本也無從得知原來斑駁、殘破的鐵絲網曾經隔絕了這個村落的內外。

這個新興發展中的小鎮，有太多被遺忘的記憶，但這些遺忘又往往伴隨著無奈，讓那些曾有的風光與驕傲，不知不覺在時間的洪流中逐漸消逝。「山老鼠」、「共產黨」、「進森林」這些歷史名詞，也早已成為茶餘飯後，偶之提起的往事。

因此，如果將 17 哩更早以前的華人活動至當代的發展視為歷史上的主旋律，那麼新村的成立，就彷彿只是個意外的插曲。但也正因為有了這個插曲才有了新村，進而因人口集中，讓這個原本緩慢開發下的小鎮，反而加速進程，有了當今的面貌。

而在本章中將依循著時間脈絡，從老一輩 17 哩新村人參與左翼運動的「記憶」談起，說明那段在現在彷彿噤聲的左翼運動往事。

一、17 哩左翼運動的萌芽

2013 年的 9 月 16 日，適逢馬來西亞成立 50 周年¹¹的日子，這天在整個馬來西亞，無論是馬來半島，或是砂拉越、沙巴各地皆有慶祝活動。但回溯歷史，近幾年才正式被

¹¹ 現今由馬來半島、砂拉越、沙巴所構成的馬來西亞是於 1965 年 9 月 16 日成立，在馬來西亞國定假日名稱上稱為馬來西亞日。但馬來西亞國慶日則是每年的 8 月 31 日，以紀念馬來半島(馬來亞)1957 年 8 月 31 日正式從英國獨立。

成立為公共假期的馬來西亞日，相對於國慶日，或許對砂拉越或沙巴人來說，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

所以慶祝活動前的這幾天，古晉的路上、政府主要機構，也如 8 月 31 號國慶日一般，掛上了州旗、國旗。電視上、廣播中，曲調輕快的 2013 馬來西亞日紀念歌曲，總是徘徊於耳際。更不用提各家報紙在當天祝賀馬來西亞日的半版宣傳或是商家以此紀念日做促銷的拍賣廣告。而當天晚上，主要成員為過去曾參與左翼運動者所組成的砂拉越福利協會¹²也選擇在每年的這天，於古晉相互聚首，一同慶祝馬來西亞日。

不過，在紀念日歡天喜地慶祝的背後，對於曾參與過反殖民、反大馬運動的華人，其實存在著多重且複雜的歷史矛盾。這種矛盾，對那些曾經歷並實際參與過那段紛亂歲月，在年輕時搖旗吶喊要反殖、反大馬的老一輩 17 哩新村人來說，顯得更為深刻。但是，過往的一切，在「馬來西亞」早已成為既定事實的今天，彷彿成為記憶中的一部分，那些驕傲似乎也只能存留於記憶中，不再輕易被談起。只是若談起「新村」的過去，這些故事卻又不經意地會被再次述說。而這些再次被述說的記憶，卻隨著時間、社會氛圍有了重新地詮釋與解讀。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是砂拉越左翼運動最蓬勃發展的時候，當時農村華人青年紛紛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參與以「反殖民、反帝國」為主要訴求的社會運動。

我們要給砂拉越人真正能代表砂拉越人的國家。因為我們當時就是認為那個本質還是殖民主義的政策... 然後國家安全局的政策也是... 但是後來我們國家(砂拉越)獨立了，為什麼還是繼續沿用這些法令，就讓我們很反感。
(130201_002 鍾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2/1)

從小就是 17 哩人，在年輕時曾參與過左翼運動的鍾爺爺，在訪談中提到了他們當時的訴求。他們這些思想的萌芽除了受到世界各國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殖民地解放浪潮的影響之外，當時引領農村的青少年接收到這樣新思維的其實來自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其中又以到農村教書的教師居多。

¹² 砂拉越福利協會在 1974 年創立，主要成員為 1960 年代因砂拉越左翼運動被政府拘留的參與者。

1029那個罷課運動¹³都是有關係的，那個整個砂拉越、古晉都形成這種新的潮流，進步青年、新的思想，中國解放我們這些人在思想上的影響，就變得很嚮往這些東西。你看那些搞學運的學生...很多是一中的學生，他們後來出來當老師，他都是一個任務，就是要來培養這些學生。1029 之後有很多學生已經吸收了這些共產思想了...他們有了這種思想以後，就在進行這種活動，宣揚、傳播。我們的老師也很多是一中出來參加的....那個1029、330罷課運動¹⁴的。受到那時候思想的學生，以後就把那些思想帶進農村的小學，在他們教書的時候。我們也是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們培養了一些幹部，也是學生。
(130904_002 溫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4)

而在訪談時，另一位 17 哩報導人溫爺爺也提起當年的歷史往事。當 1950 年代的工會運動在砂拉越如火如荼的進行時，來自城市或中國移民至砂拉越的教師帶著新思維進入了郊區的農村，為農村帶來新的衝擊。他們在學校挑選在課業、社團活動表現較為良好的學生，於課餘時間組織學習小組，深讀左翼思想，並在之後組織青年會。

他們是選比較好的學生。學習小組是砂拉越先進青年會的外圍組織，比較高一層的就是砂拉越先進青年會，然後我就是那小組。老師就開始一班一班物色，哪些人不錯....起先是看一些文藝活動啦！慢慢的他們就會拿一些書籍給你看....就是社會主義、如何革命之類的。
(130201_001 鍾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2/1)

年逾古稀之年的兩位報導人鍾爺爺與溫爺爺，在當時都像 17 哩多數的青年一樣，在就讀華小的階段就受到老師的鼓舞，在學校參加了課餘的學習小組，隨後跟隨著浪潮參與組織活動，並加入了 1959 年剛創立的砂拉越人民聯合黨，正式成為黨員，投身更多反殖運動。而這種潮流，也繼續延續到 1963 年砂拉越被併入馬來西亞聯邦後。

¹³ 這裡所指涉之「1029 工會運動」為 1951 年 10 月 29 日，古晉中華中學爆發了砂拉越史上最大規模的罷課鬥爭。起因是砂拉越當時受到二次大戰後，反帝、反殖浪潮的影響，使學生透過學生會出版之刊物進一步的宣傳這些進步思想，卻遭到英國殖民政府的干涉和壓制，導致學生的群起反抗，並選在 10 月 29 日開始進行罷課行動(盧友愛 2012)。

¹⁴ 「330 罷課運動」是繼 10 月 29 日的罷課鬥爭失敗後，在 1955 年 3 月 30 日於古晉的另一起罷課行動。起因為古晉中學生對當時學校教師的教學方式感到不滿，在對學校提出多次改善或更換教師之建議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同時學生代表還因此遭受校長開除，引發了隨後一系列的罷課行動。而這些學生運動所培養出的學生幹部也在之後帶起了砂拉越長達數十年的左翼運動(盧友愛 2012)。

二、反大馬的潮流

即使 1963 年 9 月 16 日砂拉越被併入馬來西亞聯邦，正式成為馬來西亞其中一個州屬，也沒有影響左翼運動日趨減緩，反而因印尼蘇加諾政府在背後的支持，讓左翼運動持續在地下進行著。

那時候是一個潮流，就會號召我們去參加。而且也沒辦法，沒有什麼選擇。你不去等下人家罵你。好像...你不參加就好像變成反派了嘛！所以說看個人的立場、個人的思想怎麼走，就跟著大隊囉！那時候很轟轟烈烈的，假如你不參加就會給人家講你是什麼走狗、漢奸什麼的。

(130823_001 李婆婆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8/23)

訪談的這位李婆婆現年 68 歲，從小就在 17 哩的農村出生，家裡除了製作豆腐來販賣之外，另外又種有胡椒、蔬菜。在家中 12 個手足中，排行老大的她因為要幫忙家計，再加上父親重男輕女，讓她比同年齡的小孩都還晚去上學，卻使她後來更為珍惜這得來不易的讀書機會。因此在小學階段，她也跟前一節中提到的鍾爺爺與溫爺爺一樣，都有被選中參與學習小組。待小學畢業後，適逢反殖、反大馬運動蓬勃發展，正值花樣年華的她，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其實沒有太多的選擇。即使她在一開始根本也不清楚那些左翼分子到農村來宣傳的「反政府」代表的是什麼意思，但是當周遭的朋友大家都一窩蜂地投入這些活動時，如果自己不去參加，就會遭致其他村裡的年輕人非議。因此在 1963 年她 18 歲時，她不顧母親的反對，跟隨「潮流」，傾心、傾力地投入左翼地下活動：

不會害怕！就沒有想到害怕，就一直衝喔！都跟著他們囉！好像很新奇的樣子...就是訓練小組這樣呀！幾個人一組這樣囉！或是一個club，那時候我們參加有時候就是三天三夜的喔！就在山芭¹⁵裡做訓練...

(130823_001 李婆婆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8/23)

就如農村中一個個驍勇善戰的青年一樣，在當時尚未結婚，還沒有太沉重家庭負擔的他們，在村落中同儕與朋友的影響力，往往遠大於家中親人的反對。因此無分男女，

¹⁵ 山芭為馬來西亞當地用語，用來指稱農地或尚未開墾的荒地。

多數年輕人一邊跟著組織在私底下做訓練，心中同時抱持著有天砂拉越也能夠獨立的夢想，以至於在任何衝鋒陷陣中都無所畏懼。

我大概20多歲一點加入的...那時候年紀還比較輕，看東西好像都覺得沒有什麼...有一股那個熱血啦！很衝動...人家講什麼，我們就好...15哩那邊會比較白區¹⁶啦！這邊會比較紅區¹⁷...我是因為那時候我喜歡看書、看報紙...然後我就參加了學習小組...還有參加歌詠隊這些...

(130905_001 黃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

年紀比李婆婆稍長，現年80歲的黃爺爺，他出生於在親政府色彩較濃的15哩。家中在當時就經營雜貨店的他，是家中的長子，即使在這個支持左翼運動人數較少的區域中，他還是堅持自己的立場，甚至時常與相異立場的父親產生衝突。

家裡控制我不了...父母...尤其是我父親...因為那時候我跟他可以說是鬥的很兇啊！很厲害啊！不過我對這些東西啊！如果我信啊！我要啊！我就不管你了。我認為我並沒有錯啊！後來我就去了。老實講，我父親對我後來也妥協了。

(130905_001 黃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

當時在農村中像黃爺爺這樣在年輕氣盛時，與家人在政治意見上產生衝突的年輕人有許多，他們在之後紛紛走上了左翼運動這條路。只是在這條路上，有人在受過訓練之後，選擇遠離家鄉躲進馬印邊界¹⁸的森林成為游擊隊員，待之後再伺機而動；有人則是選擇加入政黨，一邊參加公開的政治活動，私底下仍然繼續幫忙游擊隊隊員，提供必要時的援助。在不同選擇的背後，有人可能在與政府的駁火中，被迫犧牲、再也回不了家，這在當時彷彿是許多家庭的悲歌，如同報導人溫爺爺的姐姐，就是在某一場攻擊行動中去世。除了這類的悲歌之外，還有許多人是在參與行動的過程中，即使保全了性命，卻被抓去監獄，一關就是近十年的歲月。

在五十年後的今天，既往一首首悲歌，彷彿也隨著時間的逝去，終於能雲淡風輕的提起。這時這些村裡的政治犯，聊到這段監牢裡的往事時，總會戲稱「我們是去六哩讀

¹⁶ 白區在這裡指的是左翼運動相對不盛行之地區。

¹⁷ 紅區相對於白區，意指左翼運動發展較旺，有較多人參與之地區。

¹⁸ 砂拉越郊區因鄰近印尼，在當時左翼運動後轉為游擊隊的成員，於後來多躲到邊界的森林進行活動，以躲避政府的追捕。

大學」。然而，是真的去念了「大學」？還是在獄中的經歷，其實為他們帶來更多的無奈？

三、去六哩念大學？

沿著17哩一路往古晉市區的方向走，在古晉國際機場附近，有個叫做六哩半¹⁹的地方，過去曾經是1960到1970年代，這些被視為政治犯的村民們被扣留的地方。在這個政治拘留中心的每個人，來自砂拉越的各個地方，各自有著不同的故事和背景，但不約而同的是他們都是因參與或是幫忙左翼運動及地下活動而來到這裡。而在17哩這個曾經被喻為革命小延安的紅區，曾參與運動者，有人在左翼活動中倖存、逃過一劫，但有許多人卻無法這麼幸運，反而在行動中遭到逮捕，成為別人眼中的政治犯。

(一) 被捕之前



62年的12月28日汶萊起義呀！63年，地下頭(左翼份子的領導)決定要武裝鬥爭，在六月的時候...我被抓的時候是6月7號。那時候要過印尼，就在邊界那裡被抓的...但是當時我們就是受到這種影響，受到中國那種參加革命的影響，那就是能夠拋開你個人的一切。之後就到被捕後，就到六哩讀大學囉！(130904_002 溫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4)

在1962年汶萊起義²⁰後，於1963年的六月，在17哩長大的報導人溫爺爺也和這個區域中許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前往印尼，準備接受進一步的游擊隊訓練。但卻在途中

¹⁹ 六哩半為古晉政治拘留中心確切之位置，位於古晉的六哩至七哩之間，但當地人在口說時一般都稱這個居留中心為「六哩」，因此本節標題與文內敘述，皆以「六哩」作為代稱。

²⁰ 1962年12月8日的汶萊起義，是由汶萊人民黨所發動的武裝起義政變。起因於1956年汶萊人民黨欲爭取汶萊獨立，1957年派代表至英國進行談判，要求制定憲法，讓汶萊獨立，卻遭到曾英國殖民政府的拒絕。直到1962年汶萊舉行選舉，人民黨在立法議席囊獲勝利，使得汶萊政權掌握在人民黨手中。但當時英國著手進行的「馬來西亞計畫」正積極進行，隨之遭到人民黨反對。人民黨便在此時欲聯合同樣反對馬來西亞計畫的砂拉越人聯黨組團前往聯合國總部申訴和反對馬來西亞計畫，且要求結束殖民統治。不過，卻在此時，人民黨在汶萊發動武裝政變，致使英國出兵鎮壓，讓汶萊的獨立運動受到挫敗。但並沒有因此士氣大敗，反而連帶的影響砂拉越左翼運動更為蓬勃的發展(田英成 2012)。

遭到政府軍隊的攻擊，不僅無功而返，數百人還因此遭受牢獄之災，在之後於六哩監獄待了近十年的時間。

而另一位蘇爺爺，雖然沒有參與地下活動，但也在之後跟溫爺爺他們一行人有了同樣的命運：

不知道是怎麼牽連到的，不過當然是有原因的。以前我在西連的時候，他們要越過邊境，要搞那些活動，我有幫忙他們，可能是因為這樣吧！我事實上也沒做什麼，就是幫他們安排交通這樣。但你協助他們地下的太多了嘛！他們要(人聯黨)黨徽我就拿黨徽²¹給他們…就那天只有我們三個人啊！我們一起被逮捕，後來在監獄遇到。在中央監獄那...是後來才去六哩的。就在裡面七年阿！
(130924_001 蘇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24)

頭髮花白、年過八十，講起話卻鏗鏘有力的蘇爺爺，原本並非是17哩的人，而是住在距離17哩約半小時車程的西連。當時家裡在西連開店的蘇爺爺，一直以來都只熱衷公開政黨的活動，私底下的左翼活動並沒有特別接觸。但是當地下分子有難時，他仍毫不猶豫的盡心幫忙，導致後來被捕入獄。

此外，除了溫爺爺和蘇爺爺之外，前述有提到的黃爺爺，則和前者兩位被捕的狀況與時間點不太相似。黃爺爺從參與左翼活動以來就比較專注於地下活動，在1963年時也曾跟著組織去過馬印邊界，在訪談時他便從他去印尼受訓的過程談起：

我去印尼一次...去不到去到邊界，就被那個人就保安部隊的...那時候好像被抓去69個人...那次就我比較幸運，在中午那個兵來抓我們的時候，我們住的那個小屋子，我們分成三個小組，我跟另外一個同志剛好跑去沖涼。那個兵是從那邊來，我們沖涼是在這邊，剛好我們去沖涼還沒沖好。然後我的同志就說，「某某人好像有兵喔！」我就說：是嗎？我還不大相信喔！怎麼會有兵。後來跑上看，好像是喔！兵包圍起他們...後來我的同志就問我說「要怎麼辦呢？」我們沒有怎麼辦，只好倒回(回去)囉！那時候還有其他沒有被抓到的...我們那時候跑出來大概有10多個人，去了是總共大約有80多個。
(130905_001 黃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

²¹ 報導人蘇爺爺在訪談時提到當時人聯黨跟印尼的關係較好，所以有許多左翼份子在馬印邊界藏匿時，若身上配有人聯黨的黨徽較能受到印尼的照顧。

他雖然在1963年跟著組織一起去印尼受訓時幸運地未受逮捕，但當1965年新村成立的初期，這些在新村內的左翼分子其實並不隨著新村變為管制區而停止活動。相反地，在新村裡私底下的他們還是技巧性的繼續組織與策劃，甚至擔當起躲進森林裡的游擊隊隊員們的後勤部隊，提供物資上的補給與情報上的交換。

我69年，第二次要出的時候，又要去參軍了。那時候去海口區...那時候很多從邊界回來，本地的人就跑到海口區，又再參軍喔！那時候還不知道這麼亂、還不知道我們的勢力已經輸掉這麼多了，我還不清楚。那些領導的叫我們去，就去囉！我們在新村裡就是秘密囉！所謂地下就是這樣囉！有時候就跑一個比較秘密的地方囉！...只要我們自己了解，你要做什麼東西，都計畫好好先。像去別人家也有，還有像我們就經常跑到我們的園筵(田園)！我們有些比較小的集會、活動阿！可以新村裡面也可以嘛！就好像是朋友來家裡拜訪這樣。我們好像有什麼活動、集會阿！都會有人站崗。人的活動也是很靈活的。他如果需要的話，他就會很注意啦！然後1969年，那時候那個計畫就是想說會真正離開這個家了！

(130905_001 黃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

當時已經住在17哩搭建的新居的他們，除了一邊要面對生活在管制上的不方便，以及農作物因為新村成立後的損失，卻同時也在這種困頓中找到繼續維繫組織運作的方式。甚至在1969年黃爺爺又和17哩的朋友們選擇再度離家，去古晉郊區的海邊參與進一步的行動，卻不幸在這波行動中遭到逮捕。

我就是要去海外(古晉郊區的海邊)，被人家出賣了，我就去到半路，我還沒有去到海外喔！我一共是五個人嘛！兩個人跟我一起找人...那時候就覺得有點怪怪的。傍晚六點要跟他一起去...找不到人。沒有人，我就跟我一起跑的人講，這要小心啊！好像情形不太對！話還沒講完，那些人就出來了。在村子是規定六點要回去，我沒有回去，所以(我)有通知家裡的人，跟我太太講，我沒有要回了，叫她六點以後去警察署呈報。說某某人沒回...這樣家裡的人就不會錯了。因為他(警察)會查哪一家沒有回的...就我們沒有回來的話，家人就要去報警察署。但是後來...就被抓囉！那兵已經埋伏在那邊了。幸好是我們剛好沒帶槍，如果有槍就給他射了！之後被人抓到那個暗房，地下室...伸手不見五指的！那一次好像一共...將近30人被抓，就是要參軍的那些。也是可以講不幸中的大幸，假設如果我們真的去參軍了，命還有沒有在都不知道了。我們被抓，那個命至少還保在那邊。就是家裡的人比較苦一點啦！

(130905_001 黃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

然而，黃爺爺他們的生命或許幸運地在這場行動中倖存了。但是參與「革命」，似乎從來就不僅是個人的事，他們的家人也往往必須比他們更堅強。

對於這些參與行動的村民家人來說，他們的煎熬絕對不比那些左翼份子來得輕鬆。在新村的他們要面對的，除了要擔憂親人的安危，還有政治、經濟上的壓力。因為當警察來家中盤問到了新村管制時間內還沒回家的親人時，他們無法閃避，只能隨時在擔心害怕中面對；同時，家中的經濟壓力，在遷入新村後，受限於管制時間的限制與胡椒蟲害的影響，更加雪上加霜。而這種日子，又一直持續到這些村民被關進六哩拘留中心之後。

(二) 六哩的日子

待這群左翼份子一批批的在行動中被捕後，古晉六哩的拘留中心也越來越多人。在裡面的他們，雖然對外的行動受到限制，但生活上還是不受完全制約的。因而在後來，他們在六哩開始自發性的學習，會馬來文、英文的教導那些原本不會的，或是在額外時間持續關注拘留中心外面的行動，在必要時也會聯合起來絕食抗議，抵抗政府。

如報導人黃爺爺所提及當時他在六哩的情形：

後來那些黨員比較活躍的，幾乎都給他抓去了，抓到六哩去啊！那時候六哩，有段時間最多人給他抓進去了，不會少於兩千五。一天可以吃掉100公斤的米！那時候六哩的生活基本上是還可以住啦！我們裡面的生活，也是有地下組織喔！我們在裡面還活動喔！抓進去了，還是要堅持阿！我不跟你合作嘛！好像為了一件事情，我們裡面就鬥爭....就絕食...但平常的時候，我們在裡面也會自己去學東西囉！有學馬來文、文化阿！就大家互相教。

(130905_001 黃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

而 1963 年因為在砂印邊界被捕直到 1972 年才被釋放的報導人溫爺爺，也進一步補充了在六哩的生活：

在裡面(六哩)主要有學習馬來文。我們在這邊學了小學的課程...我們主要學馬來文，還有學英文。就是有一些比較會的人來教...因為那個拼音很容易，我們知道那個拼音後，我們學會了就能夠念那個字。那時候就想說，我們要懂得

多一種文字...這對我們來講，我們就可以跟他們交流了。然後我們還有學習小組，以前有一兩個跑進去，他在外面是領導級的，他就會弄一些東西給我們學囉！

(130125_001 溫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25)

不過，即使在裡面他們多數時間可以自由學習語言，或是暗自組織學習小組學習新的東西，但是在閱報上，還是會受到政府的控制。同時，政府無論是對六哩的他們毫不間斷地宣傳反共思想，對六哩外公開的廣播、報章新聞上亦是。

政府的宣傳還是有..就是報章上或廣播電台...但其實我們還是走自己的路，不會去相信那些...政府你宣傳你的囉！（報紙上寫的）比較多是都不會相信，都是用懷疑的眼光去看這樣...在裡面的報紙，有些新聞也會被塗掉，像跟革命有關的，他就塗掉。

(130905_001 黃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

但在六哩的日子，終究比不上與家人的團聚。慢慢地，有許多被捕的左翼份子也開始考量到家人在外面守候的辛苦，再加上政府反覆在拘留中心的宣傳與鼓吹，讓每日的精神壓力達到緊繃，致使許多人在百般不願下簽了自白書，在承認與說明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後，才得以被釋放。

如黃爺爺與溫爺爺皆是：

還可以！老實講就是家裡面的人比較苦啦！那邊自己生活可以...也不用做工。但時候講就是為了革命囉！只好堅持...那時候也是有想要出來...但就被關在裡面不能夠出阿！那時候每個星期，家裡的人就去看我們一次囉！那時候就跟他講講一下，安慰安慰囉！六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

(130905_001 黃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

我在六哩被關，從63年到72年尾才出，九年多...之後我就出來回來過正月半囉！後來是要出來也可以，就是要去坦白以前你做的事情，然後看你有沒有誠意囉。

(130125_001 溫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25)

不過真正影響他們兩位或是其他多數在六哩的左翼份子，最終願意寫自白書的原因在於1973年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這個協議的簽訂，除了致使砂拉越整體的左翼運

動日趨減緩之外，也讓這些在六哩的左翼份子在夢想破滅、失望之餘，開始重新思考人生的下一步，並省思自己過去所做的這些事。而關於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這一部分內容，因時序的關係則在下一章的內容中作進一步的敘述。

四、小結—不再被提起的記憶

回溯 17 哩這些曾參與過左翼運動的老人他們對這段過去的記憶時會發現，對於他們來說這段往事不是不願提起，而是無法在後來的時空背景之下來做述說。再者，這段往事又伴隨著政府利用公權力致使 17 哩成為管制區，以及迫使這些參與者被捕進入拘留中心，同時政府不間斷的公開表態將視之為異端的态度，讓「左翼運動」這件事情對於非圈內人來說，始終無法被理解，以至於他們的聲音也只能消聲滅跡。唯一能讓他們盡情暢談的只存在於他們彼此間相聚首的場合，以及利用文字的書寫將他們那段曾創造歷史卻不被重視的歷史，以自傳或口述訪談的方式呈現，如曾由砂拉越友誼協會出版的幾本專書《往事》、《林中獵奇》、《悠悠歲月話當年》、《風雨年代》、《砂印邊界風雲》、《回憶 1990 年和平談判》、《心中有個宏大的世界》、《追尋民族區踪跡》和《永遠活在人民心中的人》等等。但這些專書的流通，還是無法抵擋國家公權力下對這段歷史的忽略。

不過，事過境遷的現在，他們對於過去不顧一切獻身於左翼運動的那些經驗，仍不感到後悔。他們還是堅信著，若是當時他們沒有在這塊土地上為華人站出來發聲，也許時至今日華人無法擁有現在在馬來西亞的位置。

而革命未果的悲傷與失落，終究只能放在心中那塊最深層的角落，人終究還是得回到日常生活中正常生活，再者當時新村成為管制區後經濟的壓力才是最必須要去面對的。因此，下一章依循著時間脈絡，將提到新村成立時這部分的內容。

第四章 公權力下的不自由—新村成立

如前一章所述，砂拉越的左翼運動從活動開始策畫至結束陸陸續續都與 17 哩這個村落，以及這個區域範圍內當時的客家青年們，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但是，真正讓這個區域附近無論是有無參與左翼運動的每個人感受到巨大衝擊的，在於 1965 年 6 月 27 日當晚的行動，同時因為這個行動，致使 17 哩這個原本平凡的椒園小鎮有了全新的面貌。

在本章中將藉由在這個村落中，曾經經歷過那一段因左翼運動而搬遷的村民們，他們對當時新村成立過程之敘述，試圖建構與回溯在當時龐大國家公權力之下，對這群新村居民的影響，以及將後來村落的發展連結到左翼運動在砂拉越淡化後的狀況。

一、改變命運的那晚

那幾道槍聲引起強烈的震撼，住在周邊地區的草民馬上成了殃及的池魚，我們才住了一年的屋子就要被迫放棄了。(夢羔子 2011)

當左翼運動在古晉郊區私下秘密進行的期間，在 1965 年 6 月 27 日當晚十時，部分左翼地下組織的成員與早已埋伏於古晉的印尼兵，在經過一連串的策畫後，決定對 17 哩鄰近地區最高點的 18 哩警察署²²發動攻擊，使得鄉村原有的寧靜被陣陣槍聲打破，也讓附近華人居民的生活自此產生了改變：

那時候我就跑到第二路要到店那邊的時候，我就看到有火在那邊，看覺得不對勁，我就不敢去了，傳單就丟在那邊沒有發完，就馬上拉著我弟弟回家，回到我家不一下，警察署就響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要打警察署。
(130823_001 李婆婆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8/23)

²² 這間警察署實際的地理位置是在 17 哩與 18 哩之間的村落範圍內，當地人一般都稱這個警察署為 18 哩的警察署。

在事件發生的當晚，住在17哩鄉村，原本就一直有在參與左翼運動的李婆婆正巧拉著弟弟在17哩偷偷摸摸的於各家發放地下活動的傳單，卻剛好遇上巡邏的官兵，所以只好先行返家。但當他們回家不久後，準備梳洗上床休息時，卻聽到遙遠的地方傳來陣陣槍聲。

而另一位當時住在鄰近事件發生的警察署約半公里遠的彭先生，回想起那個讓他印象深刻的一晚時提到：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地下分子攻擊那個警察署的時候呀！整個天空都是那個火花，好像華人新年打那個煙花一樣，乒乒乓乓...整個天空都是火花...他們用槍攻擊，去炸那個警察局。我在我店屋二樓開個小窗門，那時候還小....還覺得很好看。那時候英國士兵還不錯，跟我說「小弟弟你不可以在這邊看，你要跑到底樓，不然那個槍彈會打到你。」....我們在自己的家看，遠遠的看。可是到了第二天，全部的軍隊、警察、直升機啦！都到了17哩的籃球場那邊集合，去尋找這些地下組織。

(131009_001 彭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0/9)

當時年約14歲的彭先生，由於家中經營的雜貨店正好在17哩鄰近晉連路的路旁，又正好離被攻擊的警察署不遠。所以當事件發生時，打開家中窗戶探頭出來看，立即就看到遠處警察署上方傳來陣陣火光。不過在當下，他們整家人與附近鄰居，都不知道警察署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直到隔天一早，彭先生家門前的籃球場，突然集中了大批的軍隊與警察，開始要進一步的調查附近可疑的左翼份子。

即使17哩附近的華人區域有多數人是左翼背景，在事件發生的當下，若非主要的核心幹部或參與策劃此行動之人員，其實根本一無所知。大部分的人都是隔天私底下道聽塗說後，再慢慢透過政府於報紙、廣播的宣傳，才終於知道原來前一晚的攻擊警察署的行動，是砂拉越部分的左翼份子與印尼兵所為。

但是，在這個原本就有許多左翼份子居住的區域，相對於古晉市區的人民或其他沒有參與任何左翼運動的人，他們對於政府在攻擊行動後，於公開報紙上抨擊與醜化此次的攻擊行動，仍然是不以為然的。

如曾參與那晚攻擊行動的村民鄧爺爺回溯起那晚的行動時提到：

(當時攻擊行動是)上面通知的...印尼是很早策畫要打的。他們意思是要去打飛機場...後來發現打了難逃，也沒有用。(才會想說要打18哩警察署)，可能是打了要逃也比較快。所以那些人直接一開始就住在16哩那邊的園...就從16哩過來打，然後打完就直直上，上到24哩那邊的橋。那時候策畫的很好，不會失敗！最後也沒有人被抓到...當時是為了要顯示革命理想，轟動國際...那時候(原本)有去阻礙他們，叫他們不要打。但武器那時候已經全部運過來了...那個武器是很早就安排了，一直移到16哩，那些人就暫時都在那邊。所以後來就安排18哩警察署來打囉！...一開始當然不知道囉！幾個頭知道而已...那時候就從運動場那邊打過去...以前那裡是一座小山，就這樣砲對準警察署，後來就跑了，跑去21哩。

(140114_001 甲必丹鄧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4)

對比於政府在報紙上，提及這些左翼份子總以「恐怖份子、敵人」稱之。訪談時，鄧爺爺卻是意氣風發的講起當晚的攻擊行動。他提及當時雖然砂拉越當地的左翼份子想要暫緩此次的行動，卻涉及到埋伏已久的印尼兵對於攻擊行動的壓力，最終使得砲火在當晚一觸即發。

然而，在那個展示革命理想私以為能夠成功的夜晚，這群左翼份子其實並不知道在這次攻擊行動中，剛好射殺到時任砂拉越州的首席部長加隆寧甘於18哩警察署擔任警官的親弟弟。

由於上述這個非預期性的傷亡，以及左翼份子於此次攻擊行動為砂拉越的社會帶來巨大衝擊之外，在這之中因同時交雜首席部長對於失去胞弟的私人因素，再加上此事件有印尼兵的介入，又讓這起事件擴大到與印尼之間的國際政治等多元且複雜之問題，再加深了當時的砂拉越州政府對於此次事件的注目。

使得原本欲藉此次行動彰顯勢力的左翼份子們，卻在這次事件之後一系列的餘波盪漾中，受到很大的打擊。同時，也讓17哩鄰近區域無論是左翼背景或是毫無相關的華人們，都在往後的生活遭到波及。而影響最大的衝擊，就是政府於攻擊行動後宣布的「鐵鏈行動」。

二、「鐵鎚行動」

6月27日之後的幾天，政府雖然派出了軍隊、警察嚴格看守17哩附近這個區域。不過，真正對於當地實施較積極的管制行動在於7月6日下令的「鐵鎚行動」。而鐵鎚行動也意指「要用鐵鎚捶打共產份子，在共產黨人與革命份子棺材上錘下鐵釘」（盧友愛 2012：91）。

因此，一系列對於防範與攻擊左翼份子的政策也隨之出現。包含：1.成立管制區移植計畫，對當地實施戒嚴，且著手進一步進行新村成立計畫 2.在管制區內的信箱行動 3.砂拉越各地的管制行動 4.報館與任何傳播媒體，被下令須與政府合作，不能報導有助於左翼份子之內容。

如依據在1965年7月8日，在鐵鎚行動宣佈兩日後的砂拉越本地詩華日報當時的報導，即可略知那段時期的狀況：

首長召見兩反對黨領袖 闡釋政府所採行動 首長謂管制地區乃共產黨溫床 共產黨及親共居民佔八十巴仙 並警告報章勿發表不效忠言論

首席部長也於昨日九時在其辦公室舉行記者招待會，首席部長會上透露，政府較早時宣稱要在邊境地區實施移置計畫，其實該邊境地區就是指目前這個地帶，政府所以未指明上述地區，是唯恐預先宣佈時，十五哩、十七哩、十九哩、廿一哩及廿四哩一帶的華人，可能通通都跑掉。

首席部長又稱，該區是共產黨的溫床，那兒的居民效忠政府者只有廿巴仙，另外八十巴仙不都是親共產黨，即是共產黨人。因此，政府必須要在這個地區內實施移植計畫，以作為對該區華族居民不與政府合作的一個教訓。

首席部長同時亦呼請報館與當局合作，並警告稱，如報館採取不合作的態度，發表違反本邦，有助於敵人的言論，當局將採取嚴厲的行動對付，主編將遭拘留，報館也將被封禁。

(1965/7/8 詩華日報)

在鐵鎚行動宣布之後，政府除了一方面打擊左翼份子的勢力之外，在新村成立之前的管制區移植計畫，也讓17哩附近的華人，無論在生活或人身自由上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成邦江路管制區農人渴望運出農產品出售 商人要求至晉配貨未獲准 居民營養不良因濕氣患病

自當局宣布成邦江路十五哩至廿五哩為管制區以來，警方逮捕了約五十名嫌疑共產份子，在他們中包括縣議員、校董、教員、農人等。

據稱：他們先後被押底本市對河集中營去²³。

又悉：他們的受逮捕，可能是警方依過去的黑名單而採取這項行動者。

記者周日訪問該地區時獲悉，他那兒的人民已有上千名患上了病。根據醫務人員稱。他們所患的病大多數是因水份不足營養不良以及濕氣等關係。

據該地區商店老闆稱，他們的存貨無多，曾要求當局應許他們前來本市配貨。但還沒有獲得批准。他們希望當局能迅速的解決此問題。

菜農與椒農稱，他們正渴望當局為他們的蔬菜、胡椒、樹膠等物品，運出管制區外拋售。因上述農產品如蔬菜成熟了，沒有割下，會腐爛的。胡椒與樹膠沒有售出，便沒有辦法買到米糧。

新村居民稱，衣食住行是他們的四大問題了。

警方一發言人昨午宣稱，晉連公路十哩路至廿四哩白天上午六時至下午七時通車的限制現已取消，但在必要時，將不予通告而在沿路設路障及檢查站檢查來往的交通。

茲促公眾注意，該區仍在每天下午七時至翌晨六時實施宵禁，除非持有省督監的准字。任何非土著人士只能居住在十五里、廿一里及廿四里等集中居住區不准居住在管制區其他地方。

平常不居住在管制區的人，夜間不要留在集中居住區內，因為可能受到很大的不便。

在實行鐵鏈行動期間，被令限居的人士，除非持有省警監的准字，不得在任何時間離開管制區，同時在下午七時至次晨六時間，不得離開他們受限的居住地。」

(1965/7/14 詩華日報)

據 1965 年 7 月 14 日詩華日報報載，在當時的管制區階段，17 哩鄰近的所有華人區域，從晉連路 15 哩至 24 哩，各區域的華人，都被各自集中於不同的劃定管制區。在管

²³ 一開始因左翼運動被捕的左翼份子，會先押到古晉另一個監獄，隨後才會被轉送到六哩的拘留中心。

制區內的華人，若非有特別的出入通行證，否則都無法離開管制區，只能在每日晚間七時至隔日凌晨六時以外的時間，回到居住地範圍內的田園務農。

然而，對於這些管制區的華人來說，即使可以在指定的時間內回到園裡工作，也需要面臨這段時期收成的蔬菜、胡椒或橡膠無法運送到城市的窘境。再加上他們被強行遷入管制區時，大多數人都處在慌亂、不知所措的狀態之下，以至於他們不僅在經濟上面臨很大的壓力，在精神或自由被限制的疲勞與衝擊亦是。

如當年才10多歲，卻仍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的陳先生描述起那天的晚上：

1965 年的那個晚上有那個車子要到西連去，然後他們就去炸掉那個橋，不要讓人過。然後那些「山老鼠」又去攻打警察署。之後早上的時候，飛機就在天空飛一邊發傳單，過不久就變成禁區了，我們 15 哩那裡也同樣變成禁區了。

(130801_001 陳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8/31)

陳先生家住距離 17 哩約兩三公里遠處的 15 哩，雖然事情發生的地點與他們所在的地區尚存一些距離，但由於他們居住的 15 哩農村多為華人聚落，因此也遭致牽連管制：

那時候還是禁區不能出來。把我們禁在店那裡三天，不能出去。到了三四日之後，才可以回去家裡。但是回去還是要求拿完東西就要回來我們家的店那裡。然後如果要去巴剎(Pasar；市場)必須要拿卡，才能出去。

(130801_001 陳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8/31)

另一位同樣住在15哩地區的官阿姨，在事情發生時，已經10多歲，因此她之於上述提到的陳先生，感受又為更深刻了：

以前我們家是在幫人割樹膠的。那時候發生事情的時候，我們也剛好在割膠，在等那個膠流出來的時候，剛好飛機跑過...那時候我才10多歲而已。那個飛機還丟那個傳單...我現在都還記得有紅色、有青色，我們就想天上的飛機有可能會講話嘛！我們就很怕...因為也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因為它丟太多了.....我們就拿那個傳單，就那紙來看。它上面就寫叫我們看到這個通知就要回家了....我大哥、大嫂....我們就回家囉！他叫我們回家，那個樹膠就沒有收了，全部收收就回家去了，身體都發抖，很怕...。

(131008_001 官阿姨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0/8)

當時家中以幫人收割樹膠和種胡椒為主的官阿姨原本家住15哩，由於他們家不像這個區域內多數的華人家庭，多多少少都有親戚或朋友去參與左翼地下活動，以至於他們對於左翼運動的狀況一無所知：

起初的時候，是有一點亂啦！講恐怖份子、共產黨...前幾天那飛機還沒來來的時候，就有聽到很多消息了，講警方有開槍打死，他是講恐怖份子...那時候是有聽到這樣的消息啦！(但)還沒有通知，就還沒有叫我們去禁區的時候，就有聽到這些消息了。(對於左翼份子)我們不知道、我們根本就不可以知道...一開始就很平靜阿！後來他們共產黨的就是反政府的嘛！我們那時候就回家，那時候滿屋子的兵。很多政府的兵！他叫我媽媽講說趕快收拾一些衣服、什麼阿！不可以住我們自己的家了。要搬去店那裡...通通人都要搬去店，不是只有我們搬。只要是我們那個鄉村的人通通都要搬去店...因為他就投那個傳單了...叫我們回家嘛！回到家就很多兵在我們家，大概有20多個兵...

(131008_001 官阿姨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0/8)

但是，真正讓官阿姨他們感受到恐懼，在於當時政府在發生鐵槌行動後實行的高壓手段，迫使這些華人在毫無準備之下，像逃難一般離開他們原本在膠園裡的家：

你看這樣突然間叫我們搬走，離開我們的家...哪裡捨得...哪裡不哭啊！我媽哭喔！我們也哭...就收拾那些重要的東西走囉！我們出就去我們比較認識的那裡...他沒有限制說我們要去哪一間店，沒有！是我們自己去找的...那個店老闆也不能夠講什麼...就是誰來了就收...(當時)從園裡回家。就樹膠什麼就先挑回家...(兵)幾時來我們也不知道，因為我們也沒有在家。這樣突然間叫我們這樣出，誰不嚇壞了...而且後來去店的時候，拉子²⁴和馬來人就沒有...就是這樣很不公平嘛！這樣原本我們園有種什麼東西...我們就不能夠看守了。土人有幾種，有馬來人、土著他們...他們就自由跑，就只有我們華人給他這樣關，算起來也是很 unfair 啊！

(131008_001 官阿姨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0/8)

在訪談時，不如那些家中有左翼份子或是曾參與過運動的華人，雖然官阿姨或陳先生當年年紀尚小，但講起這起攻擊行動，以及後續政府的作為時，依然是心中揮之不去的記憶。同時，那個突然被迫搬遷的陰影，也一直存留於心中，讓他們不僅心有餘悸，甚至多年後再次提起那段往事時，還是感到憂傷和不捨原本在 15 哩的家。

²⁴ 拉子為當地華人對原住民略帶有歧視性質的稱呼

在這些記憶的背後，或許對於這些沒有涉及的華人來說，除了面對被汙名為「山老鼠」的左翼份子隨時可能出現的未知，還必須面臨當時華人聚落內左右兩派相異立場的對立，甚至是被迫選邊站的無奈。就如同回溯到最初左翼運動進入到這個古晉郊區的華人區域時，報導人李婆婆即提到「不跟著大隊走，人家會說你是走狗。」因而在整個大潮流之下，多數人選擇追隨，即使對於這個「反政府」的大隊，有著許多的未知和不明瞭。而這種氣氛，也繼續延續到鐵槌行動後的管制區與新村階段。這使得原本如果就是相異或無特定立場的華人，在進入了管制區生活後，生活反而更為困難。再加上政府之後於鐵槌行動下的一連串管制，讓這些無辜，也不願被波及的「受害者」，在回憶起當年這段往事時，是充滿憤怒與無奈的。

然而，無論是哪一方立場的華人，在面對龐大公權力制約下，終究都無從抵抗。再者，政府下一步的新村成立計劃，美其名是新生活的再造，但對這些華人來說，也許又是另一個未知的恐懼。



三、新村成立計畫

政府於「鐵槌行動」的下一個階段為成立人口更為集中的新村管制區。這類型的新村管制區，也是仿效在 1940 年代，英國殖民政府於馬來半島為了防範馬來亞共產黨勢力繼續擴張下所成立的 400 多個新村。只是物換星移，到了 1965 年，由馬來人當權的馬來西亞政府也仍然沿用過去的方式，牽制在這塊土地上，被視為異端的左翼活動。

(一) 三個華人新村的誕生

在這個階段中，政府選定了三個區域，除了將既有的村落，如 17 哩、21 哩重新開闢之外，也選定 22 哩這塊原本沒有人居住的區域作為新的村落。但同時將原本 15 哩、19 哩、24 哩有商店的區域全部封閉，爾後再將這三個區域內原本居住的華人全部遷居分配到三個新村。從 1965 年 8 月 8 日砂拉越詩華日報的報導可得知，當鐵槌行動宣布後一個月，政府即立刻選定了下一階段作為長久居留的管制區：

農業與森林部長張桂生昨指出 西成路十五哩十九哩及廿四哩巴剎將予封閉—政府已選定地點建立新保護村

農業和森林部長張桂生先生今日披露說：當局已經在古晉西連路十七英里、廿一英里以及廿二英里半的地方建立三個新的保護村，這三個新村使用本地的名字來命名，就是實不蘭，布拉卓和達巴，張桂生說，政府選定這三個地點，因為這些地方適合建設永久性的鄉村，一方面因為這些地方為移植農民提供最便利之生活設施，這三個新村，是依照馬來亞各地土地和發展計畫之形式而設計的，目的是適合純粹農業生活之需求。張桂生先生說，每一個移植的人家可以得到三須古土地(約 18X20 平方尺的大小)，這些土地稍後便將賣給每一家人²⁵，年限為六十年，他說，土地測量員和估稅員已經在每一個新村展開工作，把土地農作物及建築物之詳細情形記錄下來，在徵用土地手續完畢之後，將作為償費之根據，凡是被徵用之土地都要遵照例常辦法，付還賠償費。

農林部長說：實不蘭(Siburan)巴剎(市場)將加以保留，巴剎商店之住戶將不回原來之場所居住，十五英里十九英里和廿四英里的巴剎將加以封閉，政府將建築新的商店撥給十五，十九和廿四里巴剎店屋之租戶和屋主去居住，不過並不是免費的，政府準備進行部屬把這些商店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賣出去。」(1965/8/8 詩華日報)

而這三個聚落也在還在規劃期間，就被賦予了三個全新且富有意涵的名稱：

西成路三個新保護村 命名新生來拓及大富—意味擺脫共黨之威脅步向繁榮

星期日(八日)，當局曾向古晉，西連公路管制區五個村莊居民，廣播了一項本州農林部長張桂生氏於七日在本州馬來西亞廣播電台廣播的演詞的客話翻譯，並解釋了五個受保護新村的村落²⁶。

本州政府發言人昨日稱，十七里新村的村名，塞布倫(Siburan)，乃取之該地區的一座小山的名字。

業已告當地村民周之，這新村的官方華文譯名為新生村，意指當地人民將能過著新的生活，不受共產份子威嚇。

二十一里比拉卓(Beratok)新村的字，亦取之于當地的一座小山，官方譯名為來拓村，意指大家前來開拓，共同來開發這座村莊。

²⁵ 這裡所提及之新村土將賣給村民之內容，指的是每塊新村被劃歸土地的地契。但新村多數的村民因新村初期的動亂，通常沒有在一開始宣布可以購買土地所有權時就購買，多數人還是等到新村環境穩定之後才決定買下。

²⁶ 意指在新村尚未成立以前的過渡時期，政府主要依據 15 哩、17 哩、19 哩、21 哩、24 哩分別在華人聚落的商店區規劃成的五個管制區。

廿二里半的泰芭村(Tapah)，是第三座保護新村，取名于當地流過的一條河。官方的華文譯名為大富村，意指大富大貴與興欣欣向榮。但希望將來不單大富村的村民，而是管制區的各族所有人民，皆能在一旦擺脫共產，威脅之時，享有富貴繁榮。

(1965/8/11 詩華日報)

從這三個新村分別為「新生村」、「來拓村」、「大富村」的華文新名稱可得知，其在背後意義上，隱含著政府期待這些華人能脫離左派思想與一切和左翼有關的行動，重新開始在新村展開新的生活，進而享有往後的富足。

但這些「期待」，在當時對於這個區域內，根本不確定未來究竟在何方的華人來說，只會認為那是政府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真正面對不堪環境與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依然還是村落中的這些華人，再加上他們遷入新村生活的初期，並沒有如政府所期待地如此美好。除了必須面對無力抵抗的政治問題外，經濟的困窘、不安定，才更是這些新村村民所期待政府優先去解決的。



(二) 新村搬遷初期

在鐵鏈行動後，政府開始於選定的區域，著手規劃與進行一系列的拓殖活動。以 17 哩為例，雖然原本 17 哩在新村成立以前，即在 1950 年代起政府就已經在當地陸續有發展計畫的進行，卻僅拓展於 17 哩外圍緊鄰晉連路的商店區。而商店區之外的區域，依然還是為被當地華人稱為「山芭地」的地方，是以胡椒、蔬菜種植，且農民散居居住的區域。但後來政府將三個新村之中最大的「新生村」選定於此拓殖，使得原本 17 哩佔絕大面積的「山芭地」，在新村成立以前被迫徵收，之後於全部剷平後，再重新劃分為村民新的居住地。

在政府平均以每戶面積約 25 點(18X20 平方尺)丈量劃定與抽籤決定村民新的居住地後，村民又再獲得 1500 元令吉的賠償金，以作為村民在新的居住地建造新房屋之補償，不久後，新村裡一間間長相雷同、大小也相似的鋅板屋開始佇立於村子的各個巷子，原本住在臨時管制區的村民，也於同年的 11 月初陸續搬進新建好的鋅板屋。如當時的報紙所述：

管制區內居民 昨日搬入新屋 首長文告呼籲合作防共

本州首長拿督寧甘特別向昨日開始搬入他們新生村及來拓村新屋人民發表下述文告：

六月廿七日，在本地共產份子協助下，印尼恐怖份子在你們的地區進行了謀殺。政府不能容忍這種殺害人民的行徑。因此，政府不得不採取步驟對付共產份子，並安排保護人民。

對過去五個月內，社會上無辜人民遭遇到任何不便，政府表示遺憾，但你們必須明白這應該歸咎印尼人民及共產份子及那些社會上支持敵人或不揭露敵人的份子。

現在你們已搬遷新生村及來拓村，首先我欲向所有顯示合作建築起他們屋子的公民致賀，政府在籌畫這些新生村上，花了不少精力，所有人民亦如此。這是良好理想，表示了人民正在學習跟政府合作。

新村的生活，在開始時不會太舒適，政府亦不擬給你們超過砂羅越所有其他公民的援助。可是如果你們勤勞工作，與當局合作，當可改善新村，使之成為愉快方便居住地。

這是很重要的，你們必須在驅逐共產份子方面，跟政府合作，政府將盡最大能力保護你們，但除非你們在得到有關共產份子及其活動的情報時，隨時報告。否則政府不能保證對你們的保護。在這方面協助政府是擊敗共產份子及確保社會安寧的最佳途徑。因此，為了你們自身的利益，隨時提供這種情報。

(1965/11/1 詩華日報)

從報紙新聞的內容中可感受的到，在當時政府即使表面上期許三個新村的華人能夠開始擁有嶄新的生活，但實際上他們著重的仍然是「擊敗與杜絕共產分子」這件事情，以至於總是藉由新聞宣傳向村民強調「和政府合作的重要性」，卻忽略了其實在這種情況下多數的華人村民們，擔憂的是在新村生活的民生、經濟狀況，而非「共產黨的侵擾」。

17 哩新村的作家夢羔子，就曾在撰寫新村相關之往事的文章中，表露了當時的狀況：

新村一成立，政府就撥款一千五百令吉給每戶受影響的家庭，去興建同一個模式的鋅板屋。之前辛辛苦苦鑽進山林尋找木料，掏腰包去買幾千匹編織好的亞答葉，精力、時間與金錢都白白消耗掉了。起初，人們還能自我安慰，樂觀地預測，或許只是禁錮一段短時期，可是局勢越來越惡化，想回故居的願望

也越來越渺茫。生活起居受到牽連，顧得了飯碗，已沒有多餘的精力修復那已無望再住下去的房子。

(夢羔子 2011)

就如同大部分的村民一樣，起初剛搬進新村時，大家都還會在心裡想著，也許有一天還是能回到各自在遷移以前的家繼續生活，而非全家一家大小，通通擠在新村裡才約 18X20 平方尺大小的鋅版木屋裡。但在當時鶴唳風聲的情況之下，「回家」談何容易？

那時候我們在這，也不知道要在這裡住多久，是臨時的，還是怎樣，就都是未知數...那個時候的心情很難... 不像現在就是住定了... 那個時候就都什麼都不知道...人家講說要關個三五年就可以回去啦！就...很多版本...我也是有點希望是...可以倒回去啦！倒回去園裡的生活，但是那時候也不知道...可是還是想說有一點生活可以回到園裡生活。

(130207_001 鍾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2/7)

再者，對這些新村村民來說，即使搬遷到新村，政府有提供一些額外的補償。但終究入不敷出，同時因為是非志願與強迫性搬遷，也讓他們對新村新建的房子和居住地更加缺乏認同感。總會在心中暗自盼望著，有天可以搬回自己原本在新村外的老家，因此也談不上要購買在新村居住的這塊土地的地契了。

對，就是那時候，突然多了這麼多人...有點點不太適應這樣...不僅我啦！我父親以前也是很抗拒的，他說「為什麼我要去住你們的屋子，我自己就有我的地方、我的屋子」就像那屋子的地契，他等到很久才買回來喔!! 他有點抗拒喔!!!... 那時候你抗拒也沒有辦法，那都是法令囉！有很多警察在那邊。你不能夠反抗，哪能夠反抗...他那時候壓制下來，也是不能夠講要反抗他。沒有辦法反抗，只能承受囉！

(130207_001 鍾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2/7)

另外，在政府嚴密進出管制下，其將三個新村的周圍，皆用雙層的鐵絲網做成籬笆與外面隔絕。以 17 哩新生村來說，整個村子對外的聯絡通道只有在村子最外圍連接晉連路的大門。而政府在門禁管制上，起初延續著在管制區階段的規定，即管制村民必須在每日的早上六點至晚間六點才能離開新村，且村民離開或新村外的人要進來新村都需要被批准才能通行。

後來搬到 17 哩做生意和定居的田先生，在訪談時就提到了新村成立初期，新村內外進出上的不方便：

那時候我們家原本在22哩，然後我爸爸在17哩做生意，但戒嚴的時候，我和我爸爸就搬到17哩來。每天如果要出去都必須要討准證(進出新村通行證)...很不方便...像他們住在新村的，就每天要回園還要看警察的臉囉！不能夠大小聲的...因為要求情要每天都要回囉！我們做生意，會瞭解這些嘛！他們每天進出的人，每天都是這樣的東西嘛！有時候要進貨，也是得經過他們去討字(進出新村通行證)那些。那時候很戒嚴...那時候要去跟縣長、管這個村的討字。
(130904_004 田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4)

除了進出新村管制區需要再申請特殊准證之外，如果在開放的時間要回去原本自己的田園工作，若是有攜帶糧食也會被官兵特別檢查，以防新村村民將食物偷偷供應給新村外的地下活動的成員。

那時候我們回去 15 哩的園有帶食物都會被檢查，不能帶多多出去的...兵都會在入口那裡一個一個查...而且一開始的時候很苦啊!在園裡的東西都會被偷走，不能每天去看阿!也不能去割樹膠...樹膠得半夜的時候去弄...所以割樹膠的人都不能去了...所以說辛苦啦！那時候真的很辛苦。像我們也是很辛苦，園都沒有做。

(130915_001 官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15)

原本是 15 哩人，後來因新村管制被迫舉家搬到 17 哩的官爺爺一家人，就經歷了新村成立初期，每天早上要回去原本 15 哩的田園務農時，因為新村在進出管制上所帶來的不自由。同時，官爺爺於訪談時，也提及了自己在管制初期，親身經歷且讓他仍然感到恐懼的往事：

我那時候我還年輕，我坐那個摩托車，在古晉那邊做，我回的時候，下午五點左右....我跑去七哩那邊，我碰到有一個七哩學生，他跑路喔！跑到 15 哩那邊！他跑錯路了，跑到 15 哩那邊。7 哩到 15 哩，跑到她腳都破了，我上到 15 哩那邊，剛好碰到，我看到拉子小孩就去捉弄他，後來我就停下來，問那個學生說，他都不講話了...在那邊哭。後來我看他的校服，我就知道是 7 哩的學校...後來我問那個女孩子，我說你從哪裡來，他也不會應我，我就想他應該是七哩來的，我就載她回去了。但那時候差不多要戒嚴了...15 分鐘內要回來...

我回 17 哩時，已經關門了。警察還問我做什麼，怎麼會那麼遲才回。我和他講，騙他說我做工做比較晚... 他就講說，你不能夠再這樣晚囉！一下子... 警察要走了，他關了門要走了，他有看我來就開門叫我進... 他就警告我說，你不能夠這樣遲才回了。

(130915_001 官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15)

由於官爺爺年輕時擔任政府工(公務員)，每天必須往來古晉與新村來回近兩個小時的車程工作。但是政府在新村每日的門禁管制，在當時依然沒有對這些去其他地方工作的新村人在管制時間上有特別的寬容，相對地他們被一視同仁。也使得在新村成立初期，不僅那些回到新村外圍務農的村民對於準時回到新村感到焦慮之外，像官爺爺這類必須要到車程更遙遠地方工作的人對於準時回到新村又更為謹慎，深怕一有延誤，就回不了家。不過，在官爺爺於訪談中所描述的當天，他基於人道立場，護送了路邊遇到的小女孩回到學校，卻必須面臨回到新村後，管制進出警察的詢問與警告。這也讓他在事件過了40多年，依然記憶猶新。



(三) 戒嚴管制下的新村

新村建立之後，從不同地方搬進新村的村民們生活雖然日趨穩定，逐漸擺脫剛開始的無所適從。但當地的戒嚴管制並沒有因此轉為寬鬆，反而隨著左翼份子出來活動的多寡隨時增強與減低管制強度。不僅言論受到限制，在新村裡公開的政治、社團活動也都不被允許參加或成立，更無法享有公民投票的自由。

1. 言論限制

過往，在管制之前，人們可以自由地在店區的咖啡店高談闊論，無論是談論芝麻蒜皮的閒話，或是三五成群熱烈地討論事情。但是在管制之後，為了杜絕左翼份子在村子裡的活躍，政府對新村村民的言論有了限制。

如 17 哩新村的報導人陳先生和鍾先生皆提到了當時新村成立初期在言論自由上的受限制：

像那時候你不能講「毛澤東」...講了就抓啊！那時候跟共產黨有關的東西都不能講，有人就是不小心講到了就被抓走了。

(130831_001 陳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8/31)

在政府為了剷除異己，造成人心叵測的氛圍之下，在村子裡的公開場合中，無論是簡單不過的聚會或是日常的聊天都必須要處處謹慎和小心。因為這些村民他們沒有辦法知道在村裡商店區的咖啡店跟朋友單純喝咖啡聊天時，身旁的陌生人是不是就是政府派來的線人。在言談中，一有風吹草動，可能就會被線人捕風捉影，而被政府兵帶去問話。

不敢講，那時候很多東西都不敢公開講。怕事啊！如果你在公共場所講話大聲一點就... 我有聽到別人講說，有人就在講「我一把鋤頭鋤下去就...起畚箕...」那人家只是在講笑話...但是畚箕和鋤頭是共產黨的標誌喔!!因為他們有那個線人嘛!! 那個時候我們最怕的就是線人。你不知道啊! 就你假如講一句話被聽到，被聽到就完囉!! 不是警察聽到，是線人..所以我們不能亂亂講話，因為誰是線人我們不知道喔!不過那個時候我們最怕的是...因為不是有黨派嗎?如果那個時候是反對黨的人，都比較是是左的...那些人我們就比較不會提防他們。但如果是右的，我們就怕了。不過右的很少...所以我們就懷疑那些線人就是右派的囉!

(130207_001 鍾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2/7)

2. 集會限制

甚至新村內戒嚴法令之一的政治、社會活動的參與備受限制，使得村民也無法擁有集會的自由：

那時候都不能夠.... 最多是你有幾個朋友可能比較熟的啦! 你可以私下講。不然太多人的時候不能講，因為那時候有個「內安法令」，他可以隨時抓你去六哩! 那時候完全沒有言論自由，連集會自由都沒有...像如果他要嚴格執行的話，像三個人聚在一起，他就要抓你了喔! 不過，他沒有這麼嚴啦! 但是那時候真的是「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都沒有...

(130207_001 鍾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2/7)

因此，在重重法令之下，致使農村社會中人與人間原有的樸實與信任，也被蒙上詭譎的陰影。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是不是有天不小心犯了什麼錯、講了甚麼話，就會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

那都是政治部在查。他們政治部，假如你參過反政府的，他們會了解。那時候就是政治部最大喔！因為那時候政治部的來查。他有很多下線... 就好像他接到情報，就去查。可能有的人要害你，就去報你囉！報你就去查，抓去問話囉！因為你不能夠亂亂講，可能會害到你自已喔！因為你跟你對方朋友講政治這些，你不知道對方是好人還壞人...要是壞人，他說你講這些東西，你也是被抓囉！
(130904_004 田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4)

甚至若被政府兵發現家中藏匿或是暗中幫助左翼相關之人士，也將受到責罰，嚴重者還有被移送至六哩中央拘留中心的可能。

我不是做那個的，我就知道了。如果他抓到你有藏恐怖份子，有人家報，他就抓你去打、去監牢。那時也是被抓去監牢的也是很多。因為我們做生意的，他們沒有證據抓我們。
(130904_004 田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4)

3. 書寫自白書

在新村的日子陸續又過了幾年，曾經有參與過左翼運動的村民們，即使沒有因特殊罪名被抓到六哩拘留中心，但曾經的所作所為，彷彿揮之不去的印記，任何有關的參與紀錄都被把持在政府的手上。在無能為力對抗政府之餘，「自白書」成為這些左翼份子們保護自己免於受到責罰的武器。

我：所以你們那時候也有寫自白書喔！？

鄧：有喔！

我：他怎麼會查到你有去做這個事情？

溫：就是寫說當時我送信送給誰....

我：然後他就查那些自白書，去看對不對嗎？

鄧：因為你寫的資料，我這樣對一下，就知道了嘛！

我：這樣也不能亂寫喔！

溫：因為身邊的人都講了，只剩下我自己...你想他會不知道嗎？！

我：那什麼時候要寫自白書的？

溫：你如果要清白的話，你直接告訴他...你做什麼東西....

我：他是有了新村之後，就開始叫大家要寫自白書了嗎？

溫妻：沒有差不多有七八年了之後，因為我們結婚就是73年結婚的，是那時候...65年我們參加的...

鄧：問題是你如果之後要參加社團活動...你必須是清白的人。

我：所以他其實是要確認你們的背景是怎樣囉？

鄧：對！

溫：像我們要做甲必丹這些...如果你沒有寫那個自白書，你也無法當。

鄧：他必須知道你的案底，你才可以搞社團，你要申請社團也是...證明你都沒事了，才能去社團的主席，如果他查到你沒寫，就慘囉！

溫：連社團都不行參加了。

鄧：所以逼著你每個有參加活動的人都要去寫，除非你不要活動、不要去搞社團。

溫妻：以前你如果不寫證明的話，你去哪裡都很困難...

鄧：出國的話你更別想了，一定要去自白一下。

溫：像當時要去外面做工的，你也要給我寫好來，才能出去。

鄧：反正就是警察那邊的檔案在交了自白書後，會寫無罪了。

我：也是有人沒有承認嗎？

鄧：他不打算做事，就不用承認啦！

溫：有些人不承認，他也是過平常的生活。

我：可是警察署那裡還是有案底？

溫：還是有，到現在都還有。

我：可是其他這些又不是這麼大的人也有份喔？

溫：有人家說你有做那些事情，你都有案底在那邊的。

(140114_001 溫先生、鄧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4)

報導人溫先生與鄧爺爺皆是住在 17 哩附近的村民。在他們年輕時都參與過左翼運動，在訪談中他們提到，無論涉及左翼運動的程度多寡，政府手中都握有新村內曾參與者的名單。因此，移入新村後的陸續幾年，開始慢慢有許多參與者開始書寫「自白書」，大略的說明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之後千篇一律再寫上如 1967 年 10 月 30 日於詩華日報刊登的前左翼份子鄧子欽自白書的類似內容：

感謝政府。給我自新的機會，在此我也呼籲那些仍在活動的地下份子，包括那些仍在邊界活動的武裝份子，應該早放棄無謂的鬥爭，你們的父母、妻兒、兄弟、姊妹、朋友，正盼望你們早日回來，回到自己的家園團聚，共同建設我們

的國家馬來西亞。

(摘錄自 1967 年 10 月 30 日 詩華日報 鄧子欽自白書)

正如同 1967 年與前左翼份子鄧子欽自白書被刊登的同日，另一家砂拉越報社前鋒日報，也刊登了當時尚未入閣的砂拉越人民聯合黨宣教田紹熙針對「自白書」相關內容之評論：

當局似又發大慈悲 釋放十五名拘留者 田紹熙認不外緩和民情 聯盟履行民主應全釋放

當局已於廿八日(星期六)釋放十五名被拘留人士，其中有數人已個別發表了自白書，針對上述事件，人聯黨宣教田紹熙說，當局釋放十五名被拘留者好像又發了一次大慈悲，但這只不過是緩和民情而已。

田氏還說，這些寫自白書人士所謂大揭露過去非法活動都是千篇一律，並沒有什麼新鮮和驚人之處，這不過是一種招認的「罪名」而作為被聯盟逮捕的證據而已。

我根本不相信犯了這樣嚴重錯誤的人士發表了這樣輕鬆的自白書後，就可使他們的罪名一筆勾銷，這也許是一種恢復自由的重大代價，聯盟政權就可以利用來加強其白色恐怖政策。

田氏希望被釋放的拘留者在做任何對朋友對社會不利事情時應三思而後行，才不會一誤再誤。

田氏最後說，若聯盟政權是自稱履行民主制度的話，那麼必須馬上無條件的釋放所有被拘留者。

對於上述十五名被拘留者獲釋之消息，林金聲亦向記者發表了談話，他說當局此種做法是一種政治宣傳攻勢；寫自白書是否出於內心或過去行為所造成乃不得而知，總而言之，這是他們斷送前程的先聲。

林氏最後說，當局公佈自白書並不使人感到驚奇。
(1967/10/30 前鋒日報)

如人聯黨宣教田紹熙所提的「寫自白書是否出於內心或過去行為所造成乃不得而知」，但卻可從這篇新聞以及訪談內容中發現在面對龐大國家公權力之下，多數人往往只能慢慢學會與之共存，卻再也無法像青春年少時，擁有熱情滿溢去堅持那些他們原本

誓死都要維護的理想，於是一篇又一篇雷同的「自白書」隨之出現，因為最終還是得回到那不願面對的現實。

多年後，於 1973 年 10 月底簽訂的斯里阿曼和平協議，之於這些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的青年們，代表著是失望？是回不去？還是在回頭省視下是一個真正的重新開始？

(四) 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

由於當時躲到馬印邊界森林裡的游擊隊左翼份子(加里曼丹人民軍)在政府軍的攻擊之下節節敗退，同時也因印尼蘇加諾政權垮台，無法再取得有效力量對抗政府軍。後來為謀求解決方法，在 1973 年由加里曼丹人民軍領導黃紀作出來與政府在砂拉越中部的省會斯里阿曼(Sri Aman)簽訂和平協議，結束武裝鬥爭，致使砂拉越歷時多年的左翼運動因這個和平協議的簽訂，正式畫下句點(林煜堂 2009)。

但這個和平協議的簽訂，對還身處於六哩政治拘留中心的政治犯們來說，產生很大的打擊。由於受到有關當局的規定若不願寫自白書以承認自己過去做過的事情，也將無法得到釋放。不過這個規定對於年輕氣盛、帶著滿腔熱血誓言反抗政府的青年們，並不構成任何的威脅。起初對他們來說，即使在獄中，也要堅信最初的信仰，每個人總懷抱著希望，期待那一些還在森林裡奮鬥的同志們，有朝一日能夠幫他們實現砂拉越獨立成功的夢想，卻隨著1973年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讓這個夢想也越來越渺茫，同時伴隨著無盡的失落與無奈，但因此換得了釋放，進而回家與家人團聚的機會。而那青春時的雄心壯志，也彷彿成為記憶中的一部分。

在拘留中心的 17 哩村民黃爺爺與他的夥伴們，一開始在得知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簽訂時，並沒有完全相信，反而還抱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認為這可能是政府為了要讓他們投降、承認他們過去的所做所為而放出的假消息。

一直到斯里阿曼... 在那時候我們就知道完了。那時候是收音機有報囉！我們聽了好像是半信半疑... 不知道是真是假... 覺得可能就是政府放假風聲阿！
(130905_001 黃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

直到家人來探望後，將這件事轉達給拘留中心的他們知道，他們才真正認知到，繼續在拘留中心堅持下去也於事無補。因為原本寄望在森林裡的同志能延續他們的力量，持續向政府抗爭。但時至今日，隨著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森林裡的同志們一個個走出森林、放下武器，同時意味著這場在砂拉越歷經近30年的左翼運動也將畫下句點。

到斯里阿曼的時候就沒有希望囉！希望都沒有了，你還做什麼？！一個人做什麼，都還是要一個希望的... 後來就有時候啦！偶爾啦！三五個人高興的時候（才會）談起了... 好像他們還是久久有聚在一起，就有聚餐、談談這樣... 開心開心... 年紀都這麼大了，你再想那些也沒有什麼用了。

(130905_001 黃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

在事過境遷的現在，跟黃爺爺坐在他於17哩家裡的沙發上，聽他講起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以及從拘留中心出來後的過程，竟不同於數十分鐘前講起抗爭時的風光、無畏無懼。相對地，口氣中流露的無奈與失望反而取而代之。緊接著，他提起從拘留中心回到17哩的狀況：

做自己工囉！就好像一個傻瓜樣子囉！什麼都不理！每天就是跟妻子一起到園裡做工囉！店裡也幫忙做囉... 這樣子就是做平常的一個人了... 什麼東西都忘掉它、不要管它了。因為那時候是已經很失望了... 怎麼可能不失望... 搞到這樣久、這樣多年... 付出這麼多心力... 後來一點利益都沒有... 反而還害到家裡的人。害到自己的太太、兒女，讓他們沒人家照顧... 那時候自己也是很內疚啊！

(130905_001 黃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

時隔多年重新呼吸到拘留中心外面自由空氣的黃爺爺，就像其他在17哩新村的村民一樣，開始過著日復一日辛勤工作、養兒育女的日子，過去那段在六哩的生活，好似人生的插曲，無須再刻意提起。然而，即使對最後的結局充滿失望與無奈，但想起他在參與組織活動，以及在拘留中心那段時間對家人的疏於照顧，虧欠與內疚之情依然油然而生。

這些交雜著自我理想與虧欠的複雜情緒體現於每個於六哩拘留中心出來的政治犯。如同另一位17哩村民鍾爺爺，也在從拘留中心出來後，同時又面臨了家中經濟的現實壓

力，讓過去身為人聯黨黨員與地下組織幹部的他，自此生活歸於平淡，不再涉入太多政黨活動，專心為家庭付出。

這些公開的就... 第一我念少書沒有這樣的才幹和能力，後來我從六哩出來也破產了，沒有事業也沒有園了，我被抓了後，沒有人做、園也荒蕪了。還有兄弟幫忙維持一下.... 我被關了回來後，起初還是不敢想要怎樣.... 那時候小孩也才小學而已，後來一班朋友才一起去做建築。我被關了兩年，放出來的時候28歲，30歲才開始做建築。

(130201_002 鍾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2/1)

最終還是回歸家庭的鍾爺爺，歷經身無分文，完全倚靠妻子幫人做衣服，與其他兄弟的幫忙以維持家計的日子後，30歲的他才開始跟著17哩村子出外打工的潮流，慢慢從最基礎的建築工人做起，拉拔家中一個個嗷嗷待哺的小孩長大，也彌補了自己之前被捕時未盡到的責任。

不過，即使想起過去那段歲月時，溫爺爺和黃爺爺，以及多數參與過運動的左翼份子們，情緒中依舊帶著惆悵與無奈，但對於曾經參與過的這些運動與抗爭，他們沒有言語中沒有透露絲毫的後悔，而且仍然堅持著那是件對的事情。

那個是不容易做的，現在你要去做都做不來了。但是那時候整個環境、局勢就是這樣... 我們做的這些事情還比有的人來得好喔！我們是光明磊落去做這個事情，是為了解放人類的事業。這是一個偉大的理想... 我們去做這些事情，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

(130904_001 溫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4)

不會錯！我們是正義的！我們不是反人民的，我們沒有危害人民，這個如果成功，當然對人民是最好的，不成功也沒有大礙。

(130905_001 黃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5)

也許，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時勢所然，造就了17哩這個原本默默無聞的農村成為砂拉越左翼運動的根據地之一。然而，早已白髮蒼蒼的農村青年們的壯志未酬，只成追憶之往事。已然無法再去論斷他們參與過的曾經有什麼是非對錯，畢竟最終馬來西亞的政

治權力依然被把持於華人之外，但至少他們的付出，在這個多元種族的國家，能使得華人的力量再次被看見。

不過，回歸三個新村的討論，當這個聚落在歷史發展上，無可避免地與砂拉越整個政治局勢有密切連結時，它們就再也不是原本單純的華人聚落。再者，若非身處於那個環境下的局內人，卻又鄰近當地的古晉人，他們對於新村的感受，甚至是連帶關係下的左翼份子，或許更又顯得複雜，而這部分的內容則在下一節中作論述。

四、新村外的人看新村

除了新村本地人之外，其他老一輩古晉人對於鄰近古晉郊區因「鐵鎚行動」而形成的這三個華人新村，其實並不陌生。因為從 1965 年新村成立以來，砂拉越當地的報紙便經常有關新村管制區的新聞，無論只是臨時的宵禁通告，或是描敘管制區內的生活情形，甚至新村附近與左翼運動有關的事情等等。致使古晉非新村地區的華人，對「新村」的印象很容易就連結到「共產黨」。

而要追溯這些新村外的局外人，他們看待新村的角可從早期的新聞媒體或政府政策中得知。但撇除其他章節引述的報章於日常新聞所呈現的政府態度之外，從目前有限可蒐集到的文獻資料中，最早對三個新村有一專題性而非新聞性的報導可追溯到 1974 年 3 月 24 日砂拉越當地報社前鋒日報的報導。

當時的前鋒日報以〈矗立的鐵絲網 新村居民等待回復自由 剩餘的游擊隊出來吧！〉為標題，用了一頁全版的篇幅，以及數張新村管制大門、鐵絲網、居民生活的照片，為三個新村作一專題報導。在這篇專題報導於照片及文字敘述中，顯而易見當局欲藉此形塑的新村形象，是充滿「公權力限制」的。包含在村內小孩放學的照片旁附註「這些天真無邪的小孩在放學後，就要回到鐵絲網的籬笆內，多麼可憐！」，或是放了新生村管制的大門照片，而加註「新生村大門，警察日夜在看守者」。

本篇專題內文之摘錄內容如下：

新村概況

在轟動國內外的「斯里阿曼」事件中，有一項極令人引起關注和有關人民長期以來，一直在爭取的事情——解放新村。

這項願望於首席部長拿督耶谷和北加人民軍總司令黃紀作先生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所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中，清楚的指出這一點，根據該具有歷史意義的備忘錄顯示，雙方同意在砂拉越地下組織成員全部願意放下武器，跟政府和平共處的時刻，隨即考慮解除新村藩籬，讓新村人民自由。

座落在第一省古晉西連路的新生、來拓、大富三座村落，是砂拉越僅有的地區性限制區。

在地下組織與政府和人民演變成武裝對抗的十一年間，因為局勢的因素，曾有甚多謠傳政府將在本州其他省份或地區建立同類性質新村，但都不是事實，所以，上述三座新村引起人們的關注，對當地人民行動之不自由，莫不寄予同情。

導致建立新村的主要因素，乃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廿七日一支砂拉越地下組織游擊隊襲擊晉連路十八哩警察署所演成者，在是役中，當時的首席部長拿督史蒂芬加隆寧甘令弟亦遭擊斃，一齊殉難者還有二名警員。

政府基於局勢的演變，與中央當局一致同意設立新村，打擊砂地下組織實力。所以，政府便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即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正式宣布在晉連路十七哩、廿一哩和廿二哩建立「鐵鎚行動區」，約束當地人民的行動，試圖切斷砂地下組織的後援.....(略)

有關新村內外的人民，倘若離開村外的農耕操作地點以外的地區都必須要申請准證，否則面對法律控訴，對外地區人士欲在村內留宿亦然，在新村建立以來，就有頗多這類觸犯案件.....(略)

時值本州之邁向和平康莊大道，全州各族，各階層人民同新村人民一樣希望，限制早日解除。政府已決定，不過仍舊視砂地下成員組織之誠意。因此，人民也同樣希望仍在森林中的殘餘分子，早日返回社會，加速人民要求和平的願望。

(1974/3/24 前鋒日報)

雖然上文所徵引的內容，已經是 1974 年的報紙，又是以一專題形式的文章，但整體而言，還是清楚可見當權者試圖以這類的報導，強化新村生活的困苦與不自由，進而

達到在公開媒介中呼籲左翼分子走出森林，除了藉此完成當局所期待的「安定」之外，又能讓新村外的人在看了這些報導後，接收到若與「共產黨」有所往來，可能會造成的後果。

公開媒體中政府的態度，自然而然地左右了許多不瞭解新村狀況的人對新村的感覺。如同在田野期間，因緣際會下訪談了一對在 1965 年新村開始管制後，想盡辦法離開管制區搬到古晉的夫妻。這位年約 70 歲的 F 先生提到自己是檳城人，過去因為是軍人的緣故才會被調派來砂拉越，後來又因任務的關係才會到 17 哩附近的 19 哩管制區，也因而認識了原本在 19 哩商店區長大的 F 太太。

在近兩個小時的訪談過程裡，他們時不時就透露出他們對於「共產黨」的恐懼與不願多談。「敏感...敏感。現在也是敏感，這個敏感就好像是傷風一樣，一個不小心就打噴嚏了！所以這個敏感的東西少跟他接近、少去談他，就沒事了。就是要遠離啦！人家談談...很少人會要去談。」軍人背景的 F 先生，總是小心翼翼的講著過去的事情，他的態度不同於 17 哩那些參與過左翼運動的村民們，講起往事時總是興高采烈，絲毫不畏懼。對他來說，一切與「共產黨」有關的內容就是敏感的，不經意談論起也許就會惹禍上身。而他所抱持的這種態度，除了在於他原本的身分就是軍人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政府對「共產黨」長久以來的污名有關。後者這點也往往影響了多數沒有參與左翼運動或是並非身處於那個環境之下的旁觀者所抱持的「共產黨=非法」的普遍觀點。

政府不會去宣傳啦！就是會說「共產黨是個非法的！」沒有去直接喊話。就是用報紙、收音機這樣，會說不要跟他們在一起囉！我們遠離他！他跟你這樣講了.....報紙也會這樣寫，你如果要跟他們接近，就是你自己找麻煩囉！那時候沒有人要談的啦！人家很怕！你一談阿！談談談... 等下兩方面，一個是安一個是寧，你哪裡知道對方是不是共產黨的。所以大家不大喜歡談這個東西，人家坐在咖啡店也不談這些事的。只是收音機報告新聞會講講講這樣。所以在咖啡店人家不會跟你談這些，大家都怕.....不然等下人家去政治部那邊.....人家不可能去談的。

(140117_002 F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7)

而 F 太太即使出生的地方就在距離 17 哩約 1 公里遠的商店區，家裡開設雜貨店的她，其實和那些參與左翼運動的 17 哩老一輩新村人的年紀相當，不過她卻沒有因此加

入那些當時正蓬勃發展的組織運動。同時在管制區初成立時，她的爸爸直接放棄了原本在 19 裡的商店和椒園，只趕忙去討特別准證，拜託別人讓她和兄弟姐妹搬出管制區，於是在那個紛擾的年代，她跟原本出生長大逾 20 年的地方，徹底斷了往來。

一家人都搬到古晉的 F 太太，雖然在管制區初期經歷過短暫的無所適從，但相對於後來被迫搬遷至新村受到更多自由、生活限制的其他村民而言，她始終是幸運的。

那時候我爸爸沒有禁到，後來我爸爸才討我們出去的。有！（住管制區）差不多幾個月啦！後來我就下去了....（那時候）當然會怕囉！你就不好超過時間，如果超過，他就會問東問西囉！我不敢，早早就回了。有人太遲回來的。就看你不順眼的，就抓你去六哩囉！不敢太遲的！...（那時候）很多人想出來。後來就留下來了，住到現在，住在那裡也習慣了。

(140117_002 F太太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7)

後來到古晉開始新生活的他們，從媒體上不斷得知的新村管制狀態是如此困窘、不自由，其實也更堅定了他們當時拋下一切、選擇離開的決定是正確的。這同時使他們自然而然的覺得，配合著政府的態度，不去與之對抗，或許才能得到最大的幸福，進而獲得政府所期望下的安定。

五、小結—這裡開始成為家

有走過 1960 年代的 17 哩新村人其實都明白新村的過去，無論是曾義憤填膺、絲毫不畏懼參與地下活動的左翼分子，或是原本根本不涉入其中卻莫名被牽連進這場風波的村民，甚至還有當年才十多歲對於事件記憶猶新，卻什麼都不明瞭的新村小孩。這些人共同經歷了新村成立的前與後，見證了這裡從荒蕪至現今的繁榮，而那戒嚴管制下的不方便與不自由、政治氛圍下人心惶惶，以及每天擔憂生計、收成的日子，似乎已經是很遙遠的過去。當沒有人問起時，那只是段塵封於這群新村老一輩村民記憶裡的往事。對於那些參與過地下活動的村民來說，當「大勢已去」回歸正常生活後的他們，就像一般人一樣，每天早起開店做生意，閒暇時再回去田園裡種菜；或是有的人結婚生子，讓人生有了全新的改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繁忙於家庭、生計，曾經轟轟烈烈要「反政府」、「反殖民」的過去，彷彿是年輕時一場永遠無法成功的夢。

然而，隨著時間，這塊土地陪著這些新村人，走過新村成立初期的苦悶與艱辛，歷經革命的驕傲與失落，曾幾何時那個原本想要離開的「屋子」，也變成決定要落地生根的「家」，除了情感的依戀，還有對這塊土地的認同，進而生生不息地孕育著一代又一代的新村人。

而這個從對新村不認同的村外人逐漸到成為新村人，在地方感上的轉換，以及年輕一代未曾經歷過新村管制時期的新村人，他們的地方感又和老一輩的新村人有什麼不同，這都將在之後的章節中做進一步的論述。



第五章 落地生根—我是 17 哩新村人

走過紛擾，歷經 48 年的戒嚴管制，直至 1980 年 3 月 5 日，三個在古晉晉連路上的新村才正式解除了管制(林煜堂 2009)。但這個過去期盼好久的消息，對這些早已逐漸適應新村生活的村民來說，似乎只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象徵意義。過去他們在乎的是新村有天能完全開放、解嚴，而非總是擔憂錯過新村大門管制的時間；以及能夠早日回去之前自己在「山芭」裡的家，那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但這些原本在新村成立初期的盼望，隨著時間，以及種種更為現實的因素，無論是經濟、生活等等，都讓人慢慢忘了那些曾經的渴望。抑或，其實那總是盼望的安定，也慢慢體現於新村的生活中。進而衍生出，屬於「新村人」或是「17 哩人」對這塊地方在情感上的依附與連結。

然而，這種地方感的形成，並非一蹴可及。除了歷史背景下的社會因素加速了這個村落的形成，爾後 17 哩人胼手胝足，一步步建立起的「17 哩」，或許才是這種地方感生成的契機。

因此，本節將從 17 哩新村人於新村內暫時的住屋變化到可長久居住的水泥屋談起他們決定落地生根的過程。進一步地，當個別的「家」陸續被建成之後，這個村落也不再停留在新村成立初期政府所規劃的狀態之下。反之，新村開始有了可供村民活動、集會的會堂與廣場；早在新村成立前就有的 17 哩華小，也在新村生活穩定後，由村民逐步擴大學校規模、建立新的校舍。此外，既有的慈善會社、各類以村為主的社團組織，包含籃球隊、土風舞社團，也繼續延續或因應時代潮流，而誕生新的社團。再加上，近年來隨著新村本地的開發商，回到新村開發與投資，為 17 哩注入了嶄新的商業發展。

這一系列的發展與改變，致使這個村落，揮別了最初的椒園小鎮、插曲般的左翼往事，成為 17 哩新村村民永遠離不開的依歸。

一、從鋅版屋到水泥房

從鋅板屋到水泥房的過程，其實可以發現這對於17哩新村村民來說，這或許也是一個認同轉變很大的契機。因為當村民逐漸適應了新村內的生活後，下一步何去何從，也成為他們必要考量的事情。

然而，若非決定要將此處當成長久居所，對於這些曾被高壓手段、被迫搬遷至新村的村民，或許並不會願意在這個過去渴望離開的地方大興土木，選擇重新整建原本老舊的房子，甚至將其改建為更適宜長久定居的家園。

訪談了幾位當時被迫搬進17哩新生村的村民，最終會選擇留下的原因，他們提到：

我的父母親是沒這樣啦！但覺得雖然亂是亂，但我也不同意要離開這個地方，一直堅持囉！有一些還是會想去園那個家，不過有一部分是說經濟上的能力還沒辦法，但也是很晚才拿地契。（不過）到了80年代以後了。因為幾十年那個屋子也爛了，孩子去外面打工有一點積蓄了。住這裡久了習慣了、也麻木了。起初真的是很討厭... 因為出那個大門，兵都會搜你的東西，也失去人身自由。政治部是假如你稍微有問題，他就會去查你了，他就去你家找你。
(130201_002 鍾爺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2/1)

歷經左翼活動參與時的義憤填膺，以及被捕進入六哩拘留中心與整個左翼活動無疾而終的灰心失落，最終擺脫政治紛擾，選擇回歸樸實田園生活的鍾爺爺，提及他的父親在新村成立初期，像大多數的村民一樣，在生活尚存紛擾、堪憂的狀況之下，在心中依然是盼望能回到原本在新村外的家。所以即使政府在最初以極為低廉的價格將村民們在17哩住所的那塊土地賣給他們時，多數人仍不接受。直到新村管制後期，村內管制戒嚴的狀況舒緩，再加上後來新村內部的基礎設施陸續建成，這時對照於他們那基礎設施貧乏且在方圓幾公尺內杳無人煙的老家，許多村民這時才慢慢不再抱持著「回家」的盼望。

如另一位原本也是住在新村外圍地區山芭裡的 17 哩新村報導人鍾先生也提到：

時代又變了，新村又給你水、電、電話...如果你倒回去，那邊什麼都沒有你願意嗎？人是...可能跟時代脫不了關係，因為誰願意倒回去那邊沒水沒電。像我父親他口口聲聲也講說我有地方，我有屋子為什麼我還要住你的地方。後來就住慣了，就沒有講了唷！可能是習慣...慣了...以前住在園裡面，你早上直接起來就可以做工，不用像住在新村裡一樣，你還要跑路去做工，趕快要跑路回來，他們是這樣不滿。

(130131_001 鍾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31)

在時代變遷下，新村這個人口集中居住的區域，自然是政府在水、電、通訊之安裝與革新會優先選擇之處。因此，相對於早已荒廢的老家，習慣有自來水電生活的村民，在生活日趨穩定下，也逐漸把這裡視為自己的另一個家。

那時候可能是...剛剛從園裡出來，那時候的環境跟新村的環境完全是兩回事，可能那邊是一點封閉，這邊是人多又不一樣。所以慢慢慢慢...人也是讓環境所改變了...因為原本不習慣也慢慢變習慣了。然後你習慣了這邊的人多，你又要回人不多的地方你就怕了嘛！我們以前也是這樣...雖然開放了，可是晚上我們還是不敢回園裡去喔！我怕...怕暗...晚上不敢出去喔！大了，現在一個人也敢回去了。以前我不敢晚上回去...怕暗...因為新村的時候，人很多，燈火很多。熱鬧...然後回去沒有人，很暗、會怕...不習慣。人是給環境改變了...人受到環境的改變，人就改變了。通常是你改向好的那面，如果你倒回去，你又不能夠接受了喔！時代是向前跑的...你的日子現在是怎樣過的，叫你倒回去過你以前的日子，哪有誰願意？因為在剛開始的時候你其實不能確定你是不是可以長期住在這裡，還是...臨時住在這裡，沒有人給你答案。

(130131_001 鍾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31)

無可否認的，最初搬遷進來時，在時代的慌亂、不安之下，多數的村民永遠不知道未來的日子在何方，只知道在這有限、困窘的環境之下，唯有努力工作、照顧家庭，安分地遵照政府的指示，不談論太多的政治，或許才能在這亂世之中安然地生存下來。

有屋子了...可是你還是會想，是不是要住很久？是不是要關很久，還是怎樣...沒有答案的，所以人人都怕喔！人都會擔憂，沒看到前景，暗矇矇這樣。如果政府一開始進新村就說，我要禁你二十年，二十年後你才有自由，我有個

底在那邊，我知道有未來。我們剛來的時候是什麼都看不到.....沒有...未來都沒有，所以會怕喔！...後來就有的人他們在古晉那邊做工的人啊！他們如果是在新村裡面住的，他們做工也是靠近他們做工那邊買屋子，這邊的也是賣掉。搬出去的也有....以前...新村的地還是不很值錢嘛！

(130131_001 鍾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31)

雖然到後來，當新村隨著 1973 年斯里阿曼和平協議的簽訂，左翼份子陸續從森林走出，讓政府對於新村的管制日漸鬆懈，致使村民也慢慢擁有那消逝已久的自由。雖然還是有部分村民在此時計畫要離開 17 哩新村，將原有的新村地棄之如敝屣，不過對多數村民來說，無論在當時是因為經濟狀況的因素離不開這裡，或者只是單純在情感上的依歸，這裡都在他們的心中，留下些什麼。

隨後，新村開放管制後，村民彷彿看見未來的希望，許多人過去不曾想過要買下的「地契」，終於還是在百般權衡之下買下，也讓這塊土地真正成為自己的家。擁有地契的踏實，更促使年輕人在出外工作後，將漂洋過海去汶萊、新加坡賺到的外幣匯回來補貼家用，把一間間殘破不堪、不敷使用的鋅片木板屋，開始拆除、重建灌漿成能長久居住，不畏風吹雨淋的水泥屋。

這同時意味著，「家」將在一間間在形式、大小都不太一樣的新式水泥建築開始落地生根，綿綿不絕在這，迎接一代又一代的 17 哩新村人。

二、新村地景

如前所述，外地人初到或路過 17 哩這個小鎮，大概不會知道這裡曾經有過的悲傷是如此讓人刻骨銘心。重獲新生的「新生村」，在地景上兼具傳統與現代，沿著一條條在村內依序且平行，以第一路、第二路至第十路命名的巷子，可見到村內一戶戶排列整齊，有著新式獨棟如花園別墅般的水泥建築，或是偶爾穿插幾間少數在新村管制時期遺留下的舊式鋅片木板屋。但除了這些村內隨處可見的住屋景觀，17 哩新生村最顯而易見的地景，莫過於村子路口處、緊鄰晉連路路旁的 17 哩中華公學，以及對向斜前方的 17 哩新生村民眾會堂。

已逾一甲子的新生村中華公學既乘載著新村成立之前當地尚未商業發展前的椒園記憶，也經過「鐵鎚行動」下的風聲鶴唳，同時迎接新村管制開放後的商業發展，即使隨著時間、人口的增加，中華公學的建築、規模也不斷地修建與擴大，早已不復見最初的模樣，不過其依舊是一代又一代17哩人生命中，一段密不可分的記憶。

除了17哩中華公學，在新村管制開放以後才有的新生村民眾會堂，對於17哩人來說，亦是另一個重要的村落地景。其雖然是在1980年代才成立的，但成立至今卻成為17哩新生村於一般公開的集會、婚禮慶典或是村民大型社團活動的主要活動空間。

(一) 新生村中華公學

「我們都是那間小學的校友」每當談起17哩時，「新生村中華公學」總是每個17哩人會談起的記憶。因為它的意義之於許多老一輩的17哩新生村村民，它不僅是一間伴隨著六年求學生涯的地方，更是左翼思想的萌芽之處。然而，不同於老一輩的村民，這間小學對年輕一代村民來說，雖然不再存在左翼思想的啟蒙，但其終究是人際往來互動與知識學習的起點。



1. 歷史背景

佇立於新生村路口處的新生村中華公學於1946年成立，其前身為17哩中華公學，後來才改名為新生村中華公學。在日本於砂拉越殖民統治三年之後，從中國各地或是印尼飄洋過海、翻山越嶺來到此地尋找新生活的華人，過去選定了17哩附近這個區域，作為開墾拓殖的地區。在客家方言群的聚集之下，讓當地儼然成為以客家方言群為主的散居聚落。而原本隻身來此拓墾的客家先民，之後也在此定居，結婚生子、成立家庭。當這些先民有了下一代後，隨之要面對的便是「教育」問題，以及還在英國殖民地中華人文的傳承。因此，有許多先民開始商議要直接在當地成立學校，供鄰近地區的華人就學。

中華公學的前身並非在現今的校地，而是利用目前 17 哩新生村路口處日軍遺留下來的倉庫作為上課地點。爾後，為了長遠的教育計劃，這些 17 哩的客家先民，開始集資募款在 1949 年成立了於現址的中華公學，同時興建了第一間以亞答葉覆蓋的木板屋校舍，以及招募晚近從中國移民來砂拉越的教師。隨後因應就學人數的增加，既有的校

舍不敷使用後，又在幾年內興建了禮堂和多間教室，使得學校於 1957 年達到一定的規模。

而在1965年17哩新生村成立之後，17哩的中華公學因所在地理位置，所以並不像晉連路上其他受到「鐵鎚行動」波及，而被迫關校的華小一樣，自此消聲滅跡。相對地，反而因人口集中至新生村，致使17哩的中華公學吸收了原本15哩至18哩區域範圍內就讀它間華小的華人，而再度擴大其總學生人數。

隨著時間，以及新村人數增長，舊有的校舍也隨著時間不敷使用，1990年代17哩中華公學的校董們，便決定重建學校，將舊有的校舍淘汰更新。而重建校舍的基金，也是由17哩的村民大家集資籌建，在幾年的重建之後才有了現在的樣貌。

2. 中華公學與 17 哩人

老一輩經歷過左翼運動那個年代的17哩新村人，在談起那段往事時，總會提到17哩中華公學帶給他們的影響。

當時的農村社會，並不如現在人人都享有讀書的機會，訪談過幾位17哩新村人中，就有幾位報導人曾經因家中的經濟狀況、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失去繼續升學的機會或是較晚才進小學讀書。所以他們特別珍惜那段得來不易的求學時光。另一方面，來自中國的小學老師，在課餘時間將左翼思想傳遞給他們，讓他們透過課後的學習小組與廣泛的課外閱讀，進而有了思想上的啟蒙，而這種啟蒙也繼續深植於他們心中，並沒有因為左翼活動的淡化就此終止。相對地，直至今日，他們仍然謹記，且信奉著當時所習得的一切，「人革命是為了公眾的利益」。

基於這些信念，以及學校與自身緊密的連結關係，有許多村民在年長後，開始承接校董的職務，不僅出錢也出力，繼續維繫學校的運作。

不同於老一輩新村人在學校中受到的左翼思想啟蒙，對於年輕一輩的17哩新村人來說，在政府後來對「共產」相關議題的敏感上，父執輩與17哩中華公學連結很深刻的左翼思想或教育，在他們身上再也不可能復見。不過，他們卻延續了像過往父母親那一代

的年輕人一樣，從小學開始就奠定的情誼，讓「小學」對他們來說，不只是間學校，也是人際網絡的起點，更是他們與這個村落連結的重要景物之一。

(二) 新生村民眾會堂

在我來到17哩近半年的田野期間，仔細觀察過新生村民眾會堂的使用頻率後發現，這個民眾會堂雖然有一個由17哩新生村村民所負責管理場地出借與維護的管理組織，但其整體上與17哩新生村村民的關係仍然是密切的。

但是，新生村民眾會堂相對於17哩中華公學，因為成立時間已晚於新村管制解除之後，所以並沒有伴隨新村的演變經歷過太多的歷史過程，不過其所提供的空間，對於後來無論是17哩本地的村民或是外來的人在生活上的娛樂與集會仍有其一定的重要性。

1. 歷史背景

根據17哩村民於口述訪談提到，新生村民眾會堂的構思其實早在1970年代，有行政長官即有意要在17哩設置民眾會堂，但因當地還屬於鐵鏈行動管制區，在整體行政運作上還是由政府在控制，再加上村民在集會上也仍受到限制。因此，雖然早在管制區時期，目前新生村民眾會堂這塊地就已經被提供出來，預計作為未來會堂之使用，不過整個開始動工仍要等到管制區完全解除之後。

當1980年，17哩新村的村民在日常生活、經濟上趨於穩定發展，同時集會、參與社團的自由不再受到限制後，部分的17哩村民便開始希望能繼續延續政府之前預計要在17哩設置民眾會堂的計畫，為村內增設一公共空間，以提供村民在集會或舉辦村內相關活動時可使用。但對多數村民而言，過去新村管制時期集會自由的限制，依然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因此當部分村民欲招募其他村民在村內成立民眾會堂時，村內普遍反應不如預期，最初招募時，只募得23位村民作為會堂籌備之委員，且多為人民聯合黨背景的黨員。

不過，到了1980年代晚期，在各方努力募款之下，這才讓這塊原本在1970年還是低窪種稻的田芭地，在多年後能填土鋪地，並開始在這塊空地搭設了屋頂，才終於讓17哩的村民擁有一個可以不受陰晴影響的集會廣場。之後，隨著政治的開放、轉變，有越來

越多的人參與集會活動，1990年代起新生村民眾會堂再度決定在廣場入口處興建一個水泥三層樓高的建築供不同的活動使用或將閒置空間租賃給別的單位使用，如人聯黨曼旺支部就曾在此建築物的二樓租用辦公空間。而原本的廣場則繼續提供村民舉辦喜宴、籌款餐會或其他村內大型活動使用。2013年又考量到民眾會堂的廣場，常提供給宴客之使用，所以又在村民募款之下在廣場其他空間興建廚房以因應需求，在2014年1月初完工。

2. 17 哩人的民眾會堂

時間回到2013年1月，適逢我在17哩新生村進行田野工作的第一個月，有個周末我騎著腳踏車在村子閒逛，湊巧晃到新生村民眾會堂。這天早上民眾會堂的廣場有許多穿著黃衫的人在那邊忙裡忙外，一下測試麥克風、一會兒擺桌、擺禮品，細問了才知道這是17哩這個月一間新開幕的銀行今天要在民眾會堂這裡舉辦的開幕相關活動，除了在上早上有招募新開戶的活動之外，還有儲蓄、摸彩等等炒熱氣氛的內容，晚間則是有以三個新村村民為主要參賽者的華語歌唱比賽。

在那邊約待了一個早上的時間，又全程參與了晚上的歌唱比賽。一整天的活動下來，來這邊參與活動的除了三個新村的華人之外，住在17哩附近甘榜區的許多達雅族也攜家帶眷一起來這裡參加活動。甚至連晚間的歌唱比賽，雖然台上的參賽者唱的都是華語歌，但台下多數聽不懂華語的達雅族或馬來人也像華人在台下隨著旋律載歌載舞。在這個當下，會發現新生村的民眾會堂雖然屬於華人的村落，但藉由多元、不分種族的活動在此舉辦，也拉近了華人和其他族群的關係。

此外，同年的四月，又有不一樣的活動在這裡舉辦，只是這次是為了15哩的真君大帝廟(永真宮)籌建新廟的募款餐會。

這天，建廟籌委會也於晚間餐會舉行以前，在民眾會堂的場地連忙布置。這個建廟籌委會主要的成員為三個新村的村民，其中又以17哩的村民人數最多，除了因17哩在地理位置上較鄰近15哩真君大帝廟之外，再加上17哩新村成立時，有部分的村民是由15哩村落搬遷過來。以至於15哩的真君大帝廟也成為17哩村民較常會去祭祀的廟宇。

所以在這個席開百桌的募款餐會上，不只建廟籌委會的組成有許多人是17哩人，一桌桌帶著全家來參加餐會的人，也多以17哩人為主，另外兩個新村的人為輔，讓這個餐會，其實不僅是個募款餐會，同時也是村落人際往來互動中重要的連結。

不過，這個民眾會堂在平時除了有這種村落間大型的活動或是聯歡晚會，其也提供給村裡相關的社團活動使用，如平日總可見到三個新村的媽媽們在這裡跳土風舞，或是上了年紀的爺爺奶奶在這邊打太極拳，週末的早晨還有小孩穿著整齊的道服在這邊上跆拳道課。

在1980年代規劃新生村民眾會堂時，當時的村民，或許只是單純的覺得這個一萬多人的村落，需要有一個有遮蔽的大空間可以讓村民在這裡活動或集會。起初在人民聯合黨在這個村落有高度支持度時，可能是政治集會宣傳的需要，如選舉的造勢活動，或其他以黨為主的公開活動。但隨著時間，這個村落間政治的發展演變，以及商業活動的增加，讓政治活動不再是這個村落集會的重心。相反地，其他更為多元的活動，無論是商業活動、喜宴、餐會，或者只是一般的小型社團活動，都使得這個空間能繼續被有效的使用，不僅更貼近17哩每一個年齡層的村民，同時也透過活動的舉辦，繼續擴大與拉近17哩村民與其他兩個新村，乃至甘榜區達雅族在日常生活中的連結。

三、17哩當地社團

17哩最主要的社團組織最早可追溯到新村成立以前跟左翼活動有關的學習小組或歌詠隊。不過，隨著左翼活動的緩和與逐漸淡化，以及村民在新村的生活日漸穩定，再者後來政府對新村居民於集會、參與社團的開放，17哩新村也慢慢有了促進村民有更多往來互動的社團組織。如在新村成立以前即有的慈善會社、新村成立後為增加新村年輕人活動的籃球隊、以三個新村婦女為主成的新生村土風舞社團等等。

(一) 慈善組織

目前在 17 哩新生村有兩個主要的慈善組織，包括古晉成邦江路慈善社與古晉西連路互助社。兩個慈善社的服務內容大致相同，主要以村內的慈善工作為主，以及喪事時之協助。雖然這兩個慈善社團受到過去新村內兩大政治立場的影響，在彼此的政治傾向上是相對立的，不過仍無可否認這類社團從成立以來對新村村民的貢獻，同時亦是對於 17 哩新村來說不可或缺的重要組織。

1. 古晉成邦江路慈善社

古晉成邦江路慈善社成立於 1958 年，是村落中以慈善扶助為主的社團。最初成立時，在當時由於 15 哩到 26 哩的華人有鑑於身後要安葬於 18 哩義山之路途遙遠，需要耗費較多的人力，於是徵募這個區域的華人加入慈善社，且後來選定在 17 哩成立了慈善社的會所。而這批成立古晉成邦江路慈善社的社員們，則在政治立場上較傾向左派，所以會所之後也成為過去左翼分子聚集的場所之一。

爾後到了 1965 年鐵鎚行動那段時期，古晉成邦江路慈善社的會所也成為新村尚未建成以前，這些從不同從郊區被趕出來的村民們暫時居住的地方。隨著生活較為安定之後，這個慈善社也繼續維持運作，即使在管制時期，政府有限制新村村民不能參與社團，但慈善社因以濟弱扶傾為主，又涉及村民家中辦喪事時之協助角色，比較不受限制。

但訪談慈善社的會員溫爺爺時，其提到在那段時期，「政治部不會管，但有很多的刁難，我們裡面的人去西連收年金，政治部的就懷疑我們是不是拿去做地下活動的事情。」意即在鐵鎚行動時，政府雖然沒有完全斷絕這類慈善組織的運作，但因慈善社的社員組成背景等因素，還是會在一般時候特別關注他們。

即便社團在運作上時常受到政府的監控，慈善社還是在 1970 至 1990 年代，在會所旁興建殯儀館，又在新村外開發多座義山(公墓區)，以應付往後村民之需求。

2. 古晉西連路新村互助社

17哩另一個慈善社團為古晉西連路新村互助社，此社團成立於1977年。除了成立的時間晚於成邦江路慈善會社，其一開始的社員組成也是相異的。由於新村互助社的社員多數是過去傾右政黨砂華公會的成員，其會所地址也是過去砂華公會遺留下來的，所以這個組織在整體的政治傾向上也以右派為主。

不過，也和成邦江路慈善會社的工作一樣，主要工作以喪事時的協助，但平時在重要節慶時，如中秋節，也會召集村內的會員共同在17哩的會所舉行聯歡晚會，增進會員間的情感。

(二) 新生村籃球隊

進到 17 哩新生村的入口處，映入眼簾的是一間間熱鬧的店家之外，還有一個總有年輕人們在場上盡情揮灑汗水的社區籃球場。若非特別提起，或許外人並不會知道原來在這個看似不特別起眼的小村莊中，這一個只有單個全場的小籃球場，竟然是多位籃球國家代表隊的選手們對於籃球這個運動萌芽的地方。

對於許多 17 哩無論是上了年紀的老村民，或是正值青春年少的年輕人來說，「籃球」必定是生命中與這塊土地、村裡的朋友，在小時候重要的記憶之一。老的村民，有時總會不經意的提起年輕時那個村子的誰誰誰是後衛、誰又是前鋒，誰又一起打過幾場令他們感到驕傲的比賽；而年輕人則是會講起，從小學開始，在村裡打籃球的風氣盛行之下，大家總會在放學後相邀來村子的這個籃球場打球，也因為這個籃球場不大，每次能投到籃、摸到球都必須要輪流，所以他們也更為珍惜打球的機會。

追溯 17 哩新生村打籃球的風氣，可從 1950 年代新村尚未成立前講起。由於籃球所需的器材或場地要求並不高，只需要兩支柱子，釘上木板再裝上球圈，即可完成。再加上籃球又是一個同時間能有許多人一起參與的運動，使之成為當時這些住在郊區的華人最熱衷的運動。17 哩老一輩的村民也指出在 1956 年於 15 哩至 29 哩之間的華小就有舉辦聯合的籃球比賽，而當時的 17 哩就曾以 17 哩籃球隊為隊名出賽。

後來 1965 年 17 哩變為新村管制區後，政治受到控制，生活也無法擁有太大的娛樂，讓運動反而繼續成為年輕人們閒暇時間的重心。另一方面，「籃球」不像其他球類需要較大或室內的場地即可進行，以致於目前 17 哩新村入口處的籃球場，便成了年輕人打球的地方，也延續了新村管制區前的籃球風氣，致使政府在 1967 年開始准許三個新村在 17 哩的球場辦理鐵鎚區聯合籃球錦標賽，且由三個新村各自的籃球總會負責辦理，其中 17 哩的籃球總會為新生村籃球總會。

新生村籃球總會也在當時開始於每年籌畫籃球錦標賽，供 17 哩的村民參加。同時，也致力於培養新村年輕一代的村民打籃球的風氣，因此有籃總年紀較大的前輩負責擔任教練，在新村小孩課餘時間時教他們打籃球。在小村莊盛行的籃球風氣下，不乏也培育了多位國手和裁判、教練。

另外，每年村內的籃球錦標賽，不只是新生村籃球總會負責籌畫，在 17 哩中有許多店家，也會熱心的提供贊助，所以選手們身上，總會穿著印有村內某某商家贊助的球衣參加比賽。

從籃球在這個村落的發展中，可發現相對於其他球類，「籃球」並非只是一個單純運動，背後其實還隱含了村內對於這個運動的驕傲，同時這個驕傲是加附在從小到大在這個村落長大的村民們共有的籃球記憶。

(三) 人民聯合黨在 17 哩的影響

在 17 哩除了籃球與慈善社這類一般性社團，政黨對當地也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在前述的內容，即有簡略的提到過人聯黨與左翼份子的關係。而早在新村成立以前，17 哩在 1959 年人聯黨創黨之初，就設有一個 17 哩分部於此，並在當地擁有一定的支持者。雖然隨著 1965 年的鐵槌行動致使 17 哩分部停止活動數年，不過受到過去這段背景的影響，使得人聯黨和 17 哩一直都保有密切的關係。

連帶使得在 1970 年代即使人聯黨加入聯合政府²⁷不再是最初略帶左派色彩的政黨，再加上原本人聯黨創黨元老楊國斯與王其輝等人在入閣當了部長後，讓原本主張反帝、反殖的人聯黨也在政府中有了發聲權力，同時促使這三個新村不僅在管制上逐步放寬，新村原本的民生、政治問題也開始得到重視。

如 1970 年 12 月 17 日的詩華日報即有三個新村代表會晤王其輝部長後的報導，摘錄如下：

晉西連三新村代表晤拿督王部長提出七項問題 要求改善三個新村

古晉西連路三個新村的代表，今日上午晉見聯邦不管部長拿督王其輝，談商改善新村的問題。.....(略)

據悉，代表們向拿督王提出七項改善新村的的要求。

這些要求包括出入新村准證問題、新村柵門的開放時間問題、新村土地問題、醫藥服務問題、新村的學校問題，(以及)村民是否可以參加政治活動問題等。

拿督王氏將親自去解決或是帶回吉隆坡向內政府部長商討解決。拿督王表示，他將盡能力去做，給村民爭取改善新村的問題。

拿督王氏返回古晉時曾表示，他將積極謀求解決新村的方案，使新村人民得過更好的生活。

新村的居民，每離開新村到其他地方去都得事先取得准證。新村開放時間是上午六時到下午十時，晚上是宵禁，讓新村人民感到很不方便。
(1970 年 12 月 17 日 詩華日報)

即使一直到 1978 年新村管制逐步解除後，新村的村民才擁有投票、參與政治性社團的權利。不過在這之前，人聯黨在當地對於新村管制開放或是民生問題的奔走，也使得該黨在 1980 年代後的數十年都在 17 哩擁有一定的支持者，同時也是選舉時重要票倉之一。

²⁷ 在人聯黨創黨之初，一直到 1970 年以前基本上還是一個親左的政黨，不過在 1970 年 7 月的砂州大選結束後，人聯黨的高得票率，以及政治上的考量，促使其被延攬加入聯合政府，也致使砂拉越的左翼運動逐漸淡化。

此外，人聯黨過去在當地的重要性，也影響了後來有許多 17 哩的婦女投入當地人聯黨婦女組的活動，除了在政治事務上的支持，也藉此凝聚與組織當地婦女，使之增加政治參與的意願，並進一步促成之後其他婦女相關社團的成立，如 17 哩的婦女士風舞社團。

(四) 17 哩婦女士風舞社團

前述提到 17 哩民眾會堂的部份時即已提到新生村的土風舞社團，有別於新村裡多數是以男性成員為主體的社團，這個只招收三個新村婦女的土風舞社團，成立於 1991 年，主要的幹部為 17 哩的婦女。成立之初，原本是由幾個村內的媽媽因興趣而欲組織一個村落社團，讓三個新村不同年齡的婦女在每天晚間閒暇時，能有其他的活動可參與。

隨著越來越多人參與，讓這個原名為「新生村土風舞班」的社團，目前的成員除了 17 哩新生村的婦女，又概括了另外兩個新村的婦女。

而 17 哩現在這類以歌唱、跳舞為主的娛樂性社團，早在新村成立之前的時候就有以學生或年輕人為主要參與對象的歌詠隊。而新生村土風舞班內有許多創社的婦女，過去也都有參加過歌詠隊的經驗。但不同的地方在於過去的歌詠隊存在著濃厚的左翼氛圍，現在的新生村土風舞班則是村落婦女們創造緊密連結關係與社群往來的社團。

這些土風舞班的婦女們固定在一週內的某幾天晚間，共同聚集起來在新生村民眾會堂的廣場聘請老師來指導跳舞。

我在田野期間因熟識土風舞班的幾位媽媽成員，而有幸近距離參與多次的土風舞班相關活動。其中不乏平常的土風舞課，或是包車至古晉市區參與大型的土風舞活動，以及這些土風舞媽媽於節慶或心血來潮想到舉辦的額外活動。

在平常的土風舞課時，雖然每位會員不一定都能確實出席參與，不過每當出席時，這個時間點，不僅是他們放下繁忙的家務與工作開心跳舞的好時間，下課時間也是她們跟其他土風舞班成員聊天交流的時候。另外，因為新生村土風舞班成立已有多年，且有

一定的規模，所以近年來新生村土風舞班成員也積極去參與跟其他地區土風舞班交流的活動，甚至參加比賽，贏得殊榮。或是當村子內有大型活動時，也會請這些土風舞班的婦女們擔任嘉賓表演。

除了一般的跳舞相關活動，這些媽媽有時也會在階段性的課程完成或是節慶時，舉辦一些促進土風舞班成員來往的活動。如就曾遇到這些媽媽們邀約彼此來吃擂茶，或是在過年前，在平常練舞的新生村民眾會堂那舉辦 **Buffet**，由每個土風舞班成員準備各自的拿手菜，提供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鹹食、甜點、湯品、飲料給大家享用。

對於這些參與活動的土風舞班成員來說，一開始可能只是單純因為喜歡跳舞或是想要運動，甚至是朋友相邀，所以來報名參加。可是久而久之，透過每週的跳舞，以及不同的活動參與，她們之間也形成了跨越年齡的革命情感，同時這個以「三個新村」的婦女為主的地方情感也於焉形成。



四、商業發展下的 17 哩

從歷史進程來看這個小鎮，從 20 世紀中國移民初到這裡開發，到 1960 年代前後這附近種胡椒、橡膠的盛行，再歷經胡椒大規模蟲害，以及後來十多年的新村管制時期，讓 17 哩又慢慢從改種植蔬菜，直到 1980 年代，村子裡除了許多年輕人跟隨潮流出國打工之外，村裡還有一部分的菜農，因管制解除，不再受到進出往來新村的限制，開始發展蔬果批發的工作。在新村不再封閉，而逐漸與外面產生互動的同時，也讓這些在管制結束後，還繼續留在新村的村民來說，他們的留下，不只是家的移轉，也是生活與工作型態的改變，而在這些改變之下，促使了 17 哩新村慢慢揮別管制區的陰影，邁向一個商業發展與農業並存的新村落。

(一) 菜農到蔬果中盤商

在這個以務農維生的華人村落中，因務農人數與規模達到一定的數量，所以 17 哩從很早以前，政府特別於這裡設置農業部。

不過 17 哩這個區域，開始全面從栽種胡椒改到種植蔬果大約是在 1970 年代。雖然小型的蔬菜種植很早就在新村出現，不過僅供自給自足，再者也因為蔬果種植因新村於管制時期在進出上較為嚴格，導致蔬菜無法出去做批發，而若留在新村商業區販賣則收入低廉，所以一開始鮮少有人在 17 哩是以種菜維生，依然還是以高單價收成的胡椒、橡膠為主。

但是，後來當在新村生活逐漸穩定後，卻遭逢一波波胡椒蟲害，讓村民開始思考其他種植作物。再加上，當生活慢慢擺脫政治的不安定與恐懼後，部分村民便思考是否有可能不需要離開「家」太遠，又能同時增加收入的方法。因此，越來越多因而致富的菜農中盤商便隨之出現在這個小村莊。

這些菜農中盤商，最初時除了載送自己菜園所栽種的蔬果之外，也將每天在新村各家更為小型菜農收購而來的蔬果於每天晚上秤重分裝後，再集體送往古晉的大型批發市場販賣，不僅增加小型菜農蔬果的收入，久而久之還使得這些蔬果中盤商從中獲利，同時工作型態也從過去單純的務農工作，轉換為批發商。

這類型蔬果批發商在 17 哩的發展，並沒有隨著時代的潮流而消逝，反而繼續延續至今，且隨之延續了當地的農業發展。再者，又因 17 哩的土質長久以來易於種植作物，也繼續吸引了外來的人來附近開闢大型農場，同時又讓年輕一代的新村人還能回到家鄉來務農，而這一部份的內容也將在後面章節提及年輕人返鄉務農經驗時會有更進一步論述。

(二) 商業發展

在 17 哩解除管制後，隨著經濟狀況好轉、工作型態的轉型，讓這裡的商店區規模逐漸擴大，原本在管制區時，17 哩新村的商店大約只有 50 多間，但近幾年卻早已增加到上百間店屋，且還有數間正在規劃興建的店屋，與正欲開發的土地。在這種商業發展趨勢下，同時吸引了原本非新村內的人來到新村發展或是工作，以及原本新村的村民，返鄉投資。再者，無論是小至沒有規模的臨時市集擺攤，或是直接在 17 哩承租店面，

乃至進行大型投資開發，其實都預知了當地未來的發展，將不可同日而語。那麼它還會是記憶中，那個憂傷的小鎮嗎？

在 17 哩從商店區進入到住宅區的附近空地，於每週四的早上有個固定市集，或可視為菜市場，而當地人則以馬來話稱之為巴剎(Pasar)。

每週 17 哩的巴剎，無論天氣是颶風下雨、豔陽高照，總是不減人潮的湧入。巴剎外圍雙向道的馬路，也常被來往車流和臨時的停車擠得水洩不通。這些人潮和車潮，不只來自於 17 哩的村民，還包含來自鄰近的達雅族甘榜(Kampung；村落)的人以及另外兩個新村的華人。

在這個巴剎中，可見到各式各樣的攤販，舉凡食衣住行用得到的東西，皆可在這看到。如有許多攤販販賣新鮮又玲瓏滿目的蔬果，在賣海鮮的前方則有一簍簍活跳跳的鮮魚，還有的老闆忙著現炸起香蕉粿、煎餅，或是有幾家華人攤販還賣著做好的傳統糕餅、客家菜板，一樣樣無不吸引著路過的人；另一頭又可以見到老闆喊聲叫賣鍋子、刀子，或是在掛滿眼花撩亂的衣服下，還可見到老闆與顧客拿著衣服、包包在討價還價。

約 3 分之 2 個籃球場大小的 17 哩巴剎，雖然整體規模不大，卻仍吸引了一定程度的人潮，導致來這裡擺攤的攤販，有 17 哩本身的小型菜農、鄰近的達雅族人，還有那些開著大貨車遠從古晉市區來這裡賣衣服、鍋子的外地人。

除了每週的巴剎可見到絡繹不絕的人潮在 17 哩湧入，這幾年來 17 哩本地的發展商開設的大型賣場，以及新開的小型店家越來越多，也造就了越來越多外地人來到 17 哩消費的可能，進而讓 17 哩本地人有更多的發展機會。

然而，吸引外地的人到 17 哩來消費，不只是在既有的條件下擁有的店家豐富與多元，17 哩既有位於兩個大市鎮間主要幹道上的地理位置，也佔了很重要的因素。

五、小結—這裡是離不開的依歸

一樣要付出代價的，代價看不到了..現在只是看表面而已...你現在看繁榮...不過你後面什麼東西，別人看不懂喔！你經歷過你知道，你以前做過多少苦...那些東西是不能夠算的。

(130131_001 鍾先生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31)

對於 17 哩的村民來說，這個村落混雜了太多在新村管制階段無奈的記憶往事，即使在當代，在這商業發展盛行下的 17 哩，那早已成為記憶中的一部分，鮮少人會再刻意提起，不過那始終是無法忘卻的心頭事。因此，當決定將這個暫時的家，自此落地生根變成未來永久居住的家，其實從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隨著時間、習慣，甚至太多的因素，讓這裡早在不知不覺中成為自己的家。因為新村一景一物與自身，總有那可以言說數回的連結。

這些老一輩的 17 哩人會憶起在 17 哩中華公學求學的經過，想起左翼運動的萌芽。即便對於某部分從他處遷移而來的 17 哩人來說，17 哩中華公學雖然不是自己的母校，但其仍舊無可避免地與家中下一代產生關係；那民眾會堂亦是，因為提到它，17 哩人大概會憶起某個朋友或家人曾在這裡舉行婚宴，或是自己參加過數場在這裡舉辦的活動，同時有些 17 哩的婦女可能每週都會和村裡的朋友們在這裡跳舞和打太極拳，它總是自然地融入了你的生活；另外，或許看見村子的小毛頭在那塊籃球場上熱血沸騰時，17 哩人也會和朋友聊起年輕時，在同一個地方、豔陽高照下你們打過的比賽是如此難分軒輊、精彩可期。

這些瑣碎感，也會不由自主的說出「我是 17 哩人」。同時，讓這裡也是永遠離不開的依歸。

這時誰還會記得，這裡曾經是那悲傷的小鎮呢？

第六章 離鄉還是留下

2013 年的農曆年前夕，一如馬來西亞華人的家庭一般，新村的家家戶戶在除舊布新後都在屋前掛上了嶄新、紅澄澄的大燈籠。無論是新村旁大型賣場或是小型雜貨店裡的裝飾、擺設都配合著趕著辦年貨的人們，無不充滿濃濃華人新年氣息。同時巷口的咖啡店，也用音響反覆大大聲地播著千篇一律卻又應景的新年賀歲歌曲，「恭喜恭喜恭喜你啊！恭喜恭喜恭喜你！」。這老套的賀年歌，年復一年，除了增添年味，又彷彿是一首首迎接離鄉背井去各地做工或讀書的新村人回鄉的迎賓曲。

平常留在新村的老人常說，那個誰誰誰的小孩去新加坡、汶萊做工，或是誰的孫子去了台灣或西馬念書要到過年才會回來。

到了這歲末年終之際，在新村裡熙來人往的人群中，這才真正見到了這些返鄉的年輕人。

而在大年初一凌晨轟隆隆的鞭炮聲與村子裡五光十色的煙花揭開了新的一年之後，接連幾天的年假，對於新村裡的年輕人來說這是聚會的重要日子，因此當家中大人忙著去親友家拜年時，從小到大一起長大的新村年輕人也成群結隊穿越村內一巷又一巷，去過一家又一家，用著熟悉的客家話，聊著工作或學校中發生的事情。一邊在朋友家吃著年節餅乾，有人可能會抱怨起在新加坡做工廠工的枯燥與乏味，有人則是講到最近村子裡發生的事或是提起古晉又有哪些新開的商店，在他們閒話家常的同時，也連結了離鄉與沒有離開新村的年輕人，彼此之間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

然而，這個正在從農村逐漸發展為新興商業區的小鎮，對於這些從小在這裡長大的年輕人來說，人生總會面臨到要離開抑或留在家鄉發展的抉擇，多數的人可能會依循著他們父執輩走過的路，先離開新村去外地工作，待工作幾年後，再考慮要不要回家；而少部分的年輕人，有人則會選擇留在新村繼承父業或是另謀出入。但在我於新村田野這段時間的參與觀察，以及對幾個不同背景與年紀的新村年輕人訪談後發現，新村年輕人在面臨這些抉擇的當下，依然蘊含著從小到大在新村所生成的在地情感與認同，而這種「地方感」也成為最終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在本章中，我所欲討論這種「地方感」是如何產生與影響世世代代的新村人，再者現在的新村又提供了什麼樣的助力促使年輕人在之後會想要返鄉定居？

關於以上幾點，我將在本章中分為四個小節藉由對幾位新村年輕人的訪談，以及實際的田野經驗，來進一步做討論與對話。

在本章中主要有七位新村報導人，年紀皆在 40 歲以下，有四位則是在 30 歲以下。另外，報導人中有六位是從小就在 17 哩出生、長大，包含小家、Anna、老二、阿興、阿程、阿新。另一位報導人阿彬，他的父親為新村人，但因父親之前工作的關係，他並非出生於新村，而是到小學階段才回到新村定居，不過在新村長大的這段日子，也讓他的人生自此有了改變。

本章將藉由這些報導人的生命經驗，首先從離鄉出外工作的年輕人談起，再談到新农村中返鄉務農的個案，以及了解留在 17 哩工作的年輕人他們如何來看 17 哩的轉變與發展，最終則回到新村的「地方感」來論述，造成年輕人最終還是會回來新村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一、展翅高飛看世界？—離鄉的 17 哩人

離鄉背井出外打工這件事，對於 17 哩新村人來說並非全然陌生，甚至是個必經的過程。整個村子裡，在過去戒嚴稍已寬鬆的 1970 年代末期，陸陸續續有許多年輕人，在唸完中學後，若無繼續升學，或是承繼父業做生意，他們往往會選擇離開新村、遠離務農的生活，遠赴汶萊、新加坡從頭做起在艷陽高照下最基礎的建築工人，以及當起每日在工廠做著繁複無變化工作的作業員。這些工作看似枯燥、辛勞，但因國與國間幣值和經濟發展差異的關係，讓出外打工的新村人，總能用出國工作賺回來的錢幫忙家裡老舊的木屋汰舊換新成以水泥塗裝建築的新家。以至於如前一章中所述，從 1980 年代開始，新村裡原本建成初期千篇一律的老式木屋，也隨著家家戶戶經濟狀況的好轉，逐漸轉換成新式的水泥建築。

(一) 出外打工的人生選項

當村子的經濟狀況因為年輕人出外打工有了很大的改善後，進而使得出國工作這個人生選項，在新村也像風潮般繼續延續著數十年至今。曾經在十年前去新加坡工作的小家提到：

那時候我學院畢業後去的，因為我姊也在那裡做工，那時候我在那裡的工廠做信用卡的製模…年輕的時候，大家都會想要多賺點錢、又能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會相約去新加坡工作。而且村子裡很多從新加坡放假回來的年輕人，走起路來好有風，各個好像花錢都不眨眼，可以買很多奢侈品或讓家裡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

(130908_001 小家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8)

小家當時會選擇去新加坡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姊姊剛好也在那邊工作，而且也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在畢業後去新加坡工作了兩年。兩年離鄉的工廠工生活，雖然獲取了較高的薪資、省吃儉用存有積蓄，但工作時數長又乏味，再加上新加坡固然擁有著家鄉所沒有的繁華與喧囂，卻始終不是自己的家。因此「有些人會為了生活，繼續在工廠做下去；有些人則因為無法適應新加坡的工作環境，或是家中親人生病了必須回家幫忙，就提早回家鄉。」而小家就是後者，她在工作了兩年後，適逢親人生病必須回家幫忙，毅然決然辭掉新加坡的工作，決定回家幫忙家裡，扛起照顧親人的責任。

除了小家有去新加坡工作的經驗，另一位老二也在中學畢業後去了汶萊。年近 40 歲的老二，他的家中包含他有五個兄弟，他排行老二，其中就有兩位有出外做工過，而留在新村沒有出去發展的大哥是小學老師，生活較為穩定無經濟上的考量，另外兩位弟弟後來則去了古晉發展。在訪談中他提到自己出去工作的經驗：

以前我高中有修建築課程... 那時候就想還年輕囉！就去汶萊跑一下... 就是朋友帶我過去的，剛好我三舅也在那邊，就跟著他們做建築囉！當時大概 89 年的時候，也是剛好汶萊在發展，所以很多村子的人過去做建築。少部分村子的人沒有出去做工的，通常是家裡開店的，不然村子裡的大多數都會出去啦！去

汶萊或新加坡，看待的時間長短而已。

(140112_001 老二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2)

當時念到高中畢業後，村子裡年輕人相邀去汶萊工作的風潮也影響到了老二，再加上高中時選修的專業就是建築課程，正好可以去汶萊發展所長。他離鄉去了汶萊工作一年，除了繁重的建築工作，並不如他想像中的有趣，又因為對異鄉的不習慣，即使有朋友一起去，仍然比不上家鄉的熟悉與溫暖，所以在當地待了一年，他後來還是選擇回到家鄉發展其他的生意。「在汶萊一年多後還是不習慣嘛！在那裡做建築，工還是比較苦，也覺得沒什麼前途就不要做了，就回來古晉發展囉！」

17哩其實有許多像小家或老二一樣，在出外工作幾年後，再度選擇回到17哩的年輕人。像老二也提起從小一起長大的隔壁鄰居家裡的狀況：

我老家隔壁鄰居，以前整家兄弟姐妹都去新加坡...現在他們很多都回來了。不過村子裡還是有些人也沒回來啦！但我覺得應該還是回來的比較多。少部分做久在那裡，主管升他的級...就看工廠是做哪種的囉！然後又有居留權，或有些如果娶了那邊的太太就可能留在那裡了，但其實在那邊生活也不容易。

(140112_001 老二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2)

這些選擇回到新村的年輕人，除了因異鄉的環境適應不易，以及在基層的工作升遷困難等因素之外。有些人是到了一定的年紀，因父母的年事已高，決定要返家照顧父母。或是當他們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後，期望有更為穩定的生活，同時因有了在外面工作的經驗，身邊也在工作幾年後存有積蓄，能夠返鄉做一些小生意與投資。再者，回到17哩後，即使薪資無法和出外打工時的收入比擬，但是整體的生活開銷還是比在外面來得小。

年輕人總會想要出去，想要有出外工作的經驗，外面的工錢也比較大啊！可是到了一定年紀的時候，還是會回家，因為這裡終究還是自己的家，再加上父母的年紀也到，人也開始想要過比較穩定的生活了，就會想說要不要回來村子做點小生意。

(140112_001 老二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2)

之前曾去新加坡打過幾年工後，回來在17哩飲食小販中心賣起雞飯的年輕人講起他為何後來會選擇回家發展的過程，似乎也道盡了許多返鄉青年的心聲「無論離開多久，這裡還是自己的家，而且爸媽也都在這。」

(二) 高學歷的新村年輕人

17哩裡除了這些出外打工的年輕人之外，隨著村裡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的提升，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中學完成之後，除了會選擇申請西馬來西亞的大學，或是家裡經濟狀況較為許可的人可能會到台灣、新加坡，乃至英國、澳洲繼續念大學之外，也有一些人會去報考當地的政府部門或當教師，在之後成為政府工(公務人員)。而這些出外讀書獲取更高學歷的17哩人，他們對於未來發展的人生選項，也和那些打工回來的人有了些許的差異，但不變的是，每個17哩人對於「家」的連結依舊牢固的牽繫著他們。

像我們可能之後就會被派到不同地方去當政府工或老師啊！但是會想說以後看能不能調回來家裡附近，因為我們那份工作是不會沒有的。所以倒回來的話，只要是在古晉，遠一點的工也不要緊啦！因為要照顧父母也比較方便…不然我兩個哥哥都因為工作的關係，已經在外面了，我弟弟又叛逆，以後就我回來照顧父母囉！

(140113_001 阿興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3)

25歲剛獲得政府工(公務員)職位，尚未知道會被分發到哪裡工作的阿興如上述般講著他未來的人生規劃。對他來說，無論未來的工作會被分發到哪裡，總有一天他還是會希望能夠回到離父母近一點的地方。同時也因為父母雙方從小就是在這個新村長大，在龐大又緊密連結的親友網絡影響之下，也不太會想要搬離這個他們住了五十多年的地方，因此阿興認為「以我的觀念是我爸爸在這邊，我就是得在哪裡，因為他還是我爸爸嘛！想要照顧他們！」。

我是覺得這裡像我們這個年齡的，大概出去，就是有出去的出去闖一段時間之後，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這樣子，大概一段時間，十年之後大概就會回來了吧！就算你在外面都好都可以，可是你還是會比較習慣這裡，因為你在這邊長大嘛！還是比較習慣這邊的生活方式、環境。

(140113_001 阿興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3)

跟阿興是中學同班同學，目前身為準老師的阿程，在訪談的當下繼續補充了他們這一輩新村年輕人的想法。因為他也像阿興一樣，在眾多同學之中他們都擁有了較為穩定的工作，即使一開始都無法決定工作的地點，但考量到後來定居的地方，都還是會以回家為優先考量。

然而，在這個訪談的同時，阿興與阿程都提到由於他們是政府工，所以對於回鄉定居其實不太需要考慮到太多經濟因素，否則假如是其他已經擁有大學學歷的新村人，可能會受限於新村是個尚在發展中的商業區，仍然較無法找到與大學學歷所求相當的工作。因此，這些人就較會以去城市或外地工作為主。

但他們朋友之中的阿彬，卻創造了大學生畢業生留在新村發展的可能，關於阿彬的故事則會在下一節中做進一步的敘述。

二、返鄉務農的農村大學生

阿彬與上一節提到的報導人阿興和阿程也同為中學同學，當時中學畢業後，他因為成績較為優異，所以申請了馬來半島柔佛州的大學就讀，主修企業管理。

離家四年至馬來西亞柔佛州念書的阿彬，在訪談中曾提到四年的大學生活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階段，也許在專業科目上他沒有太多的投入及興趣，但是去異鄉讀大學、學校課程以外的活動等等，都讓他的大學生活豐富而多彩。

(一) 畢業的工作選擇

四年倏忽即逝，當畢業前夕，周遭每個同學都在想著未來要去哪裡工作或發展時，阿彬也反覆思考著，「那時候我就在想到底要不要跟我大部分同學一樣，就去新加坡做工，但是去那裡找工作之前也是要先有一點積蓄，所以我就想說不然就先回家好了，先存點錢再看看要不要去新加坡。」畢業後回到新村的阿彬，起先只是為了存錢，就先幫爸爸種菜。但媽媽卻同時對於大學畢業的他，又回來種菜的這件事情頗有微詞，仍然希

望他能夠去外地工作。「我媽就還是比較希望我可以出去做工啦！但我爸的態度就比較沒有這樣，他就想說如果我要做就給我做。所以我之後就開始種菜囉！」

日復一日在菜園的生活又過了幾個月，阿彬漸漸發現，其實務農的收入，遠比想像中來得可觀，甚至能達到或超過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他們的每月薪資，於是他選擇留在家裡幫忙。同時，他也認為父親原本打下的基礎，若沒有再繼續發揮或延續，就太可惜了。

我讀的科目的範圍很廣，我們就沒有很專業在一個範圍內，變成我要找工作，我什麼工作都可以找，可是因為我不會專在一個科目裡面，我的工錢就比較少這樣。這是為什麼我會種菜，因為這是我爸爸留下來的東西，有人做的話，就是那錢還是可以賺，沒有人做的話，就沒有了！

(140113_001 阿彬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3)

此外，對於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來說，也許會認為在高溫日曬的務農工作是件辛苦的事，但對於阿彬來說「它是很好的職業來的！因為他們不瞭解那個價值，不過有些可能他們懂，可是因為曬太陽，他們就覺得比較辛苦囉！」

在整個訪談過程中，除了可以感受到阿彬對於自己身為農夫的驕傲之外，他也不斷的提及當農夫的好處。

現在的生活雖然比較辛苦嘛！可是你去跟人家打工，也是受別人的氣。你自己做工，你受你的工人的氣。一樣受氣嘛！可是自己比較爽，還可以出來喝咖啡，然後利潤高，時間又可以自己選擇，都一樣有壓力，就做自己想要的東西囉！

(140113_001 阿彬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3)

(二) 回鄉務農的誘因

而若要去探究能夠支撐阿彬在務農上可以擁有這樣的生活，需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以及新村所仍擁有可供年輕人回來務農的條件。

阿彬從小並非是在新村出生，而是在距離新村駕車約7、8個小時車程的城鎮—詩巫。當時他的爸爸也跟大多數的新村年輕人一樣，在唸完書後就離開新村尋求更好的發展，於是白手起家，一步步地從基層做起。但好景不常，在他小學四年級時，家中經濟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自此一落千丈。在走投無路之下，阿彬的爸爸帶著他們全家人，舉家遷移回到最熟悉的家鄉，從一開始幫人打工，後來再跟人租地種植，慢慢地他們家的蜜瓜與玉米園規模也越做越大，爸爸甚至還成為新村人暱稱的「蜜瓜王」。

田野期間在一次的偶然機會下，和阿彬來到他家在新村附近的蜜瓜和玉米園。沿途，他一邊駕著車開在蜿蜒狹窄的石頭路上，一邊向我介紹著路過的田園景色與別人種植的作物。不一會兒，他家的園到了。下了車，映入我眼簾的，是一大片排列整齊用塑膠膜鋪蓋的蜜瓜園，再遠眺過去則是玉米園，而這塊約30甲的兩大片田園，每個月的種植收入除了供應了阿彬他們整家人的經濟收入，還有幾個原住民雇工的家庭。

在他們家的蜜瓜園旁邊，我和他聊起他的第一次務農經驗。「我之前還在讀大學的時候，有一個比較長的假期，就從柔佛回來種了三個月的玉米，那次的收成最後得到了6000多元。」初試啼聲的務農經驗，讓阿彬知道也許務農得忍受風吹日曬，但只要肯去做，還是可以獲得豐厚的果實的。不過，後來阿彬決定要以務農為職業時，他除了學習爸爸之前的栽種經驗，也反覆的翻閱書籍，學習新的墾殖技術，同時運用在學校學到的管理學知識來經營家裡的田園，進而在不知不覺中，他早已將過去所學實際運用到現在的務農工作上，包含要怎樣管理、要怎樣的改良以創造更多的利潤等等。

他其實進一步提到，當年若是爸爸沒有做到像今日的規模，他和只念到中學畢業的大哥，可能也不會回來接家裡的工作，依然如新村大多數的年輕人一樣，會去外地工作。但是因為家中已立下了一定的產業基礎，以及對家鄉的熟悉程度，更增添了他們想要在家鄉務農的意願：

因為我們熟悉的地方就在這邊嘛！我們不講17哩這個這麼小的地方，我們講古晉這個地方喔！我們熟悉的地方在這裡，這邊的市場我們比較懂。然後我們有老闆嘛！老闆比較懂這邊的行情。所以我們要做什麼東西，我們都可以去問他，也可以問這邊的朋友。而且種菜的利潤很高，非常高。如果農業這個東西，要做30年是沒有問題的。照現在的行情來看，做30年是好喔！

(140113_001 阿彬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3)

再加上鄰近的三個新村仍然是古晉當地最大的蔬果出產地，使得不僅當地的年輕人可以回來務農，還有許多外來者也在新村鄰近地區設立大型菜園。如新生村內農業部的掌管農業部門的劉主任提到：

從2000年最近一次的資料統計中，17哩約有100個大菜園、21哩為50個、22哩大約80個。除了較大的菜園，新村內的村民也會種一些菜拿去賣，不過量較少的只有在村子賣，較大規模的就會有中盤商的菜車來收，之後再送到古晉去賣。三新村的菜，也是整個古晉地區，最重要的供菜地。因為古晉其他種菜的地方，像石隆門、古晉的馬當、石角、倫樂他們種菜人還是沒有三個新村這麼多。

(140122_001 農業部劉先生訪談逐字稿，2014/1/22)

關於三個新村的菜類產量，劉主任也提供了每日出口的大略統計數據：

表6 新生村農業部菜類輸出統計數據

村名	菜類	葉菜	菓菜 (根莖類)(長豆、角瓜)
新生村		4-6 噸	10-15 噸
來拓村		1.5-2 噸	5-10 噸
大富村		8-9 公斤	2-3 噸

資料來源：新生村農業部

而三個新村擁有的這些農業條件，其實可以追溯到最初客家先民移居於此區域時。因為相對於古晉其他方言群中的福建人、興化人等等，客家人主要就是以農業種植為主。在之後客家先民陸續在這個區域附近開墾、拓殖後，也奠定了基本的農業種植條件。即

使1965年建立了三個新村，將原本散居的農人集中起來至新村生活，但同時又逢胡椒蟲害種植不易且價格崩跌，使得新村裡的村民在經歷了這些慌亂之後，陸續轉換種植其他較易於耕種的作物，於是蔬菜種植應運而生。但若是只將菜類留在新村販賣，仍然無法獲利。因此，當1970年代後，新村管制逐步寬鬆後，新村裡有越來越多菜販中盤商出現，這些中盤商到新村內蔬菜種植的散戶收購蔬菜，集合一定的數量後，每日載往古晉去販賣，賺取差價。以至於新村慢慢也有許多人因賣菜而致富。

直至今日，新村裡因種菜的人口仍有一定的規模，無論是如阿彬他們家這樣較為大型的菜園，或是在住家旁空地栽種的散戶。新村的菜量，都足以讓菜販中盤商在每日收購完村內的菜類、瓜果後，在晚間的八、九點時，一車車載往古晉的蔬菜批發中心販售。

17哩新村雖然是古晉與西連間的中繼站，同時新興的商業區也正發展起來，但因能提供務農的腹地仍然廣大，再加上產量輸出的大量需求，致使今日的新村即使不復以往家家戶戶都以務農維生，但仍有許多人繼續承接家中的農務工作，甚至有些年輕人出外工作不順遂，在衡量與抉擇後，也選擇回到家鄉當農夫。

不過，當問起阿彬人生更長遠的考量時，他卻提到：

種菜在現在是項利潤高的好工作，也是政府在推動的政策。不過我還是會想說有一天也能去坐辦公室，過看看上班族那樣的生活。或是把我們家菜園的規模變得更大，不僅是做古晉這裡的生意，還能外銷到其他地方。不然，如果一直在這個小地方這樣發展也太沒意思了！

(140113_001 阿彬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3)

從阿彬的話中似乎也顯示了年輕一代歸鄉務農的新村人，他們所要追求的絕對不只是延續他們前幾代務農的父執輩們留下來的產業。相對的，出外工作、讀書過的他們，眼界看的更高、更遠。再加上科技的進步、技術的演進，讓他們能創造更多的新思維應用於農務工作上。而他們的家鄉—新村，在這個行業中，給了他們能夠繼續發揮的舞台，讓他們不用離鄉背井，也能在自己的家鄉找到工作，進而發光、發熱。

三、我在新村工作

在 1965 年新村開始變成管制區的年代，或許很少人會預料到 50 年後的今天，新村這個區域既可以在保有每日清晨的雞鳴鳥叫與純樸的田園景觀之外，又能同時擁有人聲鼎沸的熱鬧市集及小型商業區並存著。

因此，在新村這個區域的多元背景交融影響之下，這裡除了有阿彬這類後來選擇返鄉務農的年輕人，以及如小家、老二這類有出國經驗返鄉居住、工作的人，還有一些年輕人在求學之後，因家中產業根深於此，在人力需求與親人需要照顧的考量上，選擇留在家裡幫忙。而這類的人也通常多數是家裡在新村開店做生意的，如同從小在新生村長大的阿新和 Anna。

(一) 歷久不衰的咖啡店生意

在 17 哩新村主要商店區通往村內道路的路旁，有一間傳統小吃店，這是報導人阿新家開的店。在馬來西亞當地通稱他們家這類的小吃店為咖啡店(Kopitiam)，每間咖啡店販賣的食物通常大同小異，但多數是由一攤攤向咖啡店承租檔位，販賣不同食物的小攤販所組成。例如一間咖啡店裡，可能就有賣哥羅麵(kolo mee)的攤販，也有賣雞飯(chicken rice)，或是賣快餐的，開設這間咖啡店的老闆通常還會在店裡販賣現做飲料。因此，若要維持整間咖啡店基本的運作，仍需要耗費較多的人力。這也使得生意較好的咖啡店，往往會希望家中的年輕人可以留在家裡幫忙。

現年 25 歲，在高中畢業後也留在新村繼承家業的阿新，當時因為家裡的生意需要幫忙，所以選擇留下。

那時候高中還沒畢業，我公公就叫我留在家裡幫忙…一開始我也會想要出去，看看不一樣的世界，但是現在畢業七年多了…看我那些在外面發展的同學，有些人發展的不錯，賺有錢，但是有很多人在外面是工廠工，這些工作如果年紀大了要再回來古晉找工作也不好找…現在想想，像我這樣，幫忙家裡開店煮麵，

雖然不能出去，可是可以陪在父母身邊，還有一個比較長久的工作，其實也不錯啦！(140113_001 阿新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3)

家裡在 17 哩經營咖啡店已邁入第三代的阿新，是家中三兄弟中最大的小孩。他們家的咖啡店主要有兩個檔口，都是家人共同經營，沒有再另外承租給別人，不過其中一個檔口及沖泡飲料的工作是由阿新家負責。因此，每當到阿新家去吃飯時，總會見到他一下忙著煮麵給客人，不一會兒又到後面去沖泡飲料。

然而，即使家裡開店，讓阿新從小與其他同學相比在經濟上較無後顧之憂。不過剛畢業時，看著周遭的同學多數都出去外面發展，他也會想著如果能出去，他的人生是否又會多了許多可能，而非只是留在家中賣麵而已。

但真正在家裡幫忙了幾年的生意後，他慢慢的發現其實留在家裡，未嘗不是件好事。相對於其他出外打工的同學，他不僅擁有了一技之長，又能陪在父母身邊，還可以在每天空閒時，跟一起長大的朋友在村子打球、敘舊，這些優點也成為了離鄉背井工作的新村年輕人所無法獲得的。

在新生村這個新興發展的小型商業區中，像阿新他們家一樣，從管制區時期以前就開始經營的咖啡店其實很多，通常這些咖啡店為了存續，也往往留下了家中的年輕人繼續經營。但近年來隨著新村人口與外來人口的提升，人潮相對帶來了商業契機，讓整個 17 哩地區，光是咖啡店就增加至 20 間以上。每隔幾個月，也會看見村裡又有新的咖啡店開幕。甚至在 2013 年華人農曆新年前夕，17 哩還開了第一間 24 小時經營的咖啡店，以供應村子絡繹不絕的人潮。

這些新開的咖啡店，有些除了是外來投資者進來投資的，還有一些是本地長大的年輕人，在出外工作後，有了一定的本錢回來租店經營的。但無論是本地或外來的投資者，他們會選擇在 17 哩這個地區投資往往是看中了當地未來發展的潛能，而這種潛力也更增添了阿新他們這類家中原本就有做生意的年輕人在長大之後願意留在家鄉發展，同時又能讓家裡的行業不至於沒有人繼續接手經營。

(二) 家族產業的延續

在新村附近一家汽車零件行裡，有一位身軀嬌小的女性，一邊拿著紙筆紀錄剛進貨的汽車零件，一邊忙著招呼店裡剛來的客人，在忙亂之中依然有序處理事情的她，是另一位留在新村工作，讓家族產業繼續延續且擴大經營的 Anna。

家裡在父親這一代開始於 17 哩經營汽車修理廠的她，是家中最大的小孩，也是唯一的女兒。從小 Anna 在 17 哩長大、讀 17 哩的華小，但中學的時候她跟多數的小學同學不同，沒有繼續在 17 哩附近的國民中學念書，而是在父親的安排下，開始每天通車到古晉就讀古晉第一中學，因學校不同的關係，自然而然與小學同學逐漸疏遠。

不過，在她 20 歲時於學院念完拿到會計專業後，因家中的汽車修理廠需要幫忙，以及後來她的爸爸決定擴大修車廠的規模，又在離 17 哩約 2 公里處的小型商業區新開設了一間汽車零件行交由她來管理，以至於 Anna 接下了家裡的生意、留在家鄉，「以前念學院的時候，下午沒有上課的時間就有在家裡幫忙做一點東西。但是念完之後就比較正式在家裡做工囉！後來我爸爸幾年後，又決定要開那個店，就叫我過去管理了」。

後來留在家鄉工作的 Anna，雖然沒有像其他一起在新村長大的朋友出外工作，但是她卻開始在家鄉學習經營一間店，也讓原有的會計專業發揮所長。同時因為沒有離開家鄉，讓 Anna 也重新和從小在新村長大的朋友連絡上，時常在零件廠公休或下班的時候，還能跟這些朋友聚會。

而 Anna 的其他弟弟們，除了一個沒有在家中的修車廠工作，在古晉工作之外，其餘的全部都因家中人力的需求，都留在爸爸原本就在經營的工廠工作，同時也在這裡成家立業，進而讓原有的家族產業繼續延續，甚至擴大規模。

(三) 從新村到商業區

若撇除上述這些因家庭因素而留在新村的年輕人，以更客觀的角度看待 17 哩目前發展的條件，會發現這個曾風聲鶴唳的村莊，其既有的特殊地理位置，包含坐落於古晉

與西連兩個大城鎮連結大路間的中繼站，以及因鄰近原住民部落，帶來了更多非華人的消費人口。再加上過去因管制時期影響的人口集中，隨著時間的演變，反而讓它擁有了更多新興商業發展的可能。就如同若是 17 哩缺乏了發展的可能，Anna 與阿新或許也無法在這裡延續或是擴大家中既有的產業。

此外，因人口的遽增，使得政府陸續將分部的辦事處設置於此，如原本就有的警察署，到之後陸續設置的農業部、消防局、郵局、電信局、公立的診所等等，都再在增添了其他外來人口想要移入 17 哩鄰近區域的意願。使得這個原本在管制時期沒有人敢嫁進來的村莊，逐漸有了改變。這些改變也相輔相成地影響著，出外打工的新村年輕人在後來返鄉之後創業的契機。像 Anna 就提到了她開始工作到現在，十多年之間新生村的轉變：

以前像我們那個時候..就唸完書，大部分的同學會去新加坡工作，因為在古晉好像沒什麼發展機會...而且在那邊賺錢比較厲害...比較多...那時候村子很少有年輕人...就畢業之後，你就很少看到你的同學了，因為他們就都是去外面做工啊！但現在就不太一樣了，會看到比較多年輕人留在新村了，可能會去店那裡打工這樣。

(130828_001 Anna 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8/28)

而與阿娜同為小學同學的阿德，也提出了他對 17 哩改變的觀察：

以前大多數會留在這邊的，是他們有事業在這邊囉！有事業、繼承父業之類的，就會留在這邊了...但在這邊創業的有的是打工回來的，他們就會創這邊原本比較沒有的行業，像手機業、汽車裝修、網吧之類的。

(140115_001 阿德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5)

阿德所提到的這些新興產業，其實目前在新村裡隨處可見。幾乎在店區中的每一排商店，皆可見到一至兩間以上的手機販賣店，甚至吸引了原本非新村的年輕人到這裡開業，讓 17 哩現在的手機店也約達 20 間之多。而汽車裝修業，則因村內經濟狀況的提升，擁有汽車的家庭增多，連帶地年輕人改車的風氣，也影響了此新興行業的出現。

然而，如上一節中提到的農村大學生阿彬所提到的：

如果你沒有那種資歷，你在這邊的工錢還是很低，就比如說讀完中學的，就算這裡發展得很好，但是你能做什麼工作，就是幫人顧店而已。可是工錢不會高嘛！所以要怎樣發展。可是去外面你的兌換率高，所以他們比較會選擇去那邊這樣子囉！

(140113_001 阿彬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3)

17哩目前的商業發展，雖然增添了年輕人選擇留下的助力，但是若沒有一定的資本或學歷，以及家庭背景，又要留在當地發展，依然只能做較為低階的工作。這類因素也導致新村目前長年定居於此的人口分布，仍出現20歲至35歲間青壯年人口較少的斷層。

不過，綜論這類青壯年人口在農村產生斷層的例子在當今社會顯而易見，但在17哩較為特別之處在於新村的年輕人多數在一定的年紀之後，又會選擇回到當地居住或發展。促成年輕人最終又會選擇回到17哩的拉力，在下一節的內容中與幾位報導人的訪談裡，他們即談到這些選擇背後的故事。



四、終究還是要回家

如本章最初所提到的，在17哩也許平時無法見到許多村裡的年輕人，但在一年之中幾個較為重要的節日往往能夠看到蜂擁返鄉的他們。不過這些離鄉工作的17哩年輕人，如前幾節提到的報導人所述，對他們來說，無論去了哪裡、離開家鄉多久，「家」仍然是他們最後的依歸，也是他們在四處漂流後，最渴望回到的地方。而這個對「家」強烈地方感的形塑，也間接促成了這些年輕人最終回到新村發展的重要拉力。

(一) 父母在這，所以我在這

對於17哩年輕人來說，「父母」其實是許多人在之後選擇回到這裡定居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前幾節中，已獲得政府工職位的阿興，在訪談時就提到，家中三兄弟中，大哥

因為在馬來半島當醫生且定居，二哥也已經在古晉買了房子，以至於目前離家最近、工作也穩定的他，也將未來照顧父母的責任一肩扛起。

像我朋友就會有這個心態還是會想買在新村。像我也是要買這，畢竟這邊是我家嘛！我爸爸怎樣都還是會在這邊嘛！我就考慮回來這邊，或是離這邊很近。因為我大哥已經在西馬，他已經在那邊買屋子了，我二哥已經買在古晉了。如果我不照顧我爸爸媽媽誰照顧咧？我弟弟還小，又很叛逆。因為我三兄弟比較靠近，我弟弟又差我七歲。所以兩個哥哥已經要出去了，爸爸媽媽沒有人照顧囉！就我留下來照顧。

(140113_001 阿興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3)

除了阿興有類似的想法之外，有其他報導人也提到當父母在17哩留有產業或是不願離開這個地方時，小孩可能就會選擇回來或留在這裡幫忙，以方便照顧父母。如在讀完學院之後，就回到家裡幫忙咖啡店生意的田小姐就提到那些出外工作的人，「回來的就可能是他們的父母不要過去嘛！還是可能他沒有兄弟姊妹啊！家裡沒有人幫忙，他就回來囉！」

另一方面，對於許多人來說，「怎麼樣都還是回來自己的家比較好…而且年齡也到了，就結婚…要安定下來囉！」由於出國工作，終究是離鄉背井，再加上在異國沒有實質的公民權。當有一天要結婚了，欲尋求穩定生活時，又再考量到未來小孩托嬰、就學等等的問題時，若能離父母近一點，年輕人不僅可以在托嬰問題得到解決，還能繼續生活在熟悉的地方。

而歸結於他們的父母不太可能離開17哩有許多原因，包括當17哩經歷了新村管制時期後，鄰近地區的人口全部都集中到新村，集中的過程與後來的管制，限制了當時的村民每日的生活圈，進而促使「新村」就像一個集合體，牽絆這些村民。

即使過去的村民因左右派的政治立場產生對立，但歷經戒嚴時期後所創生的「新村」集體記憶，以及在這個村落中長久生活後，緊密連結關係的地方網絡。如同老一輩的新村人，通常明瞭村內的哪一戶人家過去抱持著什麼樣的政治立場，又或是路過某一間屋子，便可說出這一戶是誰的家，還是那一戶最近家中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些細緻的地方網絡背後，其實還有更為龐大的親友網絡在繼續維繫與擴大新村內緊密的連結關係。讓這個就算是早已解除戒嚴、不再被侷限生活於限制範圍內的村落，仍保有如過去一般親近的連帶感。

(二) 龐大的親友網絡

17 哩內部龐大的親友網絡其實可從第一代 17 哩人談起。在 1965 年以前，17 哩附近散居的農村，因農村社會勞動人力的需求與節育觀念的不普及，造就了每一家即使有十個孩子也並非稀奇之事。待這些小孩長大之後，有許多人也因為家中人力的需求等因素繼續留在農村，隨後成家立業。伴隨著 1965 年新村成立，原本散居的農村大家庭，也全部被集中到新村內，搬進政府分配的屋子居住。如官阿姨談起新村成立之初的情形時提到：

那時候我們家就被分了房子，從 15 哩搬到 17 哩來。但是很擠，整家人都擠在一起，那時候我哥哥他們也結婚了，還都有小孩了。但大家還是就擠在那個房子裡。當時也不懂得去多討(申請)一間(房子)...
(131008_001 官阿姨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10/8)

官阿姨在新村成立以前住在 15 哩，搬到 17 哩後，官阿姨與已成家的兄弟、父母全部搬進了政府分配於新村的鋅版屋。以致於小小間屋子，就住了十多個人。後來隨著新村管制逐漸寬鬆，各家各戶的年輕人出去工作賺錢，再加上舊有的房子因家族人數增多，不敷使用之下，許多新村內的大家庭也慢慢分家，開始在新村內另建新的屋子居住。

不過，分家了並不代表原有的親屬網絡就會隨之消逝。反而因為親友多數都還繼續住在新村裡，彼此之間偶爾可以在村子內碰到面，甚至若親友在村裡開店的，通常較會去光顧。或是平時家裡種菜收成後，也會藉此發送給鄰近的親友，順便聊天敘舊。

而親屬網絡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的往來互動得以延續，在重要的節慶時，透過參與儀式的過程，其更進一步的被鞏固與強化。如我在新村田野的期間，經歷了幾個華人的重要節慶，在這些節慶之中，觀察到這些村民在分家之後，或許不像以往住在一起時往來頻繁，但每當重要節慶，或是婚喪喜慶時，親戚之間的往來互動卻比想像中來得密切。

(1)農曆新年

2013 年的農曆新年，適逢我在 17 哩進行田野工作期間，所以主要進行了新年前夕與除夕、初一這幾天的參與觀察。

在農曆新年前夕，在新村不僅可以見到從四處返鄉歸巢的年輕人逐漸增多，在村內的市場、雜貨店也無不充滿儲備食材、準備年貨的人潮。而回到家裡，忙著除舊佈新之際，還會發現即便已經存備了一罐又一罐的年節餅乾，新村的婦女卻還是繼續連忙挽起袖子準備新年時要吃的糕點，與過年時才會特別準備用來沾蝦餅吃的佐料。這些食材準備除了是來迎接那些久久才返鄉一次的家族成員之外，也為了能足夠應付新年期間絡繹不絕來家裡拜年的親友們，以備不時之需。

而到了除夕這天中午過後，當 17 哩商店區華人經營的咖啡店、雜貨店的鐵門拉下準備收工過年後，總是鬧哄哄的店區，頓時間人去樓空。村內幾天前原本熙來人往的車輛也逐漸變少，但家家戶戶的門口，卻比平時停了更多台車。因為村內的每一家，無論是從異鄉返鄉的遊子，或是原本趕著辦年貨的村民，大家全都回到了家，等待著晚上的團圓飯。

時間接近傍晚，燒鴨、燒雞、梅干扣肉、滷豬腳、清蒸富貴魚各式菜餚一一上桌，全家人圍著長桌吃飯，用著熟悉不過的客家話話家常。而村裡有些家庭人數更多的，甚至還在家裡擺了兩三張圓桌，就像宴席一般，才能容納的下所有返鄉的家族成員。在這個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一天，也是全家到齊相聚的日子，平常可能鮮少出現的家人，也會在這一頓飯中出現。待吃飽飯後，有人坐在家門口前繼續和家人聊天，或是有人在家裡打開牌桌，打起麻將或四色牌，一邊期待新春能夠有好手氣。而年輕人則點起刺耳作響的沖天炮，蓄勢待發的準備起午夜要放的鞭炮。

午夜 12 點一到，17 哩家家戶戶震耳欲聾的鞭炮聲，配合天空中五光十色、朵朵盛開的煙花，開展了新的一年。幾個小時後，當太陽旭日東昇時，全家人又如前一晚一樣圍著長桌吃早茶，熱茶與不甜膩的糕餅，彷彿有魔力一般去除了前一晚大魚大肉的油膩。

早茶吃畢後，第一組攜家帶眷穿戴整齊的親戚就來拜年了，也開始了四天的新年假期，家家戶戶川流不息的拜年活動。後來會發現「拜年」的意義，實際上是繼續扣連著家與家之間的關係。因為即使原本親戚之間，在村內偶爾就能碰到面，但到了農曆新年時，登門拜訪、寒暄問候的習慣，仍歷久不衰。

同時，這種「拜年」的儀式，不僅只有體現於親戚之間，朋友之間亦是。而且「拜年」也並非長輩專屬。對於長期離鄉的年輕人來說，「拜年」更是一年之中朋友們難得的相聚。所以會見到村內成群結隊的年輕人，一同到不同的朋友家「拜年」，若遇到吃飯時間，還可能就在某個朋友家一起繼續吃著年夜飯沒吃完的大魚大肉。

過年期間的「拜年」，無論對於長輩或小孩來說，都存在著多樣化的意義。在這每年至少一次的互動中，使得「拜年」不只是習慣，而是讓親友網絡能在分家或是離家工作後，還能繼續延續與鞏固。

(2) 婚喪喜慶



親友網絡除了藉由每年過年期間的「拜年」得以強化與延續之外，每當婚喪喜慶時，17哩內親友動員參加的力量也遠比想像中可觀。在田野期間，我曾參加一場17哩村民在古晉市區舉辦的喜宴。在這場喜宴中，雖然是村民的兒子結婚，但開席近百桌，不僅17哩新生村的甲必丹受邀參加，連遠道而來參加喜宴的村民就佔了總桌數的一半以上。使得整個會場，幾乎都是原本就認識的村民，大家也利用這個場合相互問候，甚至談論生意上事情。

除了喜宴時村民熱烈的參與，在喪禮時村內鄰近的親友也會至喪家幫忙。再加上，17哩本身也有兩個慈善互助會提供喪家在守喪期間的協助。包含在新村成立以前即有的「古晉成邦江路聯合慈善社」，以及1970年代成立的「古晉西連路互助社」。這兩個互助社團，起初原本因村內政治因素的關係，分別由左、右兩個派系所把持。但在今日，既往的政治因素早已煙消雲散，端看喪家請哪一個社團來家裡幫忙。

無論喜事或喪事，都可以發現在村子裡的每一家、每一戶，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個體。相反地，17 哩內部時自今日都仍存在著異於村外人的集體地方感。而這種地方感的生成，其實還包括新村內另一緊密的姻親關係。

(3) 姻親關係

從上述提到的親屬關係若再發展至姻親關係，會發現其也是促成新村內的村民緊密連結的因素之一。

在 17 哩田野時，常會發現夫妻雙方皆是同村人的情況層出不窮。造成這種情形的可能因素，除了有部分是媒妁之言，還有因過去管制時期歷史環境的因素影響，導致村內有許多夫妻在管制時期人口集中後認識。而較年輕一輩的則是因從小就是在這個區域範圍內長大，或可能是華小、中學同學的關係，進而認識、結婚。

很少出去的關係吧！可能是交朋友也沒有交到太大範圍的…就是可能是範圍沒有這樣大，總是待在同一個地方，範圍就是這樣大，所以交的朋友也是就這樣。

(130828_001 Anna 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8/28)

訪談時，Anna 提到這種村內的姻親關係形成的可能原因在於村子整個活動範圍並不大，再加上村內的小孩都就讀同樣的小學、中學，如果後來又繼續留在 17 哩附近發展，或是結伴出外工作，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一個 17 哩的交友圈，並有可能進一步發展出姻親關係。同時這種姻親關係也擴大了原有的親屬網絡，連結村內的不同家戶，也進而繼續延續了新村裡的「客家」聯姻，致使客家語言、文化、儀式、飲食等傳統在這個村落中持續鞏固與維繫。

五、小結一年輕人的地方感

在這章中談到了年輕人對於 17 哩地方感的生成，其實最重要的是「人」的影響力。無論是親戚或是朋友，這些關係其實都層層疊疊體現於他們龐大的親友網絡之中，讓年輕人即使離開再久，也會有想回家的一天。

而這種地方感不只是存留於年輕人身上，對於老一輩的新村人來說，更為深刻。過去他們在還未遷進新村以前，都散居於附近的村落，後來的鐵鎚行動，讓他們歷經了新村搬遷初期無所適從的恐慌，在那個當下，他們或許也無法想像自己最後竟是在這個他們原本急迫想要搬離的地方落地生根。終究他們還是習慣了這裡，因為這裡有最堅強的後盾。

就如同對 17 哩的年輕人來說，當在外面看世界、兜了一圈，更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之後，或許回到家鄉發展，藉由家鄉親友網絡的支持，他們也能在最熟悉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

因此，大略的可以知道 17 哩的年輕人他們對於未來的考量與規劃，其實都仍然與「家」密不可分。即使年輕時他們總會想奮力的突破父母的束縛與保護，離開家鄉出去外面看世界。但是當他們真正出去繞了一圈後，卻會發現「家」是永遠無法割捨的牽絆。而這裡指的「家」，不僅是形體上這個他們從小生活長大的 17 哩，還包括了在這個村落中，人與人間緊密的連結關係。而這種緊密關係的生成，為這裡帶來了異於其他地方深刻且細膩的「地方感」。

然而時自今日，也許很多人早已不記得或是不知道這個村落曾有的過去。但無可否認的，若在當時沒有「鐵鎚行動」或是鄰近地區的散居人口沒有集中變成新村管制區，現在的 17 哩以及三個新村或許也無法擁有這種融為一體的集體性。

而新村因有著這種特殊的「地方感」，再加上地理區位的優勢，等等有利條件加持之下，不僅為這裡帶來了更多外來人口，同時也將原有的新村人留下，進而促成今日的樣貌

第七章 新村是遙遠的過去

初到 17 哩就感受到這裡就是個商業發展中的小鎮，出外的新村年輕人歸巢了，因為這裡是他們最熟悉的家鄉。然而，有誰還記得這裡曾經的插曲？或是插曲終究是插曲，生活還是得繼續回歸主旋律？

還記得田野剛開始的某天，偶然到村子的某間咖啡店吃飯，也許是台灣口音的差異，或是獨自一人在黃昏時分出來晚餐的顯目，一下就被認出來不是當地人。年輕老闆自然地問起我怎麼會來到這個小鎮，簡單說明來意後，一旁二十多歲，一群和我年紀相仿的年輕人，馬上不假思索指著年輕老闆說「他爸爸以前也是山老鼠耶！」年輕老闆搔著頭，害羞地說「對阿！我爸爸以前曾經進去山裡喔！但是現在沒有了啦！」

從小生長在這個50年前被稱為「紅區」的地方，17哩新村現年約40歲以下的年輕人，多數人小時候普遍經歷過農村社會下經濟狀況的貧瘠，但他們父母在這個村子裡經歷過的政治紛擾，卻不存在於他們成長的歲月。甚至圍繞著新村四周，具有歷史意義的「雙層鐵絲網」，在他們的記憶中，也早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生鏽殘破、雜草攀爬的鐵絲網。而「新村」這個名詞，彷彿只是村落歷史中的一部分，關於這個名詞的由來，在這裡也不會刻意被提起。雖然這些年輕人一直都知道，我來自一個以前叫做「新村」的地方，同時知道在歷史上這裡曾有個「鐵鏈行動」在這裡發生，也耳聞這裡曾有「共產黨」，所以成為「管制區」。其餘的父母、祖父母，同住這個村落的親友不太會多講；在學校上歷史課時，課本沒有再多著墨；電視、報紙偶之提起，但卻不知道是否全然是真實。

一個很意外的寒暄，突然讓我思考，相對老一輩曾經參與左翼運動的 17 哩新村人講起他們年輕時的慷慨激昂，憶起新村管制時期政治恐懼下的煎熬難耐，那麼同樣在這個村落長大的年輕人，他們又是如何看待這個離他們好近，卻又陌生、遙遠的「村落記憶」？同時，這種村落記憶的「失憶」，又是怎麼形成的？

在本章中，我訪談了多位從小在 17 哩出生、長大的年輕人，試著從他們在家中、學校以及媒體上對新村獲知的理解，來進一步討論，他們的家—17 哩「新村」在這群新村年輕人記憶中的樣子。

一、家中不提起的記憶

「新村」對這些 17 哩長大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從小就自然而然的知道他們的「家」在一個叫做「新村」的地方，同時這裡也叫 17 哩、新生村或是 Siburan。但是對於這裡成為「新村」的過程，也許偶爾會從祖父母或父母親的口中聽到，不過，這個「記憶」總是模模糊糊，又混雜著一個個零碎不完整的片段。

如同問起從小在新村長大的報導人 Anna，知不知道為何當時會選擇這個地方做管制區的背景時：

不懂欸！還是它可能是中心地，還是什麼。不過我曾經聽我公公說過，就是被統治的時候他不是住在這裡，他是住在 16 哩...就是在 16 哩那邊住，然後全部被趕到 17 哩這邊。然後我聽他說好像有限制時間喔！就是早上到晚上幾點就一定要回來...因為晚上什麼時間就要關燈...

(130828_001 Anna 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8/28)

即使 Anna 從小就跟祖父母住在一起，但祖父母對於過去集中管制那段時期的敘述並沒有跟他透露太多，只是大略的跟她提到當時的背景，以及他們在管制之前的老家是住在新村外的其他郊區。同時，她在小時候其實也不知道原來她的爺爺過去也有參與地下活動，而是後來當她問起父母較多新村的往事時，父母提起她才知道的。不過，她會對新村管制的事情開始產生較多好奇是發生在中學上歷史課的時候：

不知道啊！就是說在這邊長大，就覺得沒有什麼。是到有次中學上歷史課提到，我才想起來，那段歷史講的不是就是我住的地方嗎？就那段時期我才有去問我父母管制時候的歷史，不然其實也不會主動去問。然後我父母就有跟我講比較多那時候發生的事情...不然也都沒講。

(130828_001 Anna 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8/28)

在 Anna 的日常經驗中，即使家中的長輩都經歷過那段時期，但是在她成長的過程裡，若不是她在歷史課本中讀到，突然想起這段歷史跟自己的連結，她或許也不會再去追問父母究竟那段時期發生了什麼事。

而外祖父母親身參與過左翼運動甚至因而被捕入獄的報導人阿興，雖然從小長輩會偶之提起當時的事，使他對新村歷史的認識，也比其他同年齡的人稍微來得清楚，不過外祖父母向他所提及的歷史，往往是那些辛苦的歲月，反而年輕時參與運動的風光卻不再提起：

他們隨口講說三新村我們就知道了嘛！這麼上去有三個新村...真正認識就是讀書有讀到多少啦！然後過後慢慢自己再了解一些這樣子...我就有時候看到那些中國台，就看到有那些共產黨的事，我就會好奇去問我媽媽，或者去問我爸爸，然後有時候我媽媽就會叫我去問我外婆。媽媽是她知道的她都會跟我講...(但)講不會多啦！就講外公就是參加共產黨的...然後差一點就被打死...然後就很苦囉！很窮囉！他也講很多啦！但都忘記了。然後還有怎麼會變三個新村是...因為怎樣怎樣...就是說好像是要分散，不要給他們太集中，他就會說這裡是禁區(用客話講)，有籬笆圍起來這樣，幾點不能進去我也忘了，那沒有進來的，就有人被共產黨打死囉！...這些我都聽我外婆講，就跟我講說我外公之前餓到吃樹皮喔！風光的事就沒有講....

(140113_001 阿興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3)

在訪談阿興之前，我就已經先訪談過阿興的外公、外婆。當時他的外公、外婆在訪談時，雖然有提及新村成立與被捕後造成家中經濟狀況的窘境，以及阿興的外公當游擊隊隊員時躲避在森林的辛苦。不過，整個訪談中，仍是以較多的篇幅在描述他們從小參加左翼運動時，那種無所畏懼的心情或是參與運動時的風光。但是從阿興的敘述中，似乎可得知在日常生活中，也住同個村落的外公、外婆，若非孫子特別問起，並不會向隔了一個世代的他們提起太多過去的事情，而且就算提及，也多半是講到新村生活的辛苦。至於為何外公年輕時會想去當「共產黨」、是什麼原因會進森林，這一切的內容原本是他們生命中看似最重要的記憶，竟不再向家人提起了。

而另一位與前述提到的報導人 Anna 是小學同學的小家，她相對於其他跟她差不多年紀的 17 哩人，較為了解過去的新村狀況在於她的父母比其他同學的父母年紀稍長，

真實經歷了從 15 哩的家，搬遷到 17 哩管制區的那段生活，因而偶爾會在日常生活中聊起過去的事情時向她提起：

沒有刻意去說，偶爾聊到以前事情的時候，當然會聊到以前的事情啊！就會講到。但專程講這樣的事情，是就不會。講以前的，可能就參參在裡面吧！什麼什麼事啊！就接下來是什麼事啊！這樣子..像是他們會講，戒嚴的時候不是不能回家嗎？就很多東西壞掉啊！還是...很多作物都沒有人顧啊！就收成會比較不好這樣，但是是沒辦法的事情啊！辛苦....一直都是很辛苦嘛！不像其他的，其他較富有一點的，就自己家裡的人又很多要顧，所以還得養家什麼的，像我爸爸就是這樣子。

(130908_001 小家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8)

小家的父母或親戚在過去其實不會去涉及太多政治相關的話題，也沒有參與左翼活動。但對於小家父母這類單純從事農務工作的人來說，當時雖然他們也像村裡多數的人一樣，帶著一家大小歷經慌亂的搬遷、對未來無所適從的焦慮，還有新村管制時期政治上的限制，不過相對於村內那些比較富有的人家在生活上的穩定，他們在那段時期，現實的經濟壓力才是他們最直接要去面對的。致使後來小家的父母在對孩子敘述那段過程時，依舊強調的是生活上的艱辛。對於政治，唯一提到的就是在管制後對於生活造成的不方便，而「山老鼠」、「共產黨」這類的事情，對本來就不涉入政治的他們而言，自然也不是他們會想要碰觸或是跟下一代提起的事了。

在 17 哩新村的每個家庭中，除了像上述這幾位的家庭長輩對於新村成立與管制時期的過程是較為侃侃而談、不太避諱談起之外，另外有些家庭則是受到當時的陰影，提到時多敘述的內容多為負面，或是直接不談論，以避免小孩知道太多。如與阿興是同學的報導人阿程即提到：

我的外公是(共產黨)...可是到了我的媽媽的那個年代，因為可能是教育的關係，他們漸漸的...因為教育他不想把這個...書裡也沒有寫...不想把那個列進去...可是我們的父母就很自然的，就不太想讓我們去追求這種風氣...就不太想要我們了解太多，怕我們會去追隨這種東西，因為這邊的不一樣嘛！父母都不會再講的。他們通常都不會刻意的跟你講...不會讓你覺得這個東西好像是很風光、很好的東西。很像覺得這在我們新一輩人記憶中不該記得的東西。

(140113_001 阿程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3)

阿程的外公曾參與過左翼相關的活動，但這個經驗對於阿程的母親來說，也許家中不再提起，又受到學校教育提起時多強化負面影響，同時成長的過程中，社會的氛圍也不太允許知道太多左翼的事情。使得當他們之後成為父母，在教育下一代時，為了不願讓動盪再次發生，就選擇性的忽略這些內容，再加上過去的教育告訴他們，「那些都不是年輕人要記得太多的！」

此外，另一些家庭在管制時期受到的陰影，讓他們雖然不像阿程家是刻意忽略提起這些內容，但提起時反而強化了在當時的那些負面情緒。

如自祖父母那代開始就住在 17 哩附近，擁有多塊土地的阿德在訪談時，就提到從小他父母跟他講到的內容：

我公公應該沒有、我伯伯他們應該有。我是聽我爸爸他們說...說關於這些人聯黨帶的囉！就反政府、害死很多人囉！多數講負面啦！有時候也會講說，就是那些青少年帶領一些人進森林裡面去啊！之類的....(還有)以前這裡的生活就是很苦...所以他們被圍起來的時候就很辛苦，沒有行動上的自由，一切都被監控著。他們是40年代(出生)的...60多、70多(年代)....他們就那時候也小，就人家趕到一個地方住，就去那個地方住囉！也不敢反抗。人家安排什麼就什麼囉！
(140115 阿德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5)

另一位彭小姐的家中則是於1958年，在新村成立以前就已經搬到17哩經營雜貨店。而因為家中開店做生意的緣故，她的祖父母不太參與政治，且對政治很敏感，甚至延續到新村已解除管制後：

我婆婆每次都有講(以前新村的事)。(但)她就怕..她好像那時候是圍新村，那些共產黨的...。因為我公公有一個妹妹是共產黨的..那時候很敏感...他們就很敏感，好像就有講我公公婆婆他們，因為他們是做生意的人，共產黨的都很討厭做生意的人，因為資產階級嘛！所以我婆婆就怕我們講政治...她就會說這種東西最好不要講這樣。像我們十幾歲的時候，我婆婆還沒有去世，那時候遇到大選...她就會很緊張...我們就在批評執政黨很爛阿！年輕人就這樣...她就會在那邊說「不可以講、不可以講。」投票是秘密的，不可以講這樣，很怕我們在這邊提會怎樣。她還是有那種陰影啦！她那個時候....好像就是人家也是有攻擊他們，因為他們做生意嘛！她就怕這樣...就好像不想干涉這些東西。她會講那時候她有多麼苦、多麼苦之類的啦！生活上的辛苦啦！就還沒有雜貨店之前

時。那時候圍的時候，戒嚴的時候，好像還有很多人住我們家這樣....有時候會聽她提起。

(140115_002 彭小姐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5)

從對 17 哩年輕人的訪談中可得知，在他們成長過程中，雖然新村管制早已事過境遷，那一切的紛擾也不存在於他們的記憶之中。不過，如同對報導人彭小姐的奶奶來說，在管制時期對於政治的限制與不可言說的陰影其實一直存在著，即使這個村落中不再被迫「噤聲」，17 哩的村民也能在咖啡店大肆談論政治，甚至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也無所畏懼的勇於表態。但對於那些親身經歷過那段時期的新村長輩們來說，那段記憶仍然是充滿複雜、又不知從何講起的過去。

因此，就算在 17 哩，有許多長輩會向這些年輕人簡單提起，讓他們隱約的知道他們從小生長的這個名為「新村」的地方，過去曾有過一段故事。可是那段記憶對他們來說不僅遙遠，也沒有太多的機會能去了解，所以始終無法深刻地產生共鳴，久而久之，那些記憶就像斷了根，不再存於 17 哩年輕人身上。

二、歷史課被忽略的「歷史」

在成立新村近 50 年後，來到這個曾經風聲鶴唳的小鎮，在當地商業化發展進程飛快之下，其實感受不到這個村落過去的哀傷，即使偶爾被報章、媒體提起，讓人憶起這裡曾經是個政治角力下被迫犧牲的村落，不過對 17 哩人來說，那早已是歷史中的一部分。

然而，弔詭的是在當代社會，當家中不再提起太多新村管制時期的往事，甚至連曾經參與過左翼運動的老一輩 17 哩人不再與下一代描述他們參與的經過，也不再公開或義正嚴詞的辯駁那些在官方論述下對左翼運動汙名化的歷史敘述時，那麼從庶民或親身參與者口中的「歷史」，似乎也隨著一代代參與者的老去，而無法再知道什麼是更貼近真實的「真實」。而留下來的似乎只剩那些我們所記得的，且通常是我們認為自己所記得的，或是被說服記得的歷史記憶(王明珂 1993)。

在族裔複雜又多元的馬來西亞社會中，目前的政治權力依舊把持於馬來人手中，華人的文化與歷史在國家政策下始終走不進主流。再者，執政黨下的華人政黨也會考量到欲維持國家穩定之前提下，維持各族裔之間的和諧才是最重要的(何國忠 2002)。這時當國家運用其權力制定各種經濟資源分配、法律、文化、教育等政策，以維護多族裔之利益，卻同時要獲得其他相對少數族裔對於國家的認同時，就出現了「一個馬來西亞」(satu Malaysia)²⁸這類愛國論述下的政治口號(關志華 2012)。

但是相對的，這類口號與政策出現，美其名欲追求與尊重各族裔之多樣性，卻同時也不再去細緻地對各族裔之間敏感的歷史關係再做論述，而是以像大熔爐般的方式來書寫歷史時，就如同 Benedict Anderson 所述「這是一個想像出來的共同體」，而歷史也往往成為那被創造出來的傳統與記憶(Anderson 1991)。

因此，在這之中，無論對馬來半島，抑或東馬來西亞的華人在這塊土地與國家發展上曾有過重要意義的左翼活動，在當今社會也因族裔關係與政治上的敏感，終究成為被忽略或帶過的「歷史」。

在下文中，我藉由對 17 哩新村年輕人的訪談，輔以討論目前馬來西亞中學教育所採行的歷史教科書中之內文，來討論砂拉越左翼運動的相關內容在馬來西亞學校歷史教育中的呈現。

而會以學校歷史教科書作為討論主軸在於，歷史教科書除了是知識的傳達，同時也是國家塑造認同的媒介，因此往往是由國家當權者的態度，來建構這個國家欲傳達與詮釋的歷史方向(謝婷妮 2013)。

(一) 歷史教科書中的「左翼運動」

在過去的研究即指出馬來西亞學校教育在族裔問題上針對敏感議題的迴避，如同謝婷妮以馬來西亞小學公民教育教科書中對於國家認同的形塑之研究即提到，無論是華文

²⁸ 「一個馬來西亞」(satu Malaysia)為馬來西亞現任首相 Najib Abdul Razak 在 2009 年新上任時所提出來的宣傳口號。背後意涵是欲追求多元種族的和諧與團結，並期許以這個口號建構新的政治形象，以喚回國陣政府逐漸失去的民心。而這個口號後來除了在政治場合中出現，在政府政策之下「一個馬來西亞」的宣傳標誌，也如廣告般，時常出現在馬來西亞國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關志華 2012)。

版或是馬來文版的教科書所塑造的國家認同，雖呈現五大民族和諧共存之樣貌，但整體而言卻隱藏著族裔間不平等的位階關係與政府對於教育的宰制論述(謝婷妮 2013)。而以口述訪談方式訪談了多位馬來亞共產黨女性成員，並集結出版為《生命如河流—新、馬、泰 16 位女性的生命故事》一書的作者邱依虹即於書中提到關於馬來亞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簡稱馬共)這類不被容於當代馬來西亞主流歷史架構下的內容，早已被排除在歷史課之外，遭受壓抑和埋沒。而且歷史教科書所講授的內容，只談論「官方」或審查後的主流歷史，在論述馬來西亞獨立時的歷史，總將馬共形塑與定義為破壞國家安寧的恐怖份子，對於馬共於其他非官方研究與紀錄的內容所提及他們在二戰時參與抗日活動的史實，以及他們真實的情況，則隱蔽不提，或是在歷史論述上衍生出屬於官方的詮釋(邱依虹 2006)。

馬共的歷史被改寫以符合官方論述或不再多贅述的情況，也出現在目前以馬來文為書寫媒介的官方批准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

如以下來自於 2003 年由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出版社出版的馬來西亞政府中學 5 年級歷史教科書(*Sejarah Tingkatan Buku teks 5*)所敘述 1963 年砂拉越、沙巴被併入馬來西亞聯邦這個階段的歷史作摘錄與翻譯：

1.

Reaksi segera yang timbul di Sarawak dan Sabah selepas cadangan pembentukan Malaysia diumumkan adalah ke arah menolak cadangan ini. Kedua-dua negeri ini telah lama berada di bawah pemerintahan British, iaitu Sabah selama 60 tahun dan Sarawak melebihi satu abad. Ramai yang ingin kekal di bawah pemerintahan British kerana mereka belum ada keyakinan untuk membentuk pemerintahan sendiri. Hal ini disebabkan sebelum ini peluang mereka dalam politik adalah terhad.

在組成馬來西亞的提議出現後，砂拉越和沙巴馬上產生很大的反應。因為這兩個州屬長期以來一直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沙巴 60 年，砂拉越將近一個世

紀。所以有許多人希望永久被英國統治，因為他們沒有信心獨立。這是因為，在這之前他們的政治權利是有限的。

2.

Kesemua parti politik di Sarawak ini akhirnya menyokong Sarawak menyertai Malaysia walaupun pada peringkat awalnya mereka menentang kerana mereka menginginkan kemerdekaan terlebih dahulu. Hanya SUPP yang terus menentang. Pada bulan Oktober 1962, lima buah parti, iaitu PANAS, SNAP, BERJASA, SCA dan PESAKA telah bergabung membentuk Parti Perikatan Sarawak. Gabungan parti ini telah berjuang ke arah menyekat pengaruh SUPP.

所有砂拉越政治團體，最終還是支持砂拉越加入馬來西亞，但是更早期時，他們是反對的，因為他們希望早一點獨立。當時只有 SUPP(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繼續反對。但在 1962 年 10 月，其餘 5 個政黨，也就是 PANAS, SNAP, BERJASA, SCA 和 PESAKA 已經結盟成砂拉越聯盟(Parti Perikatan Sarawak)。由於他們的結盟，爭取砂拉越加入馬來西亞，同時也努力改變且影響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的態度。

3.

Menjelang akhir tahun 1961 ramai pemimpin dan juga rakyat Sarawak dan Sabah mula menyokong pembentukan Malaysia. Perubahan sikap ini didorong oleh usaha kerajaan British da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menjelaskan gagasan Malaysia dengan mempertimbangkan pandangan penduduk Sarawak dan Sabah. Semangat perpaduan dan sikap toleransi yang diperlihatkan oleh para pemimpin dari Tanah Melayu termasuk Tunku Abdul Rahman, Tun Abdul Razak, Tun V.T. Sambanthan dan Tun Tan Siew Sin telah membantu kepada perubahan sikap ini.

1961 年年底，多數沙巴和砂拉越的領導人和人民都支持加入馬來西亞，這個轉變的態度是經由英國政府的努力和馬來聯邦以沙巴和砂拉越居民的視角為考慮，解釋馬來西亞的理念，以及馬來半島領導人們展現了他們團結的信心和忍讓的態度，包括 Tunku Abdul Rahman、Tun Abdul Razak、Tun V. T. Sambanthan 和 Tun Tan Siew Sin。

由以上從歷史教科書摘錄的內容可發現當在解釋砂拉越與沙巴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過程時，書中呈現的態度是正向的，而非其他非官方之歷史文獻中提到的負面情況。文中先說明了這兩個地方的人民過去因為長期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又因為政治權力有限，所以還沒有信心形成自己的政府。隨後提到了在當時兩個地方除了左派政黨人聯黨不贊同加入之外，其他政黨都表態加入，且積極拉攏人聯黨改變態度。最後在 1961 年年底因英國政府與馬來聯邦釋出善意，才讓這些政黨與人民同意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正式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員。

在非官方歷史文獻所提到砂拉越與沙巴被併入馬來西亞聯邦時皆會提到華人在此時因反對加入馬來西亞，欲建立自己國家而興起的左翼運動在 1960 年代的盛行。但在教科書之中，關於這點只簡略的用當時的左派政黨砂拉越人民聯合黨不願配合而帶過，沒有進一步的說明為何人聯黨不願意加入，以及提及左翼運動的相關內容。這應證了族裔立場的差異，以及當代馬來西亞社會的氣氛，影響了官方與非官方文獻間極大差異的歷史詮釋。

這似乎也代表著官方歷史在片面強調或忽略某部分歷史時，就如同從 Halbwachs 集體記憶理論中所衍生的歷史記憶是在各種社會利益群體的競爭中，藉由強化自身群體的記憶、弱化利益群體的記憶所產生的。再者，透過重新建構的過程，使得官方歷史才能服膺於當權者欲呈現的樣貌(王明珂 1993)。可是這類的詮釋方式，卻使得非當權者的歷史被忽略及改寫，同時影響著非當權者的下一代在理解自身族裔的歷史時的詮釋。

(二) 官方歷史與 17 哩年輕人

從上述歷史教科書的例子可再進一步討論，官方歷史對於17哩年輕人在理解自身村落歷史時的詮釋。

在訪談中問起17哩現年25歲的年輕人，關於他們從小的歷史課中所提及關於這華人新村或左翼運動相關的內容時，幾位從小在新村長大的年輕人提到：

彬：(學校上課)應該是講到一點點而已。然後我們讀書，我們從中學才有，就中學讀歷史...共產黨在書裡面就被列為是很不好的東西來著。

程：但在新的書找不到了。他把它刪掉了....

我：就不上囉？

程：不上那個東西了。現在小學上的歷史都是放一些能夠讓我們這邊的人能夠團結的那種歷史，它不會放這些會分裂的...很像最近有一個什麼...陳平啊！那個時候...他就是講不支持他回來嘛！可能就是因為有一些人他們覺得他們這些人比較極端，所以他們不要讓他們回來。然後政府又不能夠怎樣子...因為這一方面的人太多了，種種壓力下，這種主義就不會被承認。

(140113_001 阿彬、阿興、阿程三人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3)

雖然學校的歷史課程中，在上到馬來西亞史時還是無可避免得在馬來半島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後的這段過程中，提及「馬來亞共產黨」的相關內容，同時上到砂拉越的歷史時，也得提及1960年代在砂拉越的左翼運動。只是這些內容在大部分提及時，多是簡單敘述沒有太多的著墨。

而另一位現年35歲，在17哩附近中學當地理老師的17哩村民阿德也提到他求學階段所學的歷史與現在中學歷史在敘述「共產黨」時於內容上的比重差異：

我：但以前你們小時候上課的時候老師不是這樣上吧？

德：老師沒有跟我們講到這些...像這些共產黨的，他們總是帶過帶啦！

我：你們的課本，就是現在小孩的課本還有寫到嗎？

德：就是有講共產黨...但多數也是講西馬的...

我：也是有講到新村嗎？

德：西馬的

我：但在東馬的歷史上是沒有提到這三個新村的？

德：東馬這邊比較少，幾乎沒有提到...

我：所以這三個新村的歷史是沒有被保留的囉？

德：沒有...因為這邊沒有這麼嚴重...比起西馬...

我：可是像提到西馬的，他是用怎樣的敘述方式來提那時候的事情？

德：大多數是講反政府啦！

我：我說寫歷史的人是用什麼語氣來寫共產這件事？

德：講共產黨就是大多數是負面的，就會講說共產黨帶領華人去反對政府囉！他們要得到華人在馬來亞權力...

我：那如果這樣子講的話，那華人又是怎樣看這段歷史呢？

德：照理講，他們大多數還是講比較負面的...因為那時候還是英國給馬來亞統治...然後馬來亞剛剛獨立...還沒獨立...就日本戰敗後，交還給英國...那時候馬共就出來爭權囉！也大多數是華人...就變成他們也要出來爭一份囉！

(140115_001 阿德口述訪談逐字稿，2014/1/15)

在訪談中可從不同世代的報導人所提到的內容得知，無論是二十年前或是現在的馬來西亞政府，關於在這塊土地上曾造成較大規模衝突的左翼運動，交雜著政治、族裔關係等因素，使得在官方歷史的論述上，至今仍無法以較為客觀的敘述來詮釋這段歷史。

另外，在我的田野中，剛好適逢馬來亞共產黨最後一任總書記陳平於泰國逝世，在其逝世後從媒體上所呈現當權者對於「馬來亞共產黨」依舊不願多談或汙名化的態度²⁹，也許更能明瞭為何當代的馬來西亞學校歷史課程中，對於左翼運動相關內容的貶抑與避諱。

而當權者這種針對「共產黨」相關話題的敏感態度，不只體現於陳平身上，在媒體上對於類似性質在內容的限制也時常出現，包含在砂拉越這三個華人新村的論述上。關於這部分的內容，將於下一節中作進一步的討論。

²⁹ 這類汙名化態度包含當今的馬來西亞政府仍然將馬共視為破壞社會和諧的異端，因此當陳平於泰國逝世後，當權者仍堅持陳平的骨灰無法進入馬來西亞安葬。(參考來源：星洲日報 <http://news.sinchew.com.my/topic/taxonomy/term/1166>)

三、電視、報紙中的 17 哩「新村」

雖然對馬來西亞當權者來說，作為維繫馬來西亞各族裔間的和諧之正當性，所以在這塊土地上關於「共產黨」的有關內容，在當代仍被其視為社會的異端，也是政府至今鮮少提起的話題。不過，隨著政治較以往開放，若是以「新村」為名之內容，已不復見於 1950 至 1970 年代時的敏感。再加上華人意識的崛起，使得在馬來西亞華人媒體中，關於新村的議題讓人並不陌生。因為無論是平面或是電視媒體，每隔幾年總有特別針對新村的報導。如在電視媒體上，導演黃巧力製播的《家在馬來西亞》、《我來自新村》的電視節目；在各家報紙中，對於新村以專題性介紹的專欄等等。

不過，上述提到的這類型的電視節目，主要仍以馬來半島在 1950 年代殖民政府為杜絕馬來亞共產黨而設置的 400 多個華人新村之歷史脈絡為主軸，較少有提及或討論砂拉越在相異歷史脈絡下的三個華人新村。但在 2009 年《家在馬來西亞—沙巴與砂拉越華人的故事》這個節目中，就曾製播了數集以砂拉越這三個華人新村為主的內容。而報紙的部分，在目前可掌握到的文獻資料中，砂拉越的地區報紙，也是每隔不久即有三個在砂拉越的新村之專題報導。如 2001 年的《星洲日報》與 2005 年的《聯合日報》都分別有完整的系列報導。

而上述這些內容有異於官方媒體所呈現的報導，對新村年輕人在追溯自身成長區域歷史的影響力又是如何，是否除了家庭與學校因素，媒體也是另一個影響新村年輕人在了解過去家鄉歷史的態度？這都是在本節中所欲去了解的。

因此，在本節中，除了將簡要分析從這些當代媒體中所描述的新村之外，也將進一步討論這些媒體對新村年輕人認識新村歷史的影響。

（一）《家在馬來西亞》

《家在馬來西亞》是馬來西亞寰宇電視台(Astro)³⁰ AEC 頻道製播的系列節目，主要介紹馬來西亞各地華人生活、文化等等的內容。在 2009 年時以沙巴與砂拉越華人的故事為主題，其中一周的內容即是這三個華人新村。

在本集的節目一開始即以口述的方式，簡單敘述了這三個因 1965 年的鐵鏈行動所形成的新村之歷史背景。接下來從這個河婆客家人為主要村民背景的要點來做詳述，提到了這個村落中的客家飲食、一年掃墓兩次的傳統等等，都和客家人的文化習習相關。再者，村落也因鄰近達雅族聚落，所以有越來越多華人之外的小孩選擇就讀村落的三個華小。隨後也介紹現在的新村發展，是商業與務農工作兼併進行的。

節目中，雖然不時穿插著過去新村管制時期的歷史背景，也訪談了經歷過那段時期的新村人他們對那段時期的記憶，不過整體而言，在節目中過去的歷史記憶，終究只是這個村落的一部分並非全部。這種呈現方式似乎也避免了過度強調左翼運動經驗的內容，而將重點放在一個村落的脈絡與不同族裔的相融合來做探討，適時迴避了與族裔問題有關的敏感議題。

（二）報紙上的「新生村」

在第四章〈公權力下的不自由—新村成立〉中即提到 1974 年砂拉越本地報紙前鋒日報對三個新村做的專題報導。但時隔多年，上述提到近年來也有許多份報紙，也特別針對這三個新村做了更為細緻與全面的專題，同時在撰文者的角度與態度上，也不再像 1974 年前鋒日報是以當權者的角度出發來敘述，取而代之的是從歷史脈絡與當地人的觀點，平鋪、客觀、不帶著太多批判的態度來描述這段歷史。

³⁰ 馬來西亞寰宇電視台(Astro)為馬來西亞私營的電視台，同時是一個涵蓋馬來西亞語、英語和華語三語的付費衛星電視台。(資料來源：<http://www.astro.com.my/>，資料取用時間：2014/6/13)

1. 星洲日報—新村今昔系列

星洲日報於 2001 年 8 月 7 日起連續至 13 日，做了名為〈新村今昔系列〉的報導，以每天一全版篇幅的方式，分別利用歷史文獻與至當地訪談資料，介紹砂拉越這三個華人新村。在第一篇專題報導中，記者徵引過去的歷史資料先說明三個新村的由來，以及較為完整的歷史脈絡。第二篇之後，報導開始以個別新村的內容做介紹，其中以新生村為主的報導有三篇，首先從新生村的村名提起，並提到在新村成立以前這個村落的歷史背景，後來又針對新生村的現況來做進一步的報導，如新生村因人口成長遽增，所以正往商業中心邁進等等的內容。最後一篇關於新生村的報導則是以新生村中華公學的歷史過程做一全面敘述。

或許本篇專題是以討論「新村今昔」為由，所以文內主要還是從過去的歷史敘述與當今新村發展來做對比，且在整體論述架構下，是以正向的方式來描述在歷經那段被管制的歷史階段後，現在正朝向如其名般發展的「新生村」。如從幾篇專題文章中的標題可略知大概的內文走向，包含「歷經鐵錘行動洗禮，渴望綻放耀眼光芒」、「欣欣向榮城鎮，新生村走向美好未來」或是「房屋計畫刺激人口增長，新生村可成商業中心」。

在這類論述下，強化了新村因當時集中居住的這個計畫，連結了現在新生村所擁有的商業，這似乎也意味著過往那些很辛苦的歷史記憶，終究成為這個村落中的過去，但背後細膩的歷史細節，反而不在這之中受到重視。

2. 聯合日報—新村 40 話當年

繼星洲日報於 2001 年針對三個新村有一較為全面的專題報導後，2005 年的 7 月，適逢新村 40 周年，砂拉越地區性報紙聯合日報也在此時對於三個新村連續 20 天，以每天一頁全版篇幅做了更大規模與系統性的專題。但相對於星洲日報在 2001 年的內容較偏向新村生活的歷史敘事，聯合日報這次的專題則以當年曾經參與過左翼運動的村民作為訪談對象，輔以摘錄歷史文獻的方式來陳述這段往事。

在此專題的第一篇報導中，即〈二戰掀歷史新頁 革命浪潮暗流洶湧〉為標題作為此專題之開場白，同時也在文內一篇介紹此專欄的短文以小標題寫下〈這些歷史，怎能遺忘？〉來敘述為何會有這則專題的誕生。

內文摘錄如下：

新村 40 話當年——這些歷史，怎能遺忘？

1965 年 7 月 6 日，砂州唯有的 3 個新村：新生村、來拓村、大富村，在倉促中以扭曲的方式建立起來了。新村的設立，確實曾逼使當時的砂共鬥爭一度陷入艱辛時段。森林裡的人受苦；森林外的人也受難。只是，若說砂州今天所享有的繁榮穩定是一種福份，那這福分絕非是天賦的，而是許多人用生命為我們今日所享有的一切給墊了底。……

成立 40 年後的今天，新村幾乎都已回歸到單純的「居住環境」，彷彿只是一個非關歷史的「地理名詞」而已。

尤其在這個不注重歷史保存的社會中，我們一般所能接觸到的，也都是屬於強者的歷史詮釋與記載，使我們越來越遠離真正的感性一面。……(略)

遺憾的是，善良的人們也都總是善忘。我們已開始慢慢地、自覺性的遺忘這段過去。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村民已垂垂老者，第二代民眾對新村歷史所知即不完整、也不確定，而新生代的年輕人更是完全懵懂。……(略)

對於所經歷的苦難，他們不需要同情，而是更多認識和認同。
(2005/7/11 聯合日報)

從這系列專欄的前言短文中，已概述了這次的專欄內容欲呈現的內容之大概方向，其著重的是庶民論述，而非當權者所書寫的歷史。因此，可從文字中隱約的發現，這系列專欄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個故事，對於當年促成新村的左翼運動基本上還是以正向的態度去詮釋或陳述。再者，因訪談的對象為新村村民，使得新村成立後的生活敘述，更貼近庶民心聲，將當時生活的不方便與辛苦，如實的做了比學校歷史教科書有更詳盡的敘述。

不過，在此專欄中，即使執筆者的態度早已異於 1970 年代的官方論述，但仔細審視了這幾篇專欄文章後，會察覺到這些受訪者雖然是新村的村民，都還是曾經參與過左翼運動的人。那些未曾參與左翼活動卻無辜被迫捲入這場紛亂當中的村民，或是在村中那些隱蔽、不願多說的人，他們的聲音至始至終還是無法在公開的文獻中被紀錄。

(三) 媒體與新村年輕人

隨著過去村落的歷史在家中因為許多因素不再被提起，學校談到這段歷史時又因政治因素多半被避諱、刻意忽略或改寫。這時，當媒體意識到這段歷史的重要性，欲藉由傳播的力量，試著有所保留時，會發現真正對於這個村落的歷史傳承，似乎還是有所限制，或者說在這已然缺乏歷史傳承氛圍之下的村落中，會想再去關注自己所在之處的歷史，進而了解、深究的下一代「新村人」，始終還是少數。

我們都不知道那時候有報紙有報這樣的事情，在一般生活中真的不太會去聊到這些事。(130828_001 Anna 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8/28)

或許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新村」早已成為歷史記憶中的名詞，是個偶之提起時才會憶起的名字。再加上，村內也不復見當時管制時期的歷史遺跡，唯一存在的是那些活在歷史中的老一輩 17 哩人，但是當他們也不願提起，又伴隨著時間他們也年老逝去。那麼對那些在新村長大的年輕人而言，即使那段記憶就活生生地曾經發生在他們親近的長輩或是這塊土地上，但當記憶失去了傳承，那些歷史也離現在的生活太遙遠了。

我記得我沒有刻意去問我媽媽或是什麼的... 沒有刻意去問家人是什麼事，就聽聽就算啦！太遙遠了，也沒有覺得怎樣。畢竟也不瞭解當時的事情啊！(130908_001 小家口述訪談逐字稿，2013/9/8)

然而，透過媒體再現的過去，雖然可以喚醒一些被遺忘的記憶，但是時至今日，無論是冷戰時期過去活躍於馬來半島的馬來亞共產黨，或是在砂拉越這塊土地上掀起「反殖民」浪潮的砂拉越左翼運動，始終無法抵擋民主的潮流，皆在這場戰役中失敗了。同時也致使他們在這個國家中失去了官方歷史的詮釋權利，進而使得未經歷過那段歷史的馬來西亞華人也無法在媒體上透過較多元的論述真正理解當時的情況。

四、小結—遺忘並非真的遺忘

從 Halbwachs 提到記憶是透過社會所建構出來，並非真正將過去保留下來，而是基於現況再重新被建構的這點來說，意味記憶其實不斷在變動，且受到社會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影響，進而改變人們對於過去的理解（蕭阿勤 1997）。而將其理論套用於 17 哩的狀況會發現，17 哩的年輕人對新村過去記憶的建構取決於家庭、學校教育與可接觸之媒體，但是當這些媒介選擇性的不再提起過去的事情，或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論述這段歷史時，致使他們對新村也產生了新的詮釋。同時，新村目前的發展與變化，也無法讓人直接地聯想這裡的背景曾經是革命的「小延安」，因為他們終究沒有在那段記憶生活過。

因此，年輕人對新村歷史記憶的「結構性健忘」，事實上並不是真正的遺忘，而是社會環境造成他們無從記憶起、無法對這個地方的歷史產生共鳴。使得他們對於這裡，相對於他們的父母、祖父母，他們認同的是「17 哩」這個他們從小生長的地方，而非管制區下又有多數左翼分子存在的那個「新村」。

不過可進一步思考，若是有天當華人成為掌權者，致使這段早已塵封的歷史往事，又再次被拿出來述說與探討時，再一次被建構的新歷史也將出現，因為歷史終究是透過選擇的過程中在當代社會被陳述的。

但在目前的現實生活中，17 哩這個地方已然扮演著這種社會結構，主宰與建構這個村落集體記憶的生成。

第八章 結論

本研究依循著時間脈絡，除了以村落歷史背景資料作基礎之外，主要藉由不同世代區分為兩大部分來討論砂拉越 17 哩地方感之變遷過程。研究發現有二，首先在地方感方面，影響 17 哩地方感變遷的力量不僅是冷戰時期的政治力，尚包含早在上世紀初期即已展開的地方社會經濟發展；而且，從長期變遷看來，後者影響力是超越前者的。其次在集體記憶方面，針對不同世代集體記憶的轉變，發現除了在國家政治力的影響下，地方也提供了一個社會結構重新建構集體記憶的可能，而且是伴隨著地方產生改變的。

另外，本研究預期未來可發展之研究有以下四點：1.村落史的研究中可以透過此種貫時性研究方式，深度了解這個村落的發展變遷；2.晉漢斯三省是砂拉越客家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區域，以更多的村落研究成果，建構砂拉越客家史，應該是未來東南亞客家研究的重要方向。3.砂拉越的族群多元複雜，未來的研究除了可在客家族群上做討論之外，也可進一步的從南島民族的角度來理解客家人，而非僅侷限於華人中心的論點來做詮釋。4.從本研究中發現，馬來西亞國族認同議題，未來也可以藉由村落的視角進一步地剖析。

一、研究發現

(一) 地方感

從本文一開始即提到若是以一個地方的觀點來看「17 哩」這個新村的發展演變，可以知道 1965 年當地成為新村管制區這件事情，即使讓 17 哩這個區域範圍的面貌及華人在生活上產生巨大的改變，但是卻不代表這個插曲，就阻斷了 17 哩原有的發展狀態。相對的，從整體貫時性的研究中可得知，這個插曲反而加速了 17 哩原有的村落發展，進而也讓這個地方在後來生成出屬於自己的「地方感」。

由於 17 哩原本就擁有在地理區位上的優勢，在新村成立之前即使還是散居的農村，但是早期就存在的村落樣貌，包含商店區、學校、公家部門等等，早已奠定了現今 17 哩的發展基礎。

後來新村成立時，雖然國家利用政治力的影響介入了這個村落，將這裡形塑為一個高度制約下的管制空間，但這個村落並沒有因此停止發展，反而隨著時間，村民透過這個被建構出的空間，隨之發展出屬於這個地方的生活樣貌，進而讓這個地方在不知不覺中，再也不是個讓人抑鬱的「空間」。反之，村民藉由自身的力量，一步步的創造出這個屬於他們的「地方」，無論是後來所擁有的村落地景，包含學校、民眾會堂，以及凝聚村民的相關社團，或是隨著當地商業發展下衍生出農業與商業並存的樣貌，匯聚形成今日的「17 哩」。

之後隨著年輕一代的 17 哩人在這裡出生長大，致使這個村落也生成了屬於他們相異於父執輩的「地方感」。在這個從小長大的家鄉中，他們不僅在日常生活中延續客家的語言、文化及飲食習慣，也還繼續擁有著從新村管制時期在祖父母、父母那代在村落中所流傳下來的親友網絡，並透過每年農曆新年至各家拜年儀式或是大大小小的村內活動繼續延續與擴展。同時，家鄉當代新興的商業發展，也讓這些年輕人開始選擇返鄉工作，進一步地與這裡建立更緊密的連結關係。

從以上說明了，以「地方」的視角來看新村，會發現這個村落從來就不是靜止不動的，因為社會永遠保持在動態的狀態下，從而存在著一種連續不斷的過程(Pred 1983)。而這樣的地方，讓生活在其中的人建構了一系列的環境與日常實踐，在反覆的過程中，地方從而與自身產生了深刻意義，使人內在且歸屬於此(Cresswell 2006)。再者，不同世代下的 17 哩人，也藉由多樣化的方式繼續創生與延續這個屬於他們的地方，致使過去在新村管制區時期的悲傷似乎也變得不再那麼重要了，因為這裡早已是他們落地生根的家。

(二) 集體記憶

延續上述提到地方是在一個動態狀態過程進行這點，繼續延伸討論到集體記憶在地方產生的轉變。在 17 哩，地方除了生成地方感，同時它也提供一個社會結構來建構與重塑集體記憶。

老一輩 17 哩人在敘述他們年輕時參與左翼運動的過程時固然流露了無限的驕傲與熱情，但是隨著砂拉越左翼運動在官方歷史上終被評斷以失敗告捷，就算對曾經身處在那個時代與環境下的老一輩 17 哩人而言，左翼運動依然不存在太多的緊張與不可言說，因此並非是 Yong 提到那是因為對村民來說一個悲傷的記憶，所以不想再提起(Yong 2006)。

在我的研究中，觀察到造成這些「噤聲」，除了有著國家脈絡下對左翼運動在整體社會氛圍建構上的淡化，包含媒體或是官方歷史的詮釋下，致使左翼運動或與左翼運動有關之新村的相關內容，在馬來西亞社會依然是敏感的話題之外，回歸 17 哩這個地方做討論，會發現「新村」也扮演著形塑集體記憶轉化的重要角色。從整個 17 哩的發展演變上來看，隨著時間，17 哩村民在 17 哩的生活日趨穩定之後，如上述所提到這些村民利用自身的力量，逐一的建構這個地方，使地方感在這些過程中生成。但相對的，在地方感生成的當下，也牽引著 17 哩對於過去那些關於左翼運動與新村成立初期艱辛生活的集體記憶，逐漸被忘記，或是不再提起。因此，那段在村落曾經或是常被研究者、記者視為重要變遷記憶的內容，無論再以什麼方式呈現記憶裡的悲傷，對於真正生活在「新村」的村民來說，反而都不那麼重要了。因為他們現在每天生活的地方，早已透過不同的形式，使得過去的憂傷被遺忘也成為必然，進而讓那段集體記憶在這裡產生轉化。

不過，如同 Halbwachs 所述集體記憶終究是一個被篩選、建構後的歷史，也需要有一個時空界域來做維持(Halbwachs 2002)。所以即使當代的社會氛圍不容於這段記憶的再現，甚至在多數時候只能以官方論述下的呈現。但是，試想若是有一天，當華人擁有在這個國家的發聲權力時，是否也能讓這段在此刻被刻意塵封的記憶，終能有再被提起、

重新建構與詮釋的機會？從而影響到這個早已忘記過去村落歷史記憶的小鎮，開始對這段歷史，有重新的理解與述說。

二、未來預期研究

(一) 村落與族群研究

本研究從 17 哩這個村落的新村研究中發現，未來其他的新村研究也許可以藉由這種貫時性的研究方式，透過不同世代村民對自身村落的詮釋，除了補充村落歷史資料上的不足之外，也能更貼近真實的庶民心聲，同時又可以更為深度的瞭解這個村落整體的發展變遷，而不再只是將研究內容侷限於單一時間點來新村的當代問題或是過往的歷史記憶。同時，這種研究方式也不僅適用於馬來西亞的新村研究上，其他討論村落發展之研究皆可嘗試。

關於未來可發展之族群相關研究上，有客家人與鄰近區域的南島民族的議題可做進一步的研究。由於 17 哩這個村落的所在地，從前述提到之田汝康的研究中顯示這個區塊是砂拉越客家人口最多最密集之處，概括在目前的晉漢斯三省內。在未來的東南亞客家研究上，可朝砂拉越這個區域的客家聚落做發展。

另外，這個區域的南島民族與客家人往來互動之議題也是可供再探討之內容。如同在本研究中的 17 哩，雖然是一個客家聚落，但是因鄰近原住民聚落，使得族群間的往來互動甚密，而這種互動最早可追溯到新村管制時期之前。但在本研究中受限於語言能力，無法再擴大研究範圍至鄰近的原住民聚落，只能將重點擺置圍繞在華人村落的地方感與集體記憶來做討論，無法從鄰近區域的原住民他們的觀點來看 17 哩的發展演變。不過，在整體新生村的發展上，若是能再從原住民的角度理解客家人的村落，或許能讓這個研究更臻完美與全面，進而能有更多族群互動間的內容。

(二) 村落視角的國族認同再思考

將時空拉回那個一群過去曾經參與左翼運動的老一輩 17 哩人，在 9 月 16 日群聚在一起歡欣慶祝著馬來西亞成立 50 周年的紀念餐會上。在這個餐會上，之於我這個「圈外人」而言，一開始總覺得弔詭、無法理解為何坐在我身旁在年輕時欲在砂拉越掀起反對馬來西亞的左翼運動浪潮的爺爺、奶奶們，會選擇在這天相聚，而且還是慶祝著這個原本應該是會讓他們傷心的節日。

回歸到 17 哩這個村落來看，發現這個村落中的華人從 20 世紀初期至今的對於這裡在認同上的發展演變，不由得竟與當代馬來西亞華人在這個國家對於國家的認同上有幾分相似的地方。

起初從中國南移來砂拉越這個偏遠村落發展的客家先民，總還是抱持著有天能衣錦還鄉、光榮的回到中國原鄉，就算回不去心裡也還是總記得自己的原鄉在中國的何處，無論表現在對下一代的教育或是義山上一個個記載著遙遠中國原鄉名稱的墓碑上，因為這群人認同的始終不是那個更遠的英國或是原本在歷史發展上沒有太多關係的馬來亞。但隨著在慌亂之於被迫搬入新村，以及最終還是拿到了一張馬來西亞公民的身分證這些過程，讓這些客家人突然間被迫認同這個原本在百般不願認同的國家，也放棄了那原本想像中能夠「華人做主」的砂拉越。即便如此，他們還是沒有「回去」中國，依然還是在 17 哩中親眼見證著這個村落的發展演變，更不用說那些出生於這裡的 17 哩年輕人了。

就如同在這塊土地上的華人，因為他們的族裔身分，使得「中國」對他們而言，總是似近似遠。如同從文化上來說，「馬來西亞華人」對中華文化的理解日趨減少，而在政治上，又因為他們是「馬來西亞華人」，依然無法在這多元族裔的國家中擁有主流的地位(何國忠 2006)。再者，即使他們在家中繼續講著祖先從中國帶來的方言，承襲著那

些中國文化。可是在這塊土地出生、長大的華人，在總是熱烈開打的羽球比賽與馬航空難事件³¹的表述中，早已清晰可見他們認同的終究是馬來西亞，而非那遙遠的中國。

而我那從廣東梅縣飄洋過海來到台灣落地生根的外祖父母，以及融合了多元族群從小誕生在台灣、生長在台灣的我，何嘗又不是如此？



³¹ 2014年3月8日一班多數為中國籍乘客的馬來西亞航空編號MH370班機，原本從吉隆坡出發預計前往中國北京首都機場，卻在航程中因不明原因失蹤，至2014年6月底前仍下落不明。而這起事件發生後也引起多件中國人與馬來西亞人在網路上的言語攻擊事件。
(資料來源：<http://ent.sinchew.com.my/node/48053>，資料引用時間：2014/6/15)

參考文獻

中英文參考書目：

于東

2009 砂拉越左翼運動史。民督魯：余清祿。

王汎森

1993 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代史事為例。刊於當代 91，頁 40-49。

王明珂

1993 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刊於當代91，頁6-19。

1996 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刊於言與思 34(3)，頁147-184。

1997 記憶、歷史與族群本質。收錄於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41-60。台北：允晨文化。

古燕秋

2011 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社會與空間變遷研究—以拱橋新村為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田英成(田農)

2006 砂拉越客家族群的政治參與初探。刊於從「客人」到馬來西亞客人—第二屆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林金樹主編，頁 23-40。吉隆坡：馬來西亞客家學研討會。

2012 追尋汶萊人民黨—「12.8」政變的真相。東方日報。
取自：<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
(資料取用時間：2014/6/13)

何國忠

2006 馬來西亞華人：身分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杜明

2008 砂拉越晉漢省華校春秋。古晉：萬里印務。

林廷輝、宋婉瑩

2000 馬來西亞華人新村 50 年。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林煜堂

2009 江河浪淘沙—砂拉越大時代兒女情懷。砂拉越：馬聯。

邱依虹

2006 生命如河流：新、馬、泰 16 位女性的生命故事。台北：巨流。

砂拉越人民聯合黨中央宣教處

1999 歷史的考驗與鬥爭中成長的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簡史)。
Kuching：Modern Offset Printing Company.

夏春祥

2003 「集體記憶」的記憶---台灣社會中觀念接受史的考察。2003年文化
研究學會研討會文章。

張坤國 主編

2014 砂拉越古晉西連路十七哩民眾中學回顧(1960-1965)。古晉：不祥。

新生村中華公學

1999 新生村中華公學校刊。古晉：新生村中華公學。

陳鴻瑜

2012 馬來西亞史。台北：蘭台。

黃建淳

1999 砂拉越華人史。台中：東大圖書公司。

黃紀鄰、林家昌、李振源

年代不詳 砂勞越歷史回顧。古晉：國際時報叢書。

鄒雁慧

2007 馬來西亞華人新村文化景觀的變遷：增江新村之研究。臺灣師範
大學地理學系學位論文。

夢羔子

2011 鼠患。轉引自拉讓盆地文學部落格。取自：<http://kemunasiwa.blogspot.tw>
(資料取用時間：2012/10/30)

- 劉子政
1996 砂拉越百年史略。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 潘婉明
2001 一個新村，一種華人?--重建馬來(西)華人新村的集體回憶。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關志華
2012 馬來中心主義下的國族認同行銷：對「一個馬來西亞」廣告批判
思考。刊於台灣東南亞學刊 9(1)，頁 113-136。
- 蔡靜芬
2013 「舊娘」？「新」娘？馬來西亞砂拉越客家社群的婚姻儀式及
女性。台北：遠流。
- 謝婷妮
2013 馬來西亞公立小學公民教育教科書國家認同之批判論述分析。
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 盧友愛 編
2012 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年探討(1950-1990)。
民督魯：北加里曼丹革命 40 周年探討編委會。
- 蕭阿勤
1997 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
刊於思與言 35(1)：247-296。
- 饒尚東
1995 東馬客家移民史略。落地生根—海外華人問題研究文集。
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 龔宜君
2004 戰後砂拉越客家族群的社團組織與政治參與。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取自：<http://www.hakka.gov.tw>
(資料取用時間：2014/6/13)

- Anderson, Benedict 吳叡人 譯
2010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
- Agnew, John
1987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Chang, Pat Foh
2008 History of Kuching City in Sarawak. Kuching:InfoGrafik
- Cresswell, Tim 王志弘、徐苔玲 譯
2006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
- Cribb, Robert, and Brown, Colin 蔡百銓 譯
1997 印尼當代史。台北：編譯館。
- Halbwachs, Maurice 華然、郭金華 譯
2002 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Havery, David
2000 Space of Ho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Lewis A Coser 邱澎生 譯
1993 阿伯瓦克與集體記憶。刊於當代91，頁20-39。
- Lefebvre, Henri
2000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Oxford, UK.
- Porritt, Vincent
2002 Operation Hammer : Enforced Resettlement in Sarawak in 1965. Hall:Centre for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 Pred, Allan
1983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Behavior*, Vol, 13, No.1, March, P.45-68.
- Ramlah Binti Adam, Abdul Hakim Bin Samuri, Shakila Parween Binti Yacob, Muskimin Bin Fadzil.
2003 Sejarah Tingkatan Buku teks5.Kuala Lumpur :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Relph, Edward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Pion, London.
- Tien, Ju-Kang
2004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UK.
- Tuan, Yi-Fu 潘桂成 譯
1998 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桂冠。
- Yong, Kee-Howe
2006 Silence in history and nation-state : Reluctant accounts of the Cold War in Sarawak.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33, No.3, P.462-473.
2007 Th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Place-names in Sarawak.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80(1), P.65-91.
2013 The Hakkas of Sarawak Sacrificial Gifts In Cold War Era Malaysia. Canada:University of Toronto.

網路與報刊資料：

詩華日報

- 2011 鐵鏈行動下，三華人新村誕生。詩華日報：2011年9月16日。
取自：<http://www.seehua.com/node/3628>
(資料取用時間：2013/12/11)

林金城

- 2010 古晉 17 哩 三角菜粿。星洲日報：2010年8月1日。
取自：<http://news.sinchew.com.my/node/170647?tid=46>
(資料取用時間：2013/12/11)

砂拉越友誼協會

- 時間不詳 友誼協會出版專書
取自：<http://uca96000.wordpress.com>
(資料取用時間：2014/5/27)

星洲日報

2013 勿攜陳平物品入境・總警長：別試圖重燃共產主義。9月2日。
取自：<http://news.sinchew.com.my/topic/taxonomy/term/1166>
(資料取用時間：2014/6/13)

雪州蘇丹：勿忘歷史・陳平是國家敵人。9月27日。
取自：<http://news.sinchew.com.my/topic/taxonomy/term/1166>
(資料取用時間：2014/6/13)

國際時報

2006 激情的歲月—砂華公會。9月13日。
取自：<http://www.intimes.com.my/write-html/06bau56.htm>
(資料取用時間：2014/6/13)

詩華日報

1965 首長召見兩反對黨領袖 闡釋政府所採行動 首長謂管制地區
乃共產黨溫床 共產黨及親共居民佔八十巴仙 並警告報章勿
發表不效忠言論。詩華日報，7月8日

1965 成邦江路管制區農人渴望運出農產品出售 商人要求至晉配貨未獲
准 居民營養不良因濕氣患病。詩華日報，7月14日

1965 農業與森林部長張桂生昨指出 西成路十五哩十九哩及廿
四哩巴剎將予封閉—政府已選定地點建立新保護村。詩華日報，8月
8日

1965 西成路三個新保護村 命名新生來拓及大富—意味擺脫共
黨之威脅步向繁榮。詩華日報，8月11日

前鋒日報

1967 當局似又發大慈悲 釋放十五名拘留者 田紹熙認不外緩和民情 聯盟
履行民主應全釋放。前鋒日報，10月30日

陳成祈、黃愛莉、王絲絲、朱美夷

2005 新村40話當年系列報導。聯合日報，7月11日至31日

沈如康、李佳珮

2001 新村今昔系列。星洲日報，8月7日至8月13日

影片：

黃巧力

2009 家在馬來西亞—沙巴與砂拉越華人的故事。馬來西亞寰宇電視台(Astro)。
取自：<http://youtu.be/rqTKYbRgpaI>
(資料取用時間：2012/12/21)

